呼伦贝尔文史资料

第四辑

（伪满兴安史料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呼伦贝尔盟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呼伦贝尔文史资料

第四辑

伪满兴安史料专辑

* * *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呼伦贝尔
盟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呼伦贝尔盟政协文史印刷厂印刷

* * * *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3　　95千字

1988年6月印刷　　　　　印数800

工本费1.50元



目　录

伪满兴安北省的机构及其他一些情况

阿必德　宝德整理

一、兴安北分省组织机构，主要人事情况

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以后，将兴安岭以北以西的地区划为兴安北分省，海拉尔为北分省省会。3月29日伪满执政任命凌升为兴安北分省省长，同年6月2日凌升在呼伦贝尔就职启用印信。另有日本人中村撰一任省参与官。但因当时呼伦贝尔局势不稳定等原因，中村撰一没有常驻海拉尔，而经常来往于长春——海拉尔之间。

兴安北分省虽然成立了，但因东北军苏炳文将军仍在齐齐哈尔、海拉尔一带活动，省公署的工作未能开展。1932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海拉尔。其军官头目名叫高波××。他率领一部分军队进占海拉尔的同时，日本特务机关桥本领五郎也来到海拉尔。从此呼伦贝尔各族人民在日伪的残酷的殖民统治下，度过了十几年悲惨生活。

伪兴安北分省公署的组织机构

省长　参与官

- 总务厅
  - 总务科　会计科
    - 总务股、人事股、宣传股
- 民政厅
  - 地方科、生产科、文教科、警务科
    - 会计股、文教股、宗教股、警务股、司法股
- 海拉尔市
- 满洲里市
- 东旗
- 西旗
- 额尔古纳旗
- 陈巴尔虎旗
- 索伦旗

原呼伦贝尔副都统制建制下的变动情况是：取消新巴尔虎八旗，成立新巴尔虎东、西两旗，原来的总管改称为旗长；

索伦巴尔虎左翼两旗，索伦巴尔虎右翼四旗，布利亚特旗，额鲁特等旗合并成一个索伦旗；

1918年由索伦左翼分出去的陈巴尔虎两个旗并成一个陈巴尔虎旗的机构没变；

呼伦、胪滨、室韦、奇乾县等地改为海拉尔市、满洲里市，额尔古纳左、右两旗。

旗市长虽是当地人担任，不久都派来日本参事官掌握了全权，旗市长成了傀儡。

伪兴安北分省公署的主要成员情况

省长凌升；参与官中村撰一（1932年不曾在海拉尔）；秘书长有三人：华林太、于贾明、乌如金布；总务厅长荣安；民政厅长奇布僧格；总务科长双海；会计科长葆定；地方科长苏勒平嘎；劝业科长德春；文教科长达嘎苏；警务科长春祥；视学官何泽荣，科长春祥。

1933年省公署警务科被取消，成立了归公署管辖的海拉尔警察局，局长是原地方科长苏勒平嘎（乌格吉布去充任了地方科长），副局长是一名日本人（忘记其名）。1935年撤消警察局成立了省直辖警务厅，春德为厅长，以后都由

日本人当厅长。警务科长是坂水梧郎，保安科，司法科，特务科长都是日本人。

1936年4月日本侵略者杀害了凌升为首的四名官员。此外，许多人被捕受严刑和审讯，许多官员被撤职。其人员变动情况是：省长由额尔钦巴图担任（原东新巴旗旗长）；警务厅长坂水梧郎；警务科，……；总务厅长巴嘎巴迪；总务科长是日本人；民政厅长×××；地方科长日本人；劝业科长春祥（后改为兽医科，畜牧科，1939年又改设建设勤劳奉仕）；文教科长何子贞；秘书官哈达（哈达去日本后色旺）；任参与官的有伊藤，中村撰一，河内由藏，森田正男，马儒信一，大园等等。

1940年兴安北省（1934年将兴安北分省改为兴安北省）公署又增设了开拓厅厅长叫福岛（日本人）。开拓厅有四个科，建设科科长日本人，牧业科科长是佐村惠利，畜产科科长是日本人，兽医科长是卓德巴。

伪兴安北省警备司令部是1933年建立的，起初的机构是下设四个处：参谋处处长寺田利光；参谋长有乌如金、福令、丹巴、正珠尔扎布；副官处处长朝德那木；军事处处长占布拉。乌如金不久提升司令，嗣后由郭文林继任司令。伪满司令部成立的同时把伪兴安北省军编为第七第八

两个团，八团驻满洲里，七团驻海拉尔。强迫呼伦贝尔牧区青壮年入伍充军。八团团长为丹巴，布胡高勒为七团团长。1937年伪兴安北省警备军与兴安东省警备军合并建立伪第十军管区。

其后海拉尔成立了宪兵队、军医院、通讯队、协合会、日本特务机关、兴农合作社、满洲畜产株式会社等机构。

二、在日本侵略者殖民统治下，伪兴安北省的大事纪实

1、日本侵略者在海拉尔驻扎了关东军第二十三师。该师的司令是多年研究苏联的专家名叫小松原道太郎，是中将军衔。二十三师在海拉尔市周围构筑了庞大的工事。第一个堡垒是在海拉尔以北高坨子，在地下用钢筋水泥筑成的坑道堡垒；第二个堡垒是从海拉尔火车站的地下向西高岗（安本松）延伸的地下堡垒；第三个是海拉尔西南方安本松以南的地下堡垒；第四个是海拉尔东山下的地下堡垒；第五个是海拉尔市南八公里处，铁道南的坑道堡垒。这些堡垒都在地下用钢筋水泥灌筑成的，内有电灯电讯设备。挖掘出来的土方部分用于市内伊敏河两岸的防水坝上了。1934年，将呼伦贝尔人民供奉祭祀的安本敖宝夺去，作了特大地下堡垒。又将海拉尔

东南三十五公里处巴彦汗敖宝夺去，作了很大的地下、地上堡垒。并从海拉尔把电话线接到该地，从兴安岭北的博特儿山至海拉尔间大修军用公路，并在山上修筑了工事。

修筑这些堡垒的劳力都是从东北、华北各地抓来的劳工，为了“保密”，竣工后将劳工全部杀掉。劳工尸体埋入安本敖宝附近的大坑。这就是人们说的“万人坑”。1940年夏，在巴彦汗山筑堡劳工十几人潜逃到锡尼河木吉哈，被日寇追上抓住，当场砍头杀害。

2、1939年5月到9月，日本关东军大动兵力，在哈拉哈河挑起战端，引起诺门汗战争。关东军司令官命令驻海拉尔第二十三师师长小松原道太郎，并调动伪满军队，沿呼伦贝尔东新巴旗的正蓝旗（现在的乌布日宝力格高苏木）的诺门汗布日都附近渡过哈拉哈河，向蒙古的巴彦查干山进攻。在这次大规模战争中，日本虽调动空军、骑兵、步兵、装甲坦克兵、炮兵，但被蒙古和苏联红军打得落花流水。为此关东军司令部命令荻洲立平所指挥的日本第六军几万人的强大兵力，伪满第十军管区的第七和第八团，大炮营等，再次进攻。因大部兵力被歼，无奈于9月15日宣告停战。在这场战争中边境群众蒙受了重大损失。

3、1936年4月13日，日寇宪兵队逮捕了伪兴安北省省长凌升、兴安北省警备军参谋长福令、警察局长春德、省公署秘书长华林太，送到新京（现长春）以“通蒙通苏”罪处死。还逮捕了伪兴安北省的沙德勒图、倭信泰、荣安、双海、额尔很巴雅尔等十多名工作人员，经日本宪兵队惨打用刑之后，对有的人判刑，把大部分人释放解职让日本人去充任了他们的职务。

从1938年始，给满十八岁以上的男女都发“居民证”。外出必须向当地警察所申请。加紧了警察统治，各所都由日本人当所长掌管一切。

1939年夏天，防守辉河桥的哨兵在光天化日之下，抓住牧民丹巴·额尔德尼无缘无故的就把他活活打死了。

1943年，日本特务上牧赖三郎，给索伦旗（今之鄂温克族自治旗）辉苏木几名青年牧民扣上反满抗日的罪名而逮捕入狱致死。

1943年2月，满洲里的日本宪兵队会同东新巴旗伪警察，先后逮捕了东新巴旗镶白旗（今之嘎拉布尔苏木）的佐领占布拉，藏族活佛沙拉嘎拉萨，苏木秘书希拉呼，索德那木丕勒，南吉德，劳布僧喇嘛等十八人。原因是这些人经常在苏联边境附近游牧（本来镶白旗的游牧区有史以

来在此地）。因此就说他们与苏联联系，押到满洲里的日本宪兵队牢狱严刑审问。后来几人被杀，又有几人死在狱里，有的直到解放时才从狱中出来，有几个人至今下落不明、无疑是也被杀掉了。

4、日伪利用宗教和推行奴化教育，实行愚民政策。

日本侵占呼伦贝尔后，各旗、苏木、乡里都建立了小学，1937年前后，在海拉尔成立了三所四年制的中学（第一、二、三国民高等学校）。第一所国民高等学校招收蒙古、达斡尔、鄂温克等少数民族学生，主要教牧业课。第二国民高等学校招汉族学生，以商业课为主。第三国民高等学校则招俄罗斯、塔塔尔族学生，这是把所有的中学合并改建的。这些学校均由日本人掌管，以日文为主课。中学毕业后，有的考入高等学校或去日本留学，进一步深造。这些人必须为日本殖民统治服务。但是，解放后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改造了思想，参加了革命，为革命为人民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日本人为了利用宗教迷信愚弄人民，在海拉尔建立了神社、东本愿寺等庙宇，招来了一些少年喇嘛，对他们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教育后，从中选拔一些人到日本高等宗教学校学习。如敦道格、巴拉珠尔、达和巴敖其尔等人就是这样去日

本学习宗教的。

1941年，日本在呼伦贝尔东新巴旗那木古如山建立了一所新庙（时轮金刚佛曼陀罗庙）。其目的是利用宗教迷信愚弄人民外，还进行反共宣传。这庙是在日本特务机关指导下，从伪满国库出三十万元，从伪兴安北省职员工资里按百分比扣留外，又从牧民、喇嘛，庙仓收集经费建成的。建成后举行了大规模的那达慕大会。在此庆典上，除兴安北省省长和第十军管区司令官外，日本的军政官员多人参加。借此机会，海拉尔协合会的头头们大肆进行反对共产党宣传活动。

5、经济方面的掠夺

日本对大兴安岭的森林资源早已垂涎三尺，从日寇侵占呼伦贝尔起，就开始掠夺了森林。根据帝俄与国民党政府签定的四十余项不平等条约中由白俄资本家沃伦索夫经营兴安岭森林（这是有争执的，有关森林资源）的规定，日本侵占后，利用这个老奸巨猾贪得无厌的资本家沃伦索夫，通过他砍伐了兴安岭森林。白俄在东北修铁路时，从扎赉诺尔到扎罗木得路旁的樟树林之采伐就是沃伦索夫插手干的。其次他把乌奴尔、免渡河乌勒希一带的落叶松林，红花尔基的樟子松，伊敏河上游的塔尔气、牙多尔、善都尔等地

的落叶松砍伐殆尽。日本勘察大兴安岭森林资源后，从牙克石向东筑路，开始大批采伐工作。又将维纳河上游高地的落叶松林全部毁掉了。由于侵略战争消耗太大，连桦树皮都叫他们扒光榨油了。

从1937年开始征收呼伦贝尔牧民的牛、马、羊。是由日本经营的满洲畜产株式会社征收，除征收肉牛、羊，军马外，征鼻疽病马到林区拉套子，死了就扔掉。海拉尔有一处林兼屠宰场，杀完牲畜专为军用。日本起初征牲畜数并不多。1939年诺门汗战争开始以后从征收每户牲畜的5%，提高到征收10%——15%，羊毛、皮革、牛奶无不征收。将牧民的坐骑也征来做军马。不能完成被征收的数或种种原因不按期交的话，以违反“非常时期经济惩罚条例”来威胁。因此，诺门汗战争时期，日本掠夺牧民的财产，无代价征收牧民马匹做军马，征收肉牛当军队给养，抢夺城市居民的车马、汽车运输军用物资，强迫牧民拣粪打柴往军营送，抢寺庙喇嘛的毡房拿到军营里铺用，搜去牧民的水缸做军用，强叫牧民向军营送水等等。牧民的财产损失与所受的苦是无法计算的。1932年，呼伦贝尔的牲畜有二百万头匹，1940年已减到一百二十万，1945年仅剩有七十万头匹。起初按马的匹数比例征军马，三河马日军骑，当地蒙古马则给伪兵骑。后

来无所谓比例，派伪警察从马群中不管谁的随便抓。1945年夏，日本军官由佐大佐，将索伦（今之鄂温克旗）的哈尔嘎那牧场的马群集中起来，不管谁的任意乱抓，并威胁说："如果你不给，就拿机枪扫射"。

配给粮食则不给细粮，只给苞米高粮，还不足量，牧民受尽饥饿之苦。布匹缺乏，竟给更生布，穿不了几天就坏。身光肚空一件衣服几人换穿，牧民无论冬夏都穿皮袄。按羊数收羊毛，牧民无法做毡，只得在破烂包里过冬，受尽了寒冷之苦。后来连羊头骨都收，据说取羊脑浆配药给飞行员注射用。

6、有压迫就有斗争

1939年，东北抗日联军在呼伦贝尔格尼河和伪警察队作战，使警察队投降，缴获了兵器和马匹。1940年10月，王明贵同志领导的一支部队，来呼伦贝尔和敌军激战，打死一个少将，取得巨大胜利。以后由王明贵、王钧同志领导的部队在绰尔河畔夜战中，又打死一名敌军少将。1941年冬，王钧同志领导的部队，占领伊列克得东第二十六林场，缴获了衣服、粮食。又到大兴安岭小二沟、阿里河等地发动当地的鄂伦春族群众参加抗日活动，鄂伦春首领盖山给抗联以很大的支持。抗联到牙克石南扎敦河，夜袭伪军一个连和

二十余名日军，缴获不少长枪、机枪、全鞍马一百余匹。

诺门汗战争时期，伪满汉、蒙、达、鄂温克等各族军人，不愿为日本卖命，好多人起义，离开战场进山。

学校学生不愿受日本的奴化教育和日本人的压迫。如兴安北省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自发地掀起反抗日本人的运动。小学教师荣禄，发表反满抗日言论，临危不惧；青年牧民恩和·达木丁宣传日本凶暴情况，并在1934年冬，于锡尼河努图克哈尔嘎那牧场的一个牧民家召集一些青年秘密谈话，被一个叛徒报告了日本特务，日本特务领走狗来抓，青年们虽趁夜黑逃脱了，但有进步思想的青年恩和·达木丁为了掩护弟兄与敌战斗，壮烈牺牲。

1945年8月9日，伪满第十军管区三千多名官兵，在索伦旗（今之鄂温克旗）锡尼河地区杀掉日本军官后，举行起义。

附：提供兴安北省情况作者简介

额尔很巴雅尔，达斡尔族，现年七十五岁，１９３２年建立兴安北省时为该省民生科雇员，１９４５年解放时为该省民政科科长。

色尔森太，达斡尔族，现年七十三岁，１９３３年为兴安北分省综合科雇员，１９４５年解放时，任该省开拓厅兽医（高等官）。

那森嘎，达斡尔族，现年七十一岁，１９４０年任兴安北省卫生科雇员，直到１９４５年解放，在该省工作。

阿必德，蒙古族，现年七十二岁，呼伦贝尔盟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河西苏木人，１９３３年任伪鄂温克旗公署雇员，自１９４７年历任西苏木苏木达，鄂温克族自治旗畜牧局局长，呼伦贝尔盟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盟政协副秘书长，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

伪满兴安东省政治机构

高纯德

日本侵略者为了实现其侵略野心，于1932年3月1日，令清朝末代皇帝宣统（溥仪）在新京（长春）成立了满洲国。定为所谓的民主立宪国，起年号大同。在伪国务院直辖下设立了兴安局，局长扎嘎尔。同年四月五日建立了兴安省，省公署设在莫力达瓦旗的布西。兴安省归兴安局领导，间接归伪国务院领导。

大同二年（1933年）伪满洲国又在扎兰屯成立了兴安东分省；在巴林右旗的大坂上成立了兴安西分省；在王爷庙（乌兰浩特）成立了兴安南分省。在海拉尔成立了兴安北分省。兴安局管理兴安东、西、南、北四个分省的事务。

1934年3月1日，爱新觉罗·溥仪在日本关东军、蒙古王公、上层的推举下登极当了伪满洲国的皇帝，改年号康德。

同年，国务院将兴安四个分省改为兴安东、西、南、北四省。扎兰屯是兴安东省省公署的所在地，也是布特哈旗旗公署的所在地。

兴安东省下设五个旗。在扎兰屯设立了布特哈旗，在红花梁子设立了阿荣旗，在索伦设立了

喜扎嘎尔旗，在布西设立了莫力达瓦旗，在额尔河设立了巴彦旗。

兴安东省的行政机构是：

省公署；

省公署下设总务厅、民政厅、警务厅；

总务厅下设庶务科、会计科、地方科；

民政厅下设开拓科、民生科、保健科、劝业科、土木科；

警务厅下设警务科、特务科、指纹管理室。

兴安东省省、厅、科长是：

兴安东省第一任省长额勒春（1934——1941年1月）、第二任省长博彦满都（1941年2月——1944年12月）、第三任省长是日本人（1945年1月——8月）。

兴安东省参事官是日本人中村。

省总务厅长巴金保。

省民政厅长志达图，1943年换金耀洲。

省警务厅长日本人室月一雄。

庶务科长吉尔嘎朗（德古来）、会计科长阿恒泰（敖恒寿）、劝业科长绰克巴图尔（德树元）、警务科长苏瑞海。

兴安东省备警军司令官绰罗巴尔（郭兴元）。

兴安东省下属五个旗。旗的行政机构是：

旗公署；

旗公署下设总务科、内务科、警务科。

总务科下设总务股、会计股。

内务科下设行政股、教育股、财务股。

警务科下设警务股、司法股、会计股。

兴安东省下属五个旗，旗长是：

布特哈旗第一任索×宝（1932年1月——11月），第二任金耀洲（1932年12月——1942年12月），第三任志达图（1943年——1945年）。

阿荣旗第一任都××，鄂温克族、蒙古名白××，第二任乔寿仁。

莫力达瓦旗第一任巴金保，第二任鄂尔德蒙格，第三任仓吉扎布。

巴彦旗第一任绰克巴图尔（德树元）、末任塔利亚图。

喜扎嘎尔旗旗长鄂范五。

省、旗的大、小参事官全由日本人担任。后来，连各科的科长也都换成了日本人。

从1943年（康德三年）始，旗下设努图克（区）。

努图克下设民籍系、庶务系、国兵系、司稽…

努图克任有努图克达（区长）。

努图克下有嘎查（乡），嘎查设嘎查达（乡长）。

兴安东省有二十二个努图克，一个办公处。其

中：

布特哈旗有：恩和、巴音、乌尔吉、济沁河、博克图努图克。

阿荣旗有阿荣、图布新、格尼努图克。

莫力达瓦旗有葛根、讷青、芙登、耐勒图、鄂伦春努图克。

巴彦旗有莫尔根、腾克、阿木尔、巴彦、多普库尔、甘奎努图克。

喜扎嘎尔旗有索伦、哈海、兴安努图克。

布特哈旗扎兰屯办公处。

兴安东省有八十一个嘎查，十一甲，即：

布哈特旗，扎兰屯办公处1——11甲。嘎查是：恩和努图克有徐地营子、卧牛河、哈拉苏、齐齐哈尔嘎查。

巴音努图克有大河湾、尖山子、新站嘎查。

乌尔吉努图克有雅尔根楚、霍拉果气、务大哈气嘎查。

济沁河努图克有蘑菇气、太平川、库堤河、萨马街嘎查。

博克图努图克有博克图、雅鲁、巴里木、二道河子嘎查。

阿荣旗，阿荣努图克有红花梁子、二道沟、兴隆山、吴发化、黑信、向阳峪、音河嘎查。

图布新努图克有那吉屯、骆驼山、兴隆沟、

查边奇嘎查。

格尼努图克有镇威庄、千家户、牧隗山、格尼河、沃尔会河、溥力克嘎查。

莫力达瓦旗，葛根努图克有尼尔基、宜卧奇、大英丁、大田社、兴仁屯、哈力沁、乌尔科嘎查。

讷青努图克有博伦、西拉金、力英丁、都尔本、汗克尔河嘎查。

芙登努图克有登特科、多西沁、阿彦沁、托尔苏、库木尔、西瓦尔嘎查。

耐勒图努图克有阿尔拉、喀牙都尔本、太平桥、五家子、库如奇、兴隆堡嘎查。

鄂伦春努图克有努敏河、格尼河嘎查。

巴彦旗，莫尔根努图克有额尔河、讷青、陈化、那文、哈里嘎查。

腾克努图克有怪勒、穆克登嘎查。

阿木尔努图克有特克西、郭恩嘎查。

彦努图克有萨彦嘎查。

多普库尔努图克有多普库尔嘎查。

甘奎努图克有甘河、奎勒嘎查。

喜扎嘎尔旗，索伦努图克无嘎查。

哈海努图克有和勒门、乌敦、草根台嘎查。

兴安努图克有五叉沟、牛汾台、草根、白狼嘎查。

１９３４年（康德元年）１１月，日本侵略

者为适应其殖民统治和掠夺资源的需要，将伪满中央政府不断扩大和改组，将伪国务院的兴安局扩为蒙政部，齐默特色木丕勒任大臣，日本人依田四郎任次长。1937年（康德四年）5月8日废除蒙政部，由伪国务院的兴安局管理兴安四省的事务。

与此同时，地方机构也不断扩大与改组。1940年(康德七年)3月1日以后，兴安东省各旗的努图克都有很大的改组和变动，原来的嘎查升格为努图克。以布特哈旗为例，撤消了恩和、巴彦、乌尔吉、济沁河、博克图五个大努图克，成立了徐地营子、卧牛河、哈拉苏、齐齐哈尔乡、大河湾、夹山子、成吉思汗、雅尔根楚、霍拉果气、务大哈气、蘑菇气、太平川、库堤河、萨马街、雅鲁、巴里木（巴林）、二道河子努图克，扎兰屯街公所，博克图行政公署。努图克下设爱里（村）。如霍拉果气努图克下设青龙、聚宝、永和、大甸子、东德胜、西德胜等爱里。

兴安东省全省面积六万六千七百四十八平方公里。1939年（康德六年）统计，全省有20,823户，人口136,225人，其中日本人839户，2,377人。总耕地面积为约11万公顷。1940年（康德七年）统计，全省播种面种为146，833公顷。这里地域辽阔、水草丰美、森林茂

密，宜林、宜牧、宜农，是块美丽富饶的好地方。

日本关东军为了统治这块地方，奴役这里的人民群众，在兴安东省各地设立了警察署、法院和检察院。1940年（康德七年）在布特哈旗境内就建立了三处警察署，三处警察派出所，十一处警察分驻所。在巴彦旗建立了一处警察派出所，六处警察分驻所。在喜扎嘎尔旗建立了三处警察分驻所。阿荣旗建立了四处警察分驻所。在莫力达瓦旗建立了三处警察分驻所。共有警察二百七十九人。其中警佐九名、警尉二十七名、警尉补四十六名、警长和警士一百九十七名。

兴安东省还设有森林警察机构。有六十五名森林警察，其中警佐一名、警尉二名、警尉补八名、警长九名、警士四十五名。

各旗公署所在地设地方法院和地方检察院。省公署所在地（扎兰屯）设高等法院和高等检察院。

警察署、法院、检察院的主要负责人全由日本人担任。

1937年1月4日以满洲国皇帝敕令，颁布了《满洲帝国刑法》，对全东北人民（包括兴安东省人民）进行疯狂的镇压和血腥统治。实行了所谓的大检举、大讨伐、保甲连坐法，归屯并林，大肆搜捕抗日爱国军民，对日伪统治稍有不

满，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杀害。

1943年10月取消兴安四省，成立兴安总省，总省公署设在王爷庙。原来的兴安四省各设一个行政公署作为总省的派出机构。兴安总省直接归伪国务院管辖。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伪满洲国、兴安总省自行崩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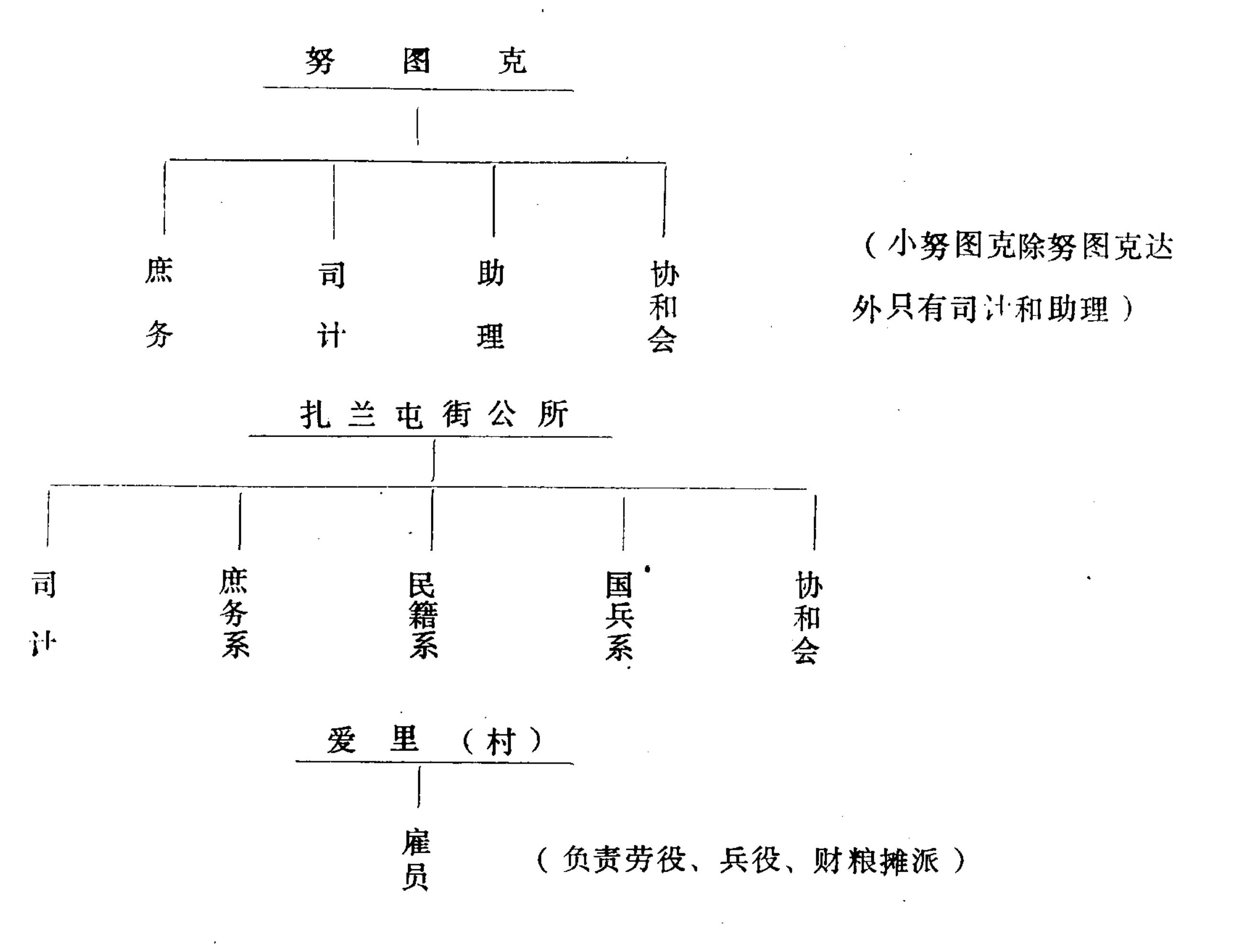
作者：高纯德，57岁，中共党员，历任扎兰屯市文化馆副馆长、曲艺团团长、人民电影院副经理。现已退休。

伪兴安东省行政机构表

- 兴安东省公署
  - 总务厅
    - 庶务科
    - 会计科
    - 地方科
  - 民政厅
    - 开拓科
    - 保健科
    - 土木科
    - 劝业科
    - 民生科
  - 警务厅
    - 警务科
    - 特务科
    - 指纹管理室

旗公署

- 庶务科
  - 庶务股
  - 会计股
- 内务科
  - 行政股
  - 教育股
  - 财务股
- 警务科
  - 警务股
  - 司法股
  - 会计股


努图克
庶务
司计
助理
协和会
（小努图克除努图克达外只有司计和助理）
扎兰屯街公所
司计
庶务系
民籍系
国兵系
协和会
爱里（村）
雇员
（负责劳役、兵役、财粮摊派）

作者：高纯德，男、57岁、中共党员，历任扎兰屯市文化馆副馆长、曲艺团团长、人民电影院副经理。现已退休。

日伪时期兴安东省的黑暗制度

高纯德

伪兴安东省当时总人口为十三万六千多人。其中布特哈旗五万七千三百多人，喜扎嘎尔旗一万二千八百人，阿荣旗三万零一百多人，莫力达瓦旗两万四千九百多人，巴彦旗九千九百多人。

伪满时期，日本人将汉、满、蒙、回、鲜都称"满人"。满人在政治上受压迫，在经济上受剥削，过着亡国奴的生活。现将日伪在伪兴安东省推行的黑暗制度介绍如下。

一、粮谷出荷：

在新京（今长春）伪满中央设立兴农部，在旗县设立兴农合作社。兴农部和兴农合作社的工作任务就是抓粮谷出荷。

旗兴农合作社内设立信用、事业两部。

信用部的任务是春天为农区做产粮计划，根据计划发放春耕贷款，秋后打完场本利收回，名曰救济，实则为收利。

信用部人员帮助各户每户种多少地？都种什么作物？能产多少粮？所产的粮能出多少钱？把上述计划写出来，他按收入比例发放贷款。信用部人员将算出来的产粮收入表转交给事业部。

事业部人员冬天收粮负责检斤过秤，收出荷粮。事业部另一部分人员下乡催粮。小麦不许满人用，全部收缴，苞米、谷子、大豆、高粱去了来年的口粮、种子，一律收为出荷粮。伪满开始那几年还少给留点粮，以后，农民去了口粮、种子全收为出荷粮，一点也不给留。交了出荷粮，分为一、二、三等按等还给几个钱，但不多。有人交不起出荷粮，便被吊起来毒打，或加更严的刑。有些农民吃苞米橡子混合面大饼子，还吃捂苞米面或带谷子粒的小米子。尽管农民生活那么困苦，爱里达（屯长）、警察、努图克职员还常到农民家查仓催交出荷粮。

交了出荷粮，按粮数多少，发给蓝布、白布、黑布，发给豆油，有的地方还发给棉花。

二、派、抓劳工：

伪满中央设有勤劳部，兴安东省各旗设立了劳务兴国会。

勤劳部和劳务兴国会的工作任务是派、抓劳工和管理勤劳奉仕队。

各努图克也设有专人抓劳工和勤劳奉仕。

布特哈旗劳务兴国会的团体负责人是谢德祥，各旗劳务兴国会的会长都是日本人，次长为满人担任。

劳工的分摊办法是一派二抓三骗。

旗里把劳工任务下达到努图克，努图克再将任务分派到爱里（屯），爱里达（屯长）将劳工派给劳力多的，哥俩或哥三去一个；另外爱里达可派与他关系不咋的人去当劳工；或者派给四、五户可出个劳工。这样，这四、五户可出钱雇一个劳工。有钱人要是摊着劳工，即出钱雇个劳工去完成任务。

如果将劳工派下去，派到谁头上不去，警察就来抓，抓着装瓦罐车送到工地，劳役期满才能回家。

勤劳部、劳务兴国会下来的任务紧急，工程量又大，靠派、抓的劳工完不成任务，负责劳工的官员便到山东、河北，以多给钱的名义招工，骗来兴安东省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基本不给钱。所有劳工吃的都是橡子苞米混合面，吃些捂苞米面，又吃带谷粒的小米子，吃的人面黄肌瘦，还染上了疾病。许多劳工连累带饿死在工地。

勤劳奉仕：

伪满年到二十、二十一岁，就到努图克国兵系、旗里检查身体。检查合格的就去当国兵服兵役，检查不合格的便是国兵漏，叫勤劳奉仕队，每个队员服劳役三年，每年劳役六个月。兴安东省的勤劳奉仕队全修公路和炼桦皮油，每年干六

个月。

勤劳奉仕队劳动不给钱，劳工给点钱也是给极有限的钱。劳工原是给钱，全叫日本和满人劳工头子层层剥皮，剥削去了，有一年一个劳工只得七尺粗布。

对劳工头子民愤极大，1946年秋天，在扎兰屯沿河街小学西，镇压一个姓高的劳工头子，大快人心。

三、配给：

各旗公署的开拓科分农林股、开拓股、工商股三个股，工商股专管城里的配给。配给日本人大米、白面、食盐、白糖、豆油、棉花、好布、烟卷等应有尽有。配给满人的只是粗粮。

城里配给归开拓科工商股，农村配给归爱里达（屯长）管。农民各户到爱里达家领一包火柴，二、三斤火油；每人每月领回一斤盐，一斤豆油，后来豆油逐渐减少，到光复前几年，每人每月给三两豆油。

四、各种专卖：

专卖有专卖机关，专卖机关有专卖制度。专卖由日伪政府专卖而不准个人随意贩卖．康德四年前，伪中央产业部下设专卖总署(在今长春)，各省市设十四处专卖署，各都市设一百余处专

卖局，二百多处专卖分局，办理鸦片、盐、石油、火柴专卖事业。康德五年起改为在经济部下设专卖总局，办理鸦片、盐、石油、火柴专卖事业。

鸦片专卖：鉴于以往的禁烟失败，便于大同元年（1932年）颁布新法。已陷于瘾者，则取警察署之吸烟许可证后，许其吸食。自康德六年一月一日起，凡属公务员均不准吸食鸦片。

鸦片的处理方法，除政府指定之栽培地域外，其他地方禁止种植、贩卖。将种植之收获，完全由日伪当局官价收买，并制成烟膏，然后发给专卖所出卖。

石油专卖品从康德二年四月一日起实行，石油以燃料自给自足为国策。

石油专卖品有挥发油、灯油、轻油、宾斤油。制造和输入石油没有专卖署长许可不得为之。

盐专卖：从康德四年一月起实行。设立盐务署专卖总署，各地设专卖署、专卖局、专卖分局三百一十余处经营食盐。

火柴专卖：从康德四年二月十六日起实行。制造、输出、输入火柴均须伪政府许可后而为之。火柴须政府价收之。

五、妓女院：

伪满时期，有一少部分穷家女孩，一部分有

实际困难或被逼沦为娼妓，造成终身遗恨，噬脐莫及。

日本人还从本国弄来一部分妇女到中国开“料理屋”接待日本淫棍或上层官僚。这就叫日本妓女院。老板是日本人，妓女是日本人，老鸨也是日本人，日本经营方式。

伪满兴安东省所在地——扎兰屯就有十多家个人开的妓女院。

妓女来源甚广。有的是用钱买来幼女，供吃供穿，长到十五岁叫陪客（不破身），长到十七岁破身成为正式妓女；有少数妇女生活无路找到妓院占一个单间挣钱，妓女每月向妓院交一定数量的钱，余下归己，不是终身卖给妓院，愿干就干，不愿干可随时走出妓院；有的妓女挣钱与妓院分成。根据妓女的年令、长相、妓女与妓院挣钱分成。有的按二八、三七，有的按四六，还有的按对半分成；有的妓院生意萧条冷落，为了打开被动局面，聘请外地名妓来院。

六、宝局号；

兴安东省省会——扎兰屯，设立了宝局号。宝局号是官办的，它的盈利很多，搜刮民财，所得利益做为财政收入之一。

宝局号是剥削劳动人民的场所。

七、地主、富农剥削农民的几种形式：

伪兴安东省地主、富农剥削农民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形式有：

1、地主将地租给农民。地主家拥有几十垧、几百垧地（每垧十亩），春天，地主将土地，以一石二斗（每石十斗，每斗七十二斤）租子租给农民。到秋后，农民按自己种的垧数拿粮去到地主家交地租，一是年成不好。遇上了自然灾害，农民交不起租子，地主便派人到农民家收租子，农民交不上租便挨打受骂，实在交不上，写上账，拖延到下年再交，下年本利齐收。有时地主不允拖欠，便告到警察署，将欠租的农民抓去蹲监坐狱，交完租或找好保再放人。

2、农民到地主家给地主干活当长工叫做扛年糟，干一年活的叫长工，临时干几个月的叫短工。富农家雇的人比地主家雇的少一些。

地主、富农为了叫农民多给他干活，便叫长、短工起早贪黑的下地干活。每到铲趟时节，地主给农民增加打头的，上午一个打头的，到下午再换一个打头的，上下午各歇一小气。长、短工一律在地主、富农家的伙房住，不准回家去住，长工一年要劳动三百六十天，中途不许耽误一个工。

3、地主出土地、种子、犁具、畜力，农民出

劳力，到秋后分份儿，有的对半分，有的四六分，这叫做耪青。

4、放高利贷。农民借地主、富农家的钱粮，利息特高，利滚利，息滚息，债台越筑越高。

诺门汗战争期间的伪兴安军概况

鄂秀峰

诺门汗事件是于1939年发生的。当时，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全东北后，进而把战火扩大到全中国，梦想霸占和征服中国的疯狂侵略时期发生的。所谓诺门汗事件是一个不宣而战的战争。双方各动用了近十万人的陆、空军；出动了一定规模的装甲部队，双方各死伤逾万余人。最后以日本认输，惩办肇事责任者和割地而告终。

我当时虽未直接参加战斗，但参加了收容逃散兵的工作，亲历亲闻一些实际情况，现如实地忆述。关于伪军的参战情况，根据本人的见闻和有关人士的回忆录，综合整理，若能为后人研究历史，贡献点滴，将不胜荣幸。

诺门汗事件，已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历史了，回忆记叙上难免遗漏或谬误，希予指正。

第一部份

（一）收容“归还兵”纪实

在诺门汗战争期间，伪兴安军的蒙古士兵，被驱赶到战斗第一线，协同日本军队，参加了对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战争。当时，因不愿当炮灰为

日本人卖命，不愿参加蒙古人打蒙古人的战争，发生了大批士兵逃亡事件。仅在7月6日的战斗中，有三千五百多人的兴安师，逃跑过半，第四团只剩团长以下五十三人，因而不得不撤消该团的番号。面对这一严重现实，为了缓和消极抵抗和民族情绪，伪兴安师师长野村和野田顾问、师参谋长后藤三人，研究决定迅速派阿勇巴图中校等人负责收容逃散士兵，整顿队伍再战。为了解除逃跑士兵的顾虑，促使他们早一些返回战场，重新加入战斗，对逃离战场不远的士兵称为“脱离兵”。经过大力说服劝解，阿勇巴图中校等蒙族军官，截住近千余“脱离兵”重返战场。从逃走较远，而且经劝说不再返回战场的逃兵，不论其大小帮或个人一律称之谓“归还兵”。按伪满陆军刑法规定，凡临阵逃脱的军官或士兵，不问情节，不论主与从，一律处以极刑。这次战斗中，逃亡人多，法不施众，而且为了迅速平息矛盾，这才临时定出了“脱离兵”和“归还兵”之称。

当时，我在王爷庙伪陆军兴安军官学校任教。一切战况都是通过日本和伪满报纸了解到的。据我所知，当时事件的起因是巡逻兵互相射击，继而升到班排级冲突，后又发展成连团级战斗。当然当时的日本宣传工具，连篇累牍地叫嚣苏蒙军首先挑起事端，继而非法入侵，因此称

苏蒙军是"挑衅侵略"者，每天报道的都是"日满军反击成功"、"战果辉煌"，击毁坦克多少，击落飞机多少等等。我当时虽年轻幼稚，但对其战果不无怀疑，而且对战争的逐步升级，甚感忧虑，唯恐被驱赶赴战场参加战斗。

于1939年6月24日，伪陆军兴安军官学校教导团，配合兴安师出征了。伪陆军学校全体军官赴王爷庙车站送行，这使我感到战事已迫近，假如真象报纸报道的那样节节胜利的话，不会有教导团的出征，这就进一步证实了日本的虚假宣传。

7月中旬，伪陆军兴安军官学校组成两个收容班，收容从诺门汗战场逃回的士兵，一个收容班由哈斯巴特尔中校（白云航）带领；另一个收容班是由日本人佐佐木中佐（军事教官、中校）带领，抽调我当翻译，另配备十名士兵。我们收容班从王爷庙出发，沿洮儿河北岸，经巴公府、察尔森、嘎哈台、好仁、索伦、五叉沟前进，在出发前，佐佐木给我们训话，其大意是：第一、碰到逃兵一律称"归还兵"，决不许称逃兵，他们打仗有功，以礼优待，叫他们吃好住好，劝说他们安心归营；第二，不许单独行动，不许打猎放枪；第三，佐佐木自称他带来不少现金，收容到士兵后要好好的慰劳。就这样我们出发了。佐佐木中佐笃信佛教，每到住地，洗漱后就静坐捧读佛经，早

起也是如此。佐佐木中佐有机会时就向我们宣传日本军队如何强大，所向无敌，苏蒙军队不在话下，诺门汗战斗一定能胜利。并给我们讲日俄战争胜利历史和日本出兵西伯利亚（1918年干涉苏联革命）都取得过赫赫战果，这次也一定能打败苏蒙军，另外也大谈一心一意跟日本人走；并说成吉思汗是英雄，征服过欧亚大陆。蒙古人勇敢善战。并大谈人是永生的，不要怕死肉体没有了灵魂尚在，去极乐世界，再去转世投生。对"归还兵"不要怕，日本武士道精神就是不怕死等等。

我们收容班一路沿洮儿河北岸缓缓向西北的索伦方向前进。在第五天中午刚过，就碰到一批从诺门汗战场逃回来的士兵，大约二百多人。他们衣帽不整，有空手的也有带枪支的，而且把武器横扛斜挎在身上；有乘马者，也有步行的，还有不少穿便衣的，真象一群乌合之众的土匪。佐佐木中佐看见他们又挥手、又大喊大叫的催马迎上前去。他用日本话大叫："停下停下，站住站住"。逃兵中有一名上士班长手提匣枪，直指佐佐木中佐问：你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他是军官学校的军事教官，现在是收容班长，是来召集你们回大营的，这个上士班长骂了一句，一挥手就绕过佐佐木跑了，后边的也陆陆续续跟着走了。佐佐木领着我们也紧跟在这个上士班长后面追了上去。

到达好仁格热，这个班长下令住下。他远离我们住进了一家。佐佐木赶紧派人去买猪买鸡分发下去，表示慰劳"归还兵"。然后派人请领头的班长谈话，但他们根本不理。为此佐佐木只好领着我亲自到他们住处，头目共四人，有一名上士，三名中士。佐佐木一进屋就向他们讨好说："你们打了胜仗，带回这么多"归还兵"，有功劳。否则单独行动的话一定有不少回不来的"。继而欺骗说："日本关东军大部队离这不远了，马上就要赶赴诺门汗前线，而且又说："兴安军和日本军在诺门汗已打到哈拉哈河"。并向他们宣传："归还兵"再不用去前线了，收容班领你们回大营，假如不听话乱走乱跑，被日本大部队或警察抓住后，一定会交军事法庭审判。如果和收容班一同回去，一定受到热烈欢迎，一个也不受处分，因为你们是打仗回来的"归还兵"，不是逃跑等等。后来这四人答应和大家一起研究研究，并要求收容班不许出村，四处都布有岗哨，出村打死不管。这四个班长中有一个中士我认识，叫郭来福是达族（当时叫达斡尔蒙古），和我侄子同学，他送我到大门口后，我们站着谈了一下。他说我侄子被飞机扫射死了，并说这仗没法打，没有吃的多日喝不到水，尽是沙土一挖坑就塌，没有掩避之处，见不到敌兵，不是大炮就是

飞机轰炸，而且坦克很多，咱们的炮打不到敌军就半途炸了。因此不能只等死，所以大家回来了。他悄声问我，会不会抓他们？我告诉他放心，顾问泉铁翁都亲口说是“归还兵”，不是逃兵，不会说话不算数的。郭来福拿出一张苏蒙的传单，上面有两张照片，一个叫德力格，伪军少校，原兴安师五团团副（副团长）；另一个是上尉叫旺吉勒，原五团的连长，这两人我不认识。传单上印着他两人的讲话，大意是：他二人自动投奔了苏蒙军，叫士兵们打死日本人，投过去或回家去，不要再受日本人的欺骗，更不要蒙古人打蒙古人，别为日本人卖命当炮灰，日本人输定了等等。我劝他赶紧烧掉，别叫日本人看见，对其他士兵手中有的，也赶紧烧掉。第二天佐佐木又领我找那四个领队的班长说：你们一路辛苦，再好好休息一两天，洗一洗，理一理。并说又买了不少肉和鸡，把马喂好后再回去。问他们有什么意见？他们四人提出同意回王爷庙，但是第一，保证他们的安全，一个不抓，一个也不受处分；第二，这帮人不能散，不回原单位，单独编一个连，而且连排长由他们担任；第三，发给马匹、武器、衣服。收容班长佐佐木中佐全部答应了要求，同时佐佐木也提出一条要求：即出发归队时要排队，象军队的样子；枪要背上，衣帽要戴

正，尽量不穿便衣（实在没有衣服者可以）；一路不许乱放枪，否则日本军队就会误会。“归还兵”的带头人要佐佐木和他们同行，不许离开，怕他们说话不算数。在好仁格热住了两天，早晨出发时队伍比较齐整了也排队了。在归途中走了十多人，但又收容了七八人。在第五天中午到达了查干朝鲁，离王爷庙只有二十多里路。顾问部的增田上尉带着不少慰问品等在该处，有大米、白面、粉条、肉类，还有毛巾、牙刷、牙膏、肥香皂等。增田上尉代表泉铁翁顾问向大家特别是向领头的班长道劳。领头归队的班长当着佐佐木、增田的面又说了一遍回队的条件。增田表示同意，但认为必须请示顾问认可，很快予以答复，于是他走啦。午后增田上尉又返回“归还兵”住地，带来了泉铁翁顾问不予处分的手信，但提出必须去原教导团营房，因为教导团已出征，营房空着，别处没有营房。“归还兵”同意后，排列整齐进入王爷庙市内。伪军校的全体军官列队鼓掌迎接了他们的归来。进驻教导团大营后，佐佐木中佐和增田上尉和他们住在一起。我的使命业已完成，回到原教学岗位。后来得悉，在某一天晚上，全营息灯后，来了一队宪兵突然包围了营房，解除了武装，抓走了八人，后来留下三人未放，下落不明。把这批“归还兵”造册登记，遣

返原单位，据说后来都复员回家，看管劳动去了。

（二）其他“归还兵”的结局

1、哈斯巴特尔（白云航）收容班

哈斯巴特尔收容班和我班同日从王爷庙出发，他们沿洮儿河南岸，经归流河、大石寨、乌兰毛都、索伦方向前进。到达索伦西南方的乌兰毛都附近时，碰到了五六百人的大帮逃兵。他们的领头者是原教导团的中士班长小喇嘛。哈斯巴特尔中校多次请他来见，或亲自去其住地，均不予接见。只派他副手来谈条件和要求，表面同意归队，其条件也不高，使收容班抱着很大希望。就这样和收容班周旋了三、四天后，乘晚上天黑之际，小喇嘛亲自带领其亲信近三百人出走，哈斯巴特尔中校虽然得知，也末敢追赶，只向顾问部打了报告。把余下的二百多人好说歹说劝回到归流河，又接到不少顾问部的慰问品。对这批“归还兵”也是关心备至，后来也劝回驻进教导团营房，并且也遭到了解除武装、逮捕首要分子的命运。

2、关于小喇嘛

小喇嘛本人有前科，因私贩牛羊皮，以违反皮革统治法，被宪兵队关押过。这次又是他领头

带大帮逃跑，因此不敢归队。在宝格达敖拉，碰到阿勇巴图中校，劝他转回战场，小喇嘛明确提出来再不为日本人卖命了，没吃没喝再回战场准被打死。率领一帮人走了。在乌兰毛都也未被哈斯巴特尔中校说服，带领其亲信三百多人窜入科右中旗境内的吐列毛都、六户、宝石沟等处流窜活动，收罗散兵惯匪，人员增加到五百多人。他们到处抢劫奸淫，完全变成了土匪。1939年11月，兴安南省警备司令部派达理扎布上校和关雅亭少校去科右中旗招抚小喇嘛部。由于天气渐寒日满和苏蒙已停战，再继续当土匪危险大，因此小喇嘛提出愿意按收回营改编，只要一个不杀一个不抓就可以。得到了同意的保证，叫小喇嘛进入通辽市。后来被解除了武装，逮捕了十七名头目，于1941年春开了大型军事法庭会，审判了死刑。当时的各种报纸都报道了这一事件。后来于1945年8月，胡和巴图尔上校亲口转述了当时的情况，他说：小喇嘛等人虽被判处死刑，可是当时的金川顾问留下三人，为他当了特务，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搞间谍活动。这是胡和上校亲自碰到小嘛喇，小喇嘛亲口告诉胡和巴图尔上校的。

（三）诺门汗事件余波

1、突击搜查王爷庙全市区

诺门汗事件大约于1939年9中旬停火，日苏进行谈判。于是年十月上旬，我在伪陆军兴安军官学校任教期间，正值周班（值日一周），晚七点左右全校紧急集合，然后让学生回宿舍待命，留下了部分值周军官。同时来了宪兵警察，由当时的学校干事长宣布，要执行紧急任务。据说在王爷庙市区潜入不少苏蒙特务和逃兵，为此要进行大搜捕。由科右前旗警察署长（警正）统一布置，听其指挥。警察署长把市区划分很多区由警察宪兵在各区内检查搜捕。我们在市区各街道设卡、巡逻，我带领十人被分到北上坎居民区街道巡逻。午夜十二时同时动手搜查，不问机关学校，见门就进，见可疑无证明者一律带走。那一夜弄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早六时收兵时抓来约几十个人，据说后来审查，留下近二十人交给宪兵队了。我们巡逻街道的一个也未抓到。以后告状者不少，因入户检查的警察宪兵顺手牵羊，抢劫盗窃了不少居民的财物。

2、驻防林东伪满军的叛乱

在诺门汗事件中，伪兴安师被彻底打垮，其逃兵散勇到处流窜，谣言四起，说苏军早已进入王爷庙，伪满洲国就要垮台了等等。

驻防在林东的伪兴安军第六团的第三连和机

关枪连二百多名士兵，不堪日本连长的打骂虐待，全部叛变了。领头的叫聚宝是上等兵，他们杀死了王秀兰上尉，去查干庙、黄羊洼等地后又进入科右中旗北部等地。后来被洪景祥中校收编，在阿鲁科尔沁旗查布干庙街被日本人德永恭助上校率部突袭全部俘获，当场枪杀了十八名头目。

到1940年1月，才把反抗的军队镇压下去，扑灭了反抗的明火。

不论是“归还兵”或者“叛乱兵”和“脱离兵”普遍反映出蒙古士兵反对战争，反对日本侵略者惨酷统治的民族斗争精神。另一面，也说明日本人用欺骗手段和勾结少数蒙古上层分子，为其效劳，才使日本人达到迅速镇压的目的。“归还兵”、“叛乱兵”、“脱离兵”都没有统一的领导，没有政治目标，从而落为流寇，给人民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这也是必败的主因之一。

第二部份

在诺门汗事件中的伪满军参战概况

我没有亲赴战场，后面的资料是当时个人的亲闻以及向参战的老人们请教和参阅了参战人员的回忆录编写的，只供参考。

日本侵略东北后，认为中国软弱可欺，胃口

越来越大，继而进攻华北，再攻华中、华南，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抗战烈火。因为中国幅员辽阔，日本军国主义甚感力不从心。不得不培植伪军为其守卫次要方面。这就是伪军的由来。在伪军中，日本侵略者想建立部分骨干队伍，补充其军力之不足。为此，于1938年5月，把伪靖安军升格为主力师。同时日本人又从伪兴安军（以蒙族、达族为主体）里挑选出部分“优秀”官兵，组建了兴安师。当时日本关东军在编制装备等方面，使它优于其他部队，而主要指挥官，也由日本人担任。

（一）伪兴安师的参战概况

兴安师始建于1938年秋。师司令部在郑家屯。任命野村登龟郎中将为师长（日本现役军人，陆军大学毕业）；野田中佐为军事顾问（日本关东军特派人员）；参谋长叫后藤外马上校（日本人）；师司令部的参谋、副官等多系日本人。虽把师司令部的架子搭起来了，然而军官、士兵都从各部队调入，绝非易事。直到1939年6月初，调来的人员才基本就绪。

1、新组建的兴安师，归第九军管区（也称兴安军管区）领导。军管区司令官叫巴特玛拉布旦上将（原扎赉特旗王爷）。

兴安师下辖兴安骑兵第四、第五、第十二团（三个骑兵团），兴安炮兵团、迫击炮团、独立骑兵连、通信连、野战医院。参加诺门汗战争时又配属了一个骑兵团，即陆军兴安军官学校教导团。并且配属了一个汽车队（三十台卡车，三台装甲车）。当时在伪军中属于第一流装备师。

兴安师的各团的指挥官绝大部分是日本军官。第四团团长高桥上校（日本人）、团副木村少校（日本人）；五团团长秦焕章中校（蒙古人），团副吉野少校（日本人）；十二团团长田中上校（日本人），团副井上中校（日本人）；教导团团长金永福上校（达族），团副滓田中校（日本人）；炮兵团团长平川森上校（日本人）；迫击炮团团长中野上校（日本人）；独立骑兵连连长小林少校（日本人）；其他连排伪军官三分之二是日本人。

2、伪兴安师属于甲种编制。一般警备团下属四个连。而兴安师每团骑兵三个连。机枪（九二式重机）一个连。速射炮（三十七毫米口径）一个连，共计五个连。机枪连有四挺重机枪；速射炮连有四门连射炮。骑兵连和排都是四四制。每排有两挺轻机枪，两门掷弹筒。兴安师炮兵团有四一式山炮八门，克山式山炮四门，迫击炮团有重迫击炮四门，轻迫击炮八门，从武器配备来说，

在当时仅次于日本军。

3、关于伪兴安师参加诺门汗战争的总人数问题，其说不一。据当时担任过兴安师司令部参谋，而且参加了战斗的胡克巴图尔少校认为，参战总人数为四千五百人；而当时在日本关东军任作战参谋的适政信少佐（陆军大学毕业）的回忆录(1950·7）中认为兴安师参战人员总数为二千九百三十六名。然而临时配属的梁濑汽车运输队和到现地作战实习的伪陆军兴安军官学校少年队（驻钱家店）八十多人不包括在内。这样实际参战人员不下三千五百人。

4、伪兴安师，新组建匆匆，除第五团和教导团原班人马，完整的归属外，其他都是新调入人员，有的从几千里外调来的。直至出征，军官之间，士兵之间互不相识者多。连本团团长或本连连长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尤为严重者一部分骑兵没有马和鞍具，炮兵缺驮马、挽马。更谈不上训练。就这样于6月22日乘货车向战区阿尔山出发了。为了补充，先派人去王爷庙、乌兰毛都、海拉尔等处购买马和鞍具，急急忙忙运往战区。可是未等到士兵之手，就遭受连续轰炸扫射，损失了一百多匹马。就是运到的马，因未经训练不能乘用的也达一半以上。这就成为伪兴安师未战先败的一个原因。

5、伪兴安师为参加诺门汗战争，于6月22日受命出发，23日到达阿尔山。从此，伪兴安师归日本关东军的安岗支队节制。安岗支队长是日军中将，是指挥坦克的师团长（师长）。他有两个坦克联队（坦克团），另外又临时配备给他一个日军步兵联队（团）。安岗受驻海拉尔第二十三师团（师）统一指挥。给安岗支队的任务是叫他统一指挥伪兴安师以及其他阿尔山方面的伪军，把主力集结在汗达盖待命。

在当时，安岗坦克师团（师）是日本关东军主力部队，原驻防齐齐哈尔，后因诺门汗战争需要而调来的。该师的主力坦克仅为十五吨的中型坦克，装备有一门火炮（37毫米）和一挺机枪。另外有少量三十吨的重型坦克（有75毫米口径火炮一门，机枪一挺）和装甲车，总数不超过二百辆。然而苏蒙军在当时普遍装备了四十吨以上的重型坦克，其火炮口径大，射程远，而且数量远远超过日军。

6、伪兴安师于6月22日出征，24日集结于汗达盖地区，到30日大体上集结补充就绪。

伪兴安师于6月30日，根据日军指挥部的命令，从汗达盖出发，于7月1日拂晓，沿胡拉斯台河（哈拉哈河的支流）两岸向诺尔台高地攻击前进。从此兴安师陷入了泥潭，遭到了灭顶之灾；

因我本人未直接参加战斗，其详细情况不得而知，只是从参战有关人士回来者叙述中得知，从7月1日参加战斗，至8月3日，在一个月战斗中，全师三千余人仅剩下不到三百人。而且只留下三十一名日本军官（有一名蒙古族）坚持到最后，把阵地移交给了日本军。

7、伪兴安师参战仅仅一个月，就损失了百分之九十的人员，而重火器则损失了百分之百。从损失的人员中，被俘三百三十一名，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强；据说已找到尸体火化者三百一十多具，估计未被发现的（或在被占区）尸体也不下近百具。这样，在战场战死近百分之十三左右；负伤数字没有准确统计，在一般情况下，负伤者比阵亡人数多三到四倍。就这样粗略估算，加上不下火线的将士，大约还应该有三分之一的人员，即一千名左右才对。可是这些人员都逃离了战场，或单独行动，或三人一帮五人一伙，或百八十人集体逃跑了。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下面略做分析：其一这是非正义的战争。用殖民地的士兵来进行战争，日本指挥官吃大米白面，而士兵在战场上连高粮米饭也吃不着、吃不饱，为日本人打仗卖命，而且伪兴安蒙古人打蒙古人，士气低落是很自然的。其二伪兴安蒙古骑兵从来没有经受过这样残酷的战斗。飞机轰炸，大炮轰击，敌

人在哪都弄不清，见不到；而且补给线常被掐断，多日断粮断伙，不走则死路一条。再加上日本军官蛮横无理打骂，指挥不当，武器性能低劣，未经过对空对坦克作战训练，缺乏对空对坦克作战武器，由于新组建的部队彼此不熟等等，这就促成伤亡人数多，而从战场逃跑人数最多的成因。

以上是伪兴安师参战结局。

（二）伪第十军管区（兴安支队）参战概况

于1939年5月，把兴安北和兴安东警备军撤消组建了伪第十军管区。军管区司令部下辖兴安骑兵第一团，兴安骑兵第二团，兴安骑兵第七团，兴安骑兵第八团，两个独立山炮连，一个通信队，一个卫生队。军管区司令官是乌尔金中将，军事顾问兼特务机关长寺田利光大佐。兴安骑兵第一和第二团原驻防博克图，而且第一团刚从佳木斯的三江地区回防博克图（38年12月末回来）的。

兴安骑兵第七团驻防查岗敖包，负责警备满洲里以南的伪满国境线。第八团驻防黑山头负责警备满洲里以北伪满国境线。在诺门汗战争当时，第七团团长是郭文通上校，第八团团长是郭美郎中校，第一团团长金振吉少校，第二团团长是何维成少校，这四个团的团副（副团长）当然都是日本人。

1、第十军管区是警备部队，其装备属于乙种编制，每团有三个骑兵连和一个机关枪连；每连有三个骑兵排，各排有一个挺轻机枪班和一个掷弹筒班，一个骑兵班；山炮连有四门四一式山炮。

在战时，第十军管区，直接受驻海拉尔地区日本关东军防卫司令部指挥。当1939年诺门汗事件时期，日本关东军驻海拉尔司令官是日本陆军中将小松原道太郎，他本职是日本第二十三师团（相当于师）的师团长。因该师团驻防海拉尔，所以小松原中将是当然的防卫司令官。当时，日本关东军第二十三师团有官兵计一万三千多人；另外在海拉尔的日本第八国境守备队七千多人，也受小松原中将指挥。

2、诺门汗战争时期，第十军管区的参战人数，没有统计数字，据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适政信少佐的回忆录中（1950·7）记载：骑兵四个团、山炮两个连、汽车一个队、卫生队一个，通信队一个，合计总数为一千八百五十一人，我个人认为这个数据比较可靠。

3、诺门汗事件是在第十军管区境内兴安骑兵第七团防区内发生的。

历来，巴尔虎和哈拉哈蒙古牧区的习惯性的界限是哈拉哈河，以往彼此虽都有过越界放牧，

但都属于同一民族，和睦相处，没有发生过什么纠纷。日本侵占东北成立伪满傀儡政权后哈拉哈河竟成了习惯性的国境边界线了，为此第七团的边境巡逻和哨所都以此设置的。然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突然紧张起来了，互相指责对方有意越界攻击哨所和巡逻人员。据我所知第一次事件发生在五月初，最初互相射击，继而互相袭击，逐步升级，由排级战斗，后来连级。于是年5月14日，由部分日军配合，兴安骑兵第七团全员出动，据说击退了入侵的苏蒙军部队，这就是诺门汗事件最初的起因。

4、由于战争的升级，把兴安骑兵第一、第二团和第八团都调来了。然而脆弱的伪军，未来得及投入正规战斗，遭受了多次的空袭，人仰马翻，死伤逃亡惨重，也就退出了战斗。第七、第八团调回原防区整顿，第一团、第二团只是被派去警戒参战的日本军队的侧翼。这就是第十军管区参加诺门汗事件的经过概要。

（三）伪石兰支队和铃木支队情况

由于诺门汗战争告急，而伪兴安师和第十军管区的防线全线崩溃，为此日本关东军急调日军赴前线的同时，调驻防齐齐哈尔市第三军管区属下的混成石兰斌部，组成石兰支队。

1、石兰斌、伪军少将旅长，由他亲自统率

骑兵一个团，步兵一个团、炮兵一个团，通信队一个，计一千三百七十六人，乘白阿线于7月30日到达阿尔山。下火车伊始急急忙忙赶赴战场，最初用该旅三八式野炮支援了伪兴安师，从而引火烧身，苏蒙军大口径火炮和轰炸机连继不断的射击和轰炸，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石兰支队的步骑兵于8月5日投入战斗，由于死伤惨重，而且有整排整连的人投奔了苏蒙军，因此不几天就撤出了战斗。其损失情况不太清楚。

后来传闻，石兰斌旅长，因治军不严的罪名（部分人员叛逃），受到了军法审判。

2、据关东军作战参谋适政信少佐的回忆，驻沈阳（当时称奉天）的伪铃木支队也参加了诺门汗战争。据其回忆，参战总人数为一千一百七十六人，以教导队为主。关于铃木支队的情况，我本人从未听说过，其详情更不了解。

根日本关东军作战参谋适政信少佐的回忆，在诺门汗事件中，伪军参加战争的总人数为七千三百三十九人。这一数据，不包括兵站部人员，如：弹药武器补给修理所，补充马场、照空队、运输队、兴安垦屯队、宪兵等等。假若都算在内，参战总人数超过一万人。

通过上述，日本侵略者所精心培养的帮凶，并未起到他们所要起到的作用。侵略者是不得人

心的。

是谁挑起的诺门汗事件？我认为这无关大局，实际上诺门汗事件起到了牵制日军进攻华中、华南的作用；另一方面日本侵略者自以为其军事力量天下无敌，其武器装备是全世界第一流的。通过诺门汗战争，其弱点暴露无遗，再也无力继继战斗，不得不割地，惩处责任者来了个认输。从而也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的斗志。

满洲里日伪警、宪、特机构概况

田 垠

“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年，即1932年6月25日，日本侵略者先以一百多名所谓“国际警察队”进驻满洲里。随于12月6日，日军全面侵占满洲里。

日军入侵满洲里之后，为了维护其在满洲里的统治，把满洲里搞成反苏、反共的前哨阵地，设置了庞大的日伪警、宪、特机构及其分支机构。这个当时仅有万余人口的小城镇，就建立了四十三处警、宪、特机构，豢养了一大批“嘱托”、“密侦”、“连络者”、“观察员”、“谍者”和其他狗腿子，其触角伸到了各个角落，实行极其残暴的特务统治。

现将其在满洲里的警、宪、特机构设置情况概述如下：

（一）警察机构

1932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派宇野音治警正（后晋升为热河省警务厅长）为首的一百二十名武装警察进驻满洲里市，成立了满洲里国境警察队，地址设于满洲里市道北三道街七十六号（今满洲里国际旅行社餐厅）。直属于伪满洲

国警务司统辖，负责小原山、加那山、回头山、达木山等处边卡的警戒，搞所谓“国境防守”。与此同时，在满洲里还设有北满特区警务处第五区警察总署（首任署长白镇、二任署长孟宪惠、末任署长韩国珍）。其主要任务是“维护城市治安”。此外，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还设有警察署，名为维持日本人的秩序，实为维护治外法权的工具。1935年12月，根据伪中央警务司的命令，将上述三个警务部门合并改组为满洲里警察厅，由兴安北省警务厅领导。先后由宇野音治（1936——1937）、前田信二（1937——1938）充任厅长。该厅下设：特务科、警务科、司法科和市区的五个分驻所。

特务科科长、警佐白本中村。下设的特务股股长、警佐中村福尊，外事股警长达路；

警务科科长、警佐小桥正美、菊地田上。下设的警务股股长木内巡官，经理股长一濑宪巡官，卫生股股长中野技士，保安股股长太田原巡官，外勤股股长申淳直巡官、关文安巡官、张子元警长、渡边警长；

司法科科长警佐石原帮爱饭岛。下设的司法股股长庄司巡官、，搜查股股长（缺），股员有田母神警长、艾俊山警士。

各分驻所的名称和地址是：

南部市街分驻所（今道南埠城街三十一号旧砖房），由渡边、周本谦、赵凤山先后任所长；

四道街分驻所（今道北四道街海关街口东北角一座木头垛房子），由增田警长任所长；

头道街分驻所（今头道街边检大楼处），由户田警长任所长；

西门分驻所（今西大桥石油库处）由箱崎警长任所长；

小北屯分驻所（今小北屯），由阿部警长任所长。

1939年4月1日，日伪为了搞所谓强化国境地带治安，伪中央警务司命令，将满洲里警察厅改组为满洲里国境警察队本队，先后由安腾缭吉（1939）、松下健作（1940——1942）、古谷秀夫、渡边龟八（？——1945）警正充任本队长，编制一百零四人，队部内部设股。分驻所改为小队。该队内部设有队务股、警务股、特务股。

队务股长是田上月足警佐，下设三个系、五个小队和兵事等。队务系系长由岩崎警尉充任；经理系系长由佐滕警尉补充任；教养督察系系长由上田警佐充任；南部市街小队长由南武治警尉充任；四道街小队长由石岗警尉充任；头道街小队由海志谷警尉充任；西门小队长由铃木警尉补充任；

小北屯小队长由森本警正充任；直辖队（该队系康德9年按松下健作本队长之命令，由头道街、四道街小队合并改组而成）队长由守屋警尉补充任；兵事由岗田警佐充任、

警务股长是西田警佐，下设有司法系、保安系、卫生系、经济系、搜查系。

特务股长是松本山家警正，下设有特务系、证明书系、特谍班。

扎赉诺尔国境警察队本队长，由市长兼任，副队长由下田警正充任。因市长兼队长，经常不到本队，一切业务均由副队长下田警正具体处理。下设警务股，股长春木警佐；教养督察股股长秦大为警佐；司法保安股股长铃木督尉；特务股属官警尉庄司充任股长；大河沿警察队队长大川警尉；直辖警察队队长孟广誉警尉；还有驿前警察队、秃尾巴山监视哨所和干骆驼监视哨所。

国境警察队，除了配合宪、特部门对苏蒙地工人员的内侦与防谍而外，主要负责“国境警戒”，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满抗日活动和所谓“通苏”、“通共”活动，维护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统治。1942年轰动全城的“反满抗日通苏嫌疑大检举搜捕事件”，便是满洲里国境警察队和扎赉诺尔国境警察队，镇压中国人民抗日爱国活动的一个罪证。

满洲里国境警察队本队特务股，是伪兴安北省保安局设在满洲里的分支机构——保安分室。下设两个活动据点：一是今市内道北三道街粮食局后院粮食局食堂；二是兴华街六道街西南角砖房。国境警察队特务股只是个掩护而已，保安分室下设满洲里、扎赉诺尔两个特谍班。除特谍班外，保安分室人员均经过严格的特务训练，特谍人员大都是职业特务。这个机构兼有反谍和谍报的双重任务。（详见附表1、2、3）

（二）满洲里宪兵队

满洲里宪兵队设在现今的道北三道街消防队东侧的一个二层木头垛楼内，消防队西侧木头垛是该队的宿舍。该队是1933年4月驻进的，名为满洲里宪兵分遣队，隶属齐齐哈尔宪兵本队，首任分遣队长为加滕角一。1935年4月，满洲里宪兵分遣队扩充为分队，并在扎赉诺尔设立了宪兵分遣队

1936年8月，兴安北省宪兵本队于海拉尔成立，从此满洲里宪兵分队归兴安北省宪兵本队统辖。

1945年4月，兴安北省宪兵本队撤消，满洲里宪兵分队又归齐齐哈尔宪兵本队，满洲里宪兵分队缩为分遣队，扎赉诺尔分遣队缩为分驻所。

历任分队和分遣队队长有：龟井真清少尉、

滕田大尉、青本益夫大尉、东条英治大尉、森三吾少尉、熊本真二大尉、同村一郎少尉。

满洲里宪兵分队设有：警务班、庶务班、特高班（内设朝鲜班、日本班、苏联班、中国人班），编制三十人左右。该队主要任务是担当对苏联领事馆、苏侨出入国境，及其他外国人之侦察、通讯检查等，活动比较猖狂。据记载，仅1943年至日本战败的两年中就先后逮捕了数十名无辜的群众和爱国志士，他们有的被刑讯致死，有的被判了死刑，有的则被送往哈尔滨七三一细菌部队做细菌试验（机构设置详见附表4、5）。

（三）日军特务机关

早在1923年日特机关就派小原到满洲里，组织“小原公馆”（特务机关），以此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1932年，随着日军侵占满洲里，哈尔滨特务机关——关东军特务部，在今满洲里五道街正式建立了特务机关，首任机关长便是前“小原公馆”的主人小原重孝大尉。

1935年小原调走，桥本钦五郎中佐继任特务机关长。继桥本之后还有山本少佐、越智大尉和北村宪雄、高山正彦等人，先后任过满洲里特务机关长。满洲里特务机关的派出机构有：新

庙出张所、阿尔太面出张所和扎赉诺尔分机关（详见附表6）。

该机关的主要任务是：搞对苏军事谍报工作，为其军事侵略作准备。

满洲里特务机关成立后，先后向苏联、蒙古人民共和国派遣情报人员达十余人次。

（四）满洲里铁道警护团

满洲里铁道警护团的前身，是满洲里铁道警护队，成立于1935年3月22日，隶属于齐齐哈尔铁道警护本队。其中央机构为满洲国军事治安部铁道警护司。团机关内设：庶务、警备、警察、爱路系；并在三等以上车站派有若干分驻所。计有：扎赉诺尔、嵯岗、赫尔洪得、完工、乌固诺尔、满洲里分驻所。团部总编制为九十三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维护铁路站、区和沿线的秩序，镇压中国人民反满抗日活动。

1945年5月，日军在各战场已处败退形式，为了挽回败局，进行垂死挣扎，日伪遂将铁道警护机关由一般的警察建制改为军事警备机构。其中央机构由军事治安部铁道警护司改为铁道警护军，各铁道警护队本队改为铁道警护旅，各铁道警护队改铁道警护团，各车站的分驻所改为铁道警护分团，实行军衔制，为现役军人。

满洲里铁道警护系统也于1945年5月，

进行了改制（详见表7）。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进驻满洲里，至此，日伪军、政、警、宪、特机构全部溃散。

日伪时期满洲里警察组织机构设置情况表（附表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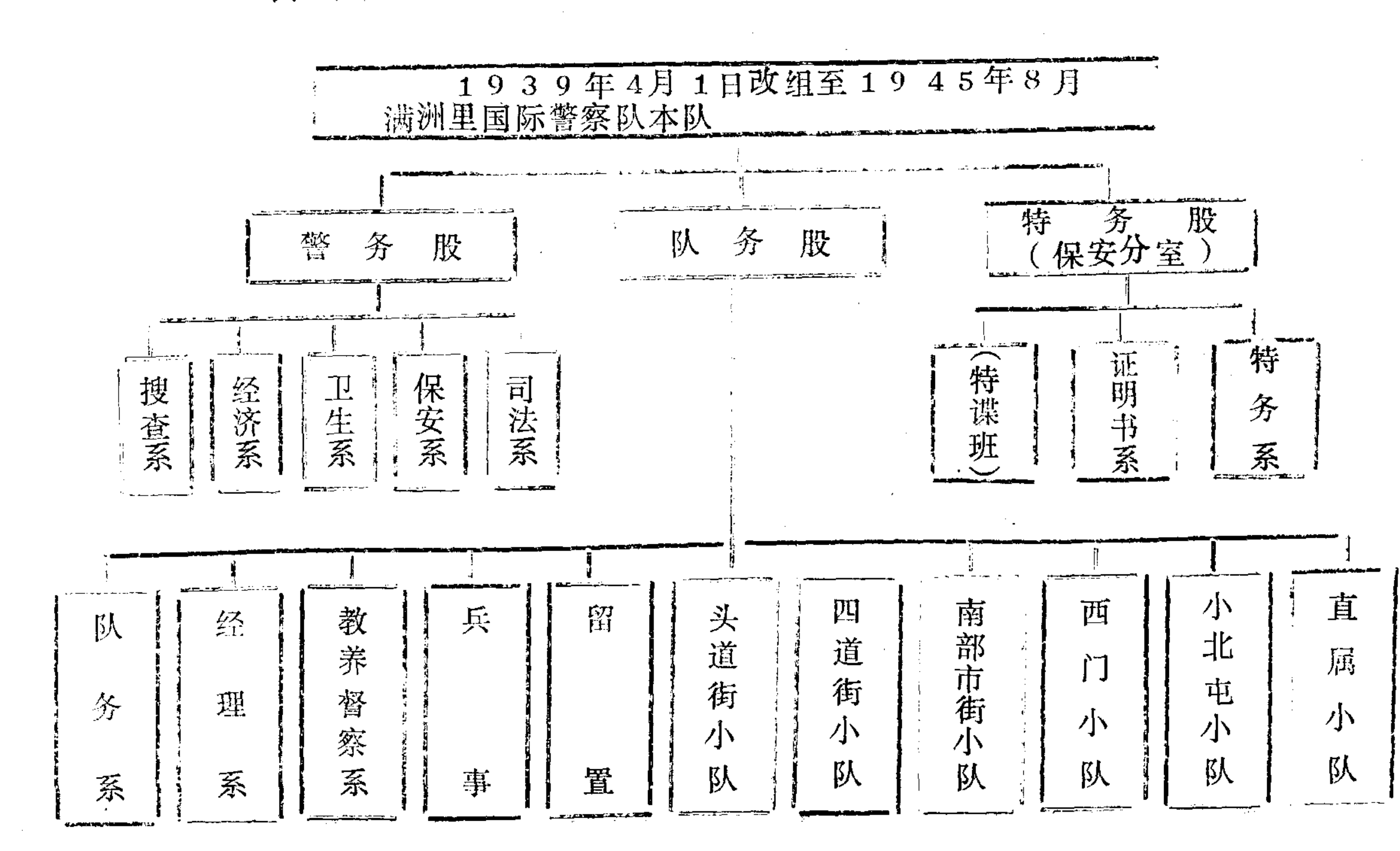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二年三月一日至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满洲里警察机构情况

- 日本驻满洲里领事馆警察署
  - 侨务股
- 北满特区警务处第五区警察署
  - 总务股
  - 保安股
  - 司法股
  - 海拉尔分署市区直辖警察分驻所
- 日本驻满洲里国际警察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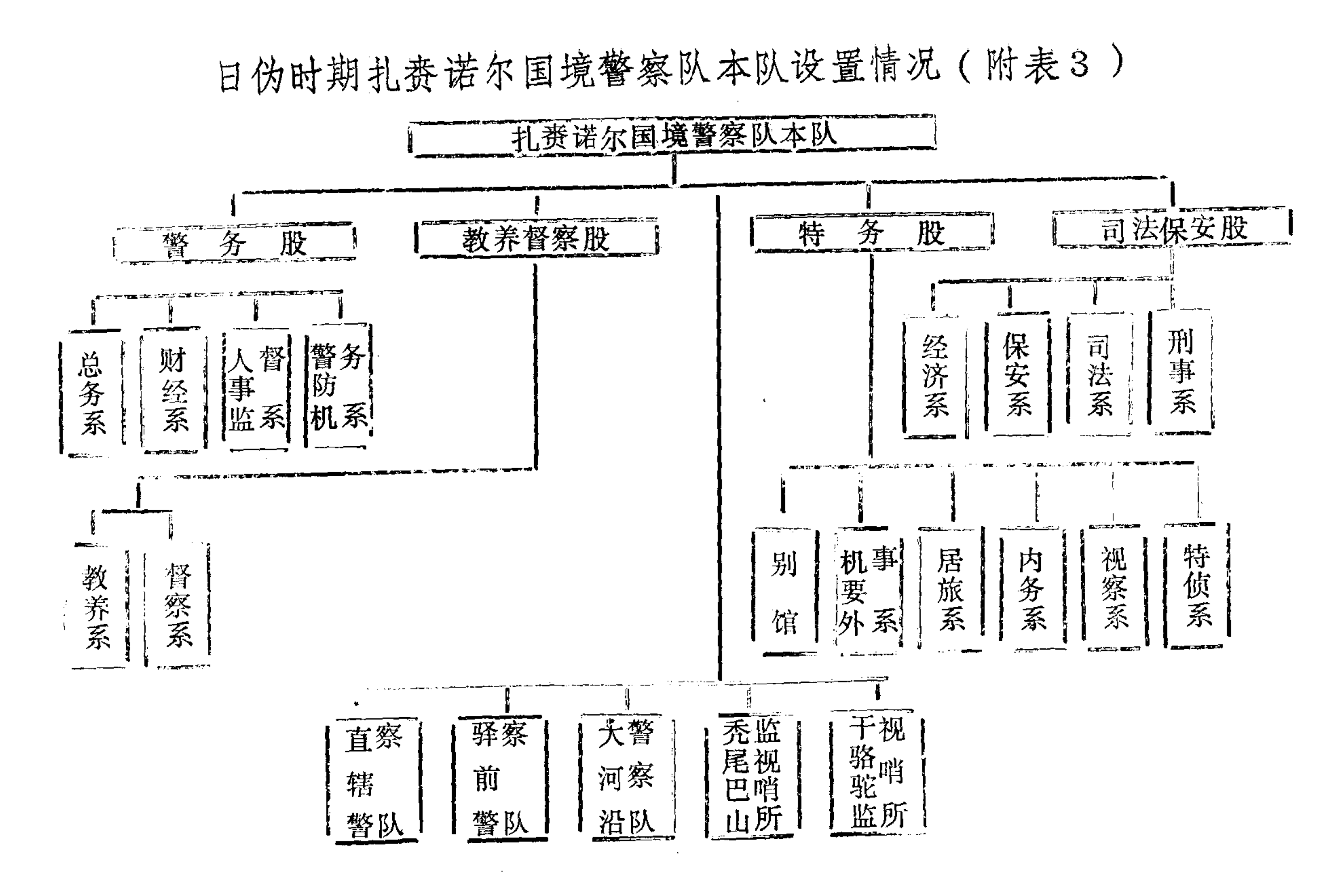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上述三机关合并改组为满洲里警察厅

- 特务科
  - 外事股
  - 特务股
- 司法科
  - 搜查股
  - 司法股
- 警务科
  - 警务股
  - 经理股
  - 卫生股
  - 保安股
  - 外勤股
  - 兵费
- 头道街分驻所
- 四道街分驻所
- 西门分驻所
- 南部市街分驻所
- 小北屯分驻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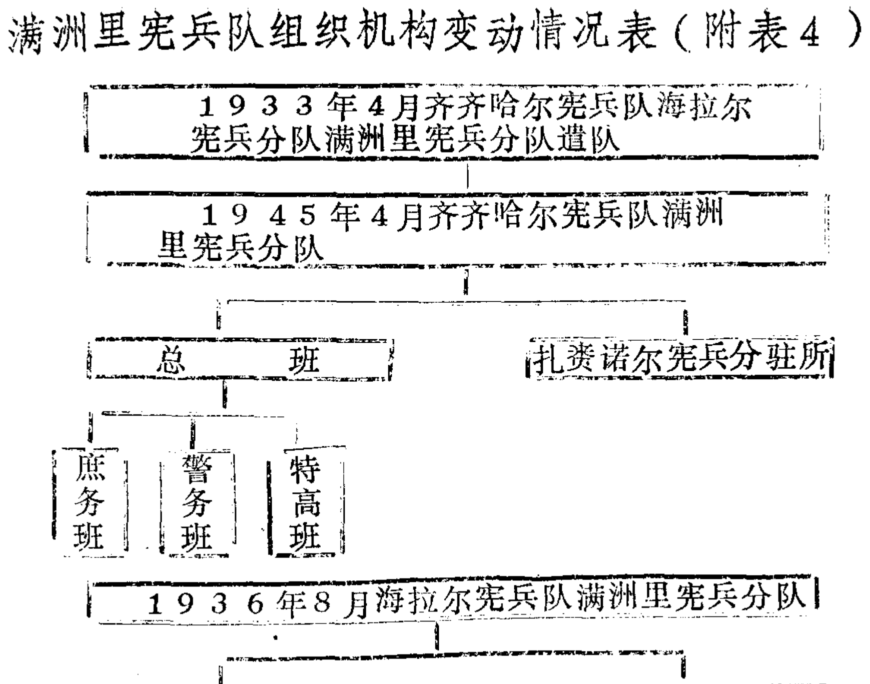
日伪时期满洲里警察组织机构设置变动情况（附表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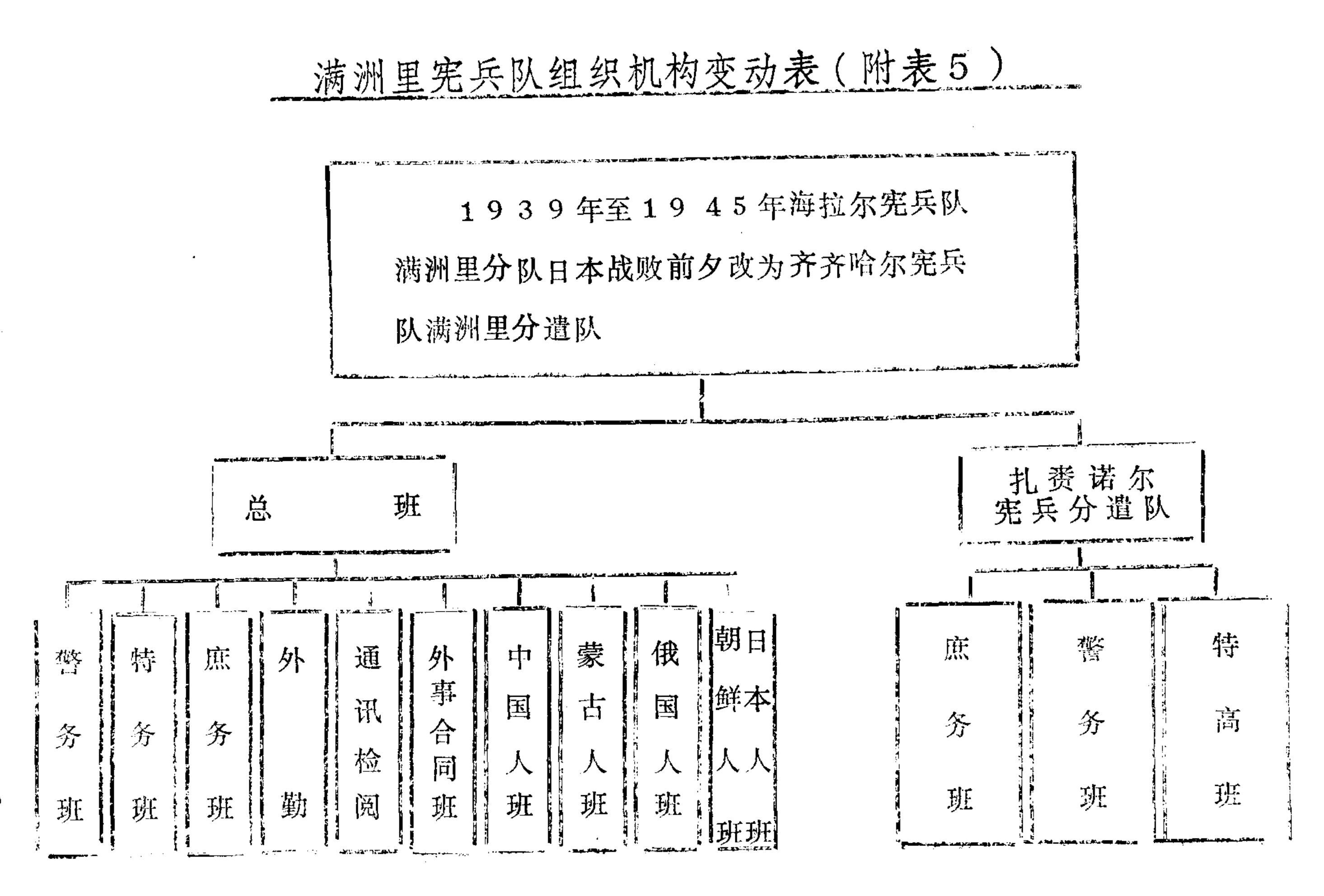
日伪时期扎赉诺尔国境警察队本队设置情况（附表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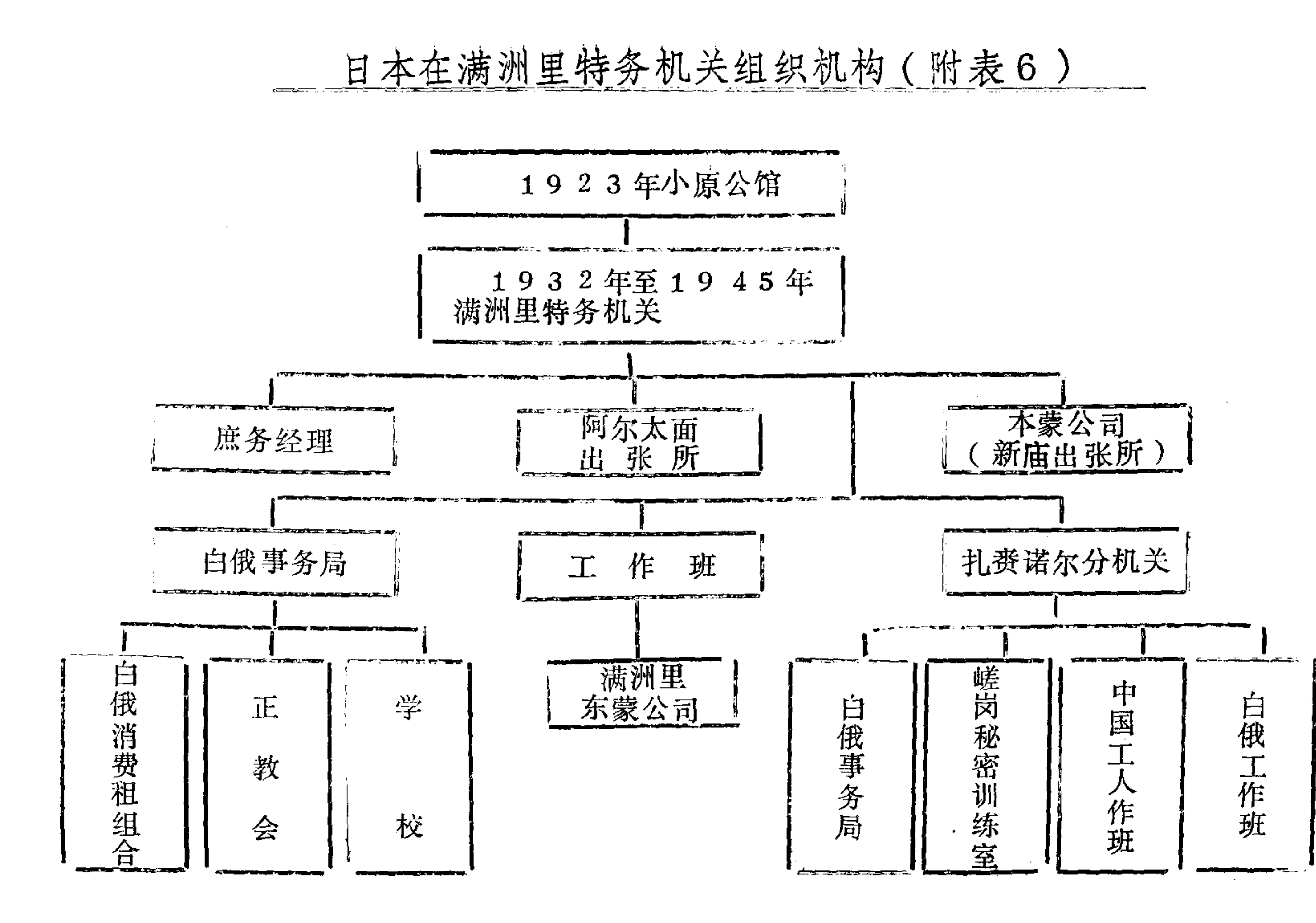
满洲里宪兵队组织机构变动情况表（附表4）



满洲里宪兵队组织机构变动表（附表5）



日本在满洲里特务机关组织机构（附表6）



日伪时期满洲里铁道警护团组织机构表（附表7）

- 警护团部
  - 庶务系
  - 警备系
  - 警察系
  - 爱路系
  - 乌固诺尔分团
  - 完工分团
  - 赫尔洪得分团
  - 嵯岗分团
  - 扎赉诺尔分团
  - 满洲里分团

日伪对扎矿的掠夺与工人的反抗斗争

李长春

第一节：侵略者野蛮掠夺煤炭

第二节：法西斯残酷压迫工人

1、劳工陈大成的一家

2、七童工惨死

3、大窑里七天七夜

第三节：劳苦矿工的斗争

1、磨洋工跑空车斗争巧妙

2、掀工潮为死难工友申冤

3、施小计用矛盾免遭杀身祸

4、泄怒气机库燃烈火

第四节：粉碎炸井阴谋喜迎扎矿解放

一、侵略者野蛮掠夺煤炭

据中央档案馆存档《亚尔特氏调查报告》记载，扎赉诺尔煤矿沿革年代从1900年开始。

1900年东清铁路修至扎赉诺尔时，有一名叫刘贵枝的人发现了矿苗，报告给俄国人，得到了报矿奖金一千五百元。1907年“中东铁路公司”根据筑路契约和与黑龙江当局所签订的特别协定取得了采矿权，投资十八万四千卢布开始在扎赉诺尔建矿，采掘煤炭。

1935年4月，日伪收买“中东铁路”后交“满铁”经营，当年8月归“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经营。1941年以后“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投资五千万伪币，独立经营。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侵略者通过“满铁”抓紧时机攫取东北铁路全线的经营权，同时日本关东军向“满铁”发出《关于铁路委任经营及新线指示》，匆匆忙忙拼凑了一个“沈海铁路保安维持会”。紧接着又成立了“东北交通委员会”，作为东北铁路全线的统治机构。为了确保“满铁”的特殊利益，设立了一个委托经营特别会计，并办理了所谓法律手续，即1933年2月9日“满铁”与伪交通部签订的《满洲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

１９３５年4月２３日，日本侵略者以收买的方式，出日币一亿四千万元全面接管了１８９６年清朝政府与帝俄合资修建的全长一千七百三十二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它所属的一切企业和财产设施等，达到了对“满铁”强化殖民统治和军事需要的野心目的。

日本侵略者得到中东铁路之后，马上将扎赉诺尔煤矿委托满铁经营。１９３６年8月，又以满铁无暇经营为由交给“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经营管理，同时由抚顺煤矿派来以技师竹中剑三为首的一大批日本人，接管了扎矿，称为“满洲炭矿株式会社扎赉诺尔炭矿”。竹中剑三任矿长，设立管理机构，所有管理人员均由日本人担任。

扎赉诺尔煤矿始建于1902年，经过“日俄战争”被沙俄掠夺一空，使东清铁路无法经营，转给沙俄资本家包工经营数年，也由于掠夺式经营，使扎矿遭到严重的破坏。１９２４年苏联正式与中国合办，近四年时间。１９２９年又经过了“中东铁路事件”，使扎矿在炮火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处于瘫痪状态。１９３０年仅出煤五千八百吨。１９３１年产煤五千吨，１９３２年没有产量，１９３３年产煤七万三千六百吨，１９３４年产煤八万吨。但南煤沟小露天坑下明煤已所剩无几了。

签于上述情况，竹中剑三采取依靠中国廉价劳动力和用马车运输的生产方式，通过街公所和警队将当地所有马车户和全矿所有的劳动力赶去挖煤、运煤。他首先将南煤沟小露天露头煤全部挖出，再在沟的东帮煤壁上开洞打“斜井”，一方面解决燃眉之急，临时应付其主子的急需，另一方面，用这段时间做好下一步多出煤的准备工作。竹中和其同伙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接管的一年中，共采出煤炭五万二千八百吨。

１９３６年初，竹中知道：如再出五万多吨煤已不可能。于是他在南煤沟北部浅处开了个小平洞，命令他任命的机械厂边渡厂长迅速将帝俄留下的老掉牙的蒸汽绞车修好，安在小平洞，提升煤炭。接着又在南煤沟东帮煤壁上开了一号、二号坑（斜井）。与此同时竹中又急令抢修帝俄时代已仍进废铁堆的一台四分之一米的小蒸汽掘土机（当时工人叫汽机器镐）安在南煤沟南头上帮挖露头煤炭。这样，这一年掘出了十三万七千五百吨煤炭。投入挖煤的工人达八百多，马车二百八十三辆。

１９３６年秋，电厂建成，投入使用。竹中剑三为了加快建井步伐，尽快多生产煤炭。由抚顺调入两台一百五十马力绞车，安装在二号、三号井口，将七十五马力绞车安装在一号井口。以后又

调入打眼电钻、水泵等分别在井下使用，部分工作面，开始采用炮采。年末工人达一千多人，产煤炭十三万七千五百吨。

１９３７年日本侵略者，挑起“七七”事变。由于运兵和军需物资等，所需煤炭日趋增多。便在东南煤沟除了新开三号井外，又在二号井后开了三层坑，在三号井南面开了四号井，年末工人达一千三百多人，产煤十五万一千吨。

１９３８年初开掘了东煤沟露天坑（日本人称作露天掘）成立了南煤沟第一采炭所和露天第二采炭所。又从抚顺调入两台一百五十马力和一台七十五马力绞车，分别安装在东煤沟西帮，为一、二、三号井绞车道挖土。当年夏季又由抚顺调来大型多斗电铲（当时称为大机器镐）和重型铁道及二十多辆二十五吨自翻车，同时从抚顺、阜新调来了几十个日本工程技术人员和中国技术工人，把他们分配到各个井口和露天坑，工人一下增到二千一百多人。全年产煤十五万五千六百四十吨。

１９４２年东煤沟露天、南煤沟三层和四号坑都因过不了流沙关，先后均以失败告终。出煤的一号二号三号井，由于掠夺式开采，造成井下处处起火，也处于萎缩阶段，仅能维持现状。于是，竹中剑三又在扎赉诺尔车站以西一公里处新

开了一对斜井，干了两年多，也因过不了流沙关彻底黄摊。1941年冬，竹中剑三由满洲探钻株式会社（称满包）调来十多台钻机，加上本矿的机钻和手钻在灵泉山脚下，探钻找煤。经过近一年的勘探终于找到了煤，冬季开始建一号井钻（后来的六号井）。

1942年，煤炭生产大幅度下降，全年产煤十四万二千零五十六吨。1941年11月，以“满炭”技师竹中剑三对扎赉诺尔炭矿经营不力，由“满业”接管，从关东军部派来海军中将加纳金三郎，任扎赉诺尔炭矿株式会社社长。

加纳金三郎，这个五十多岁的海军中将，以武士道精神著名，二十多岁就当上了日本海军军官。参加过“日俄战争”，在对马海峡与帝俄波罗的海舰队作战中十分悍猛，为天皇立过战功。他还参加过制定对我国东北侵略作战计划，是一个效忠天皇，独霸亚洲太平洋地区主张的信崇者，同时也是一个心毒手狠的刽子手。

加纳金三郎上任后，由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投资五千万元给满炭株式会社，专款拨给扎赉诺尔煤矿。不久成立了灵泉第三采炭所。加纳金三郎到任不久，即在灵泉小北山发现了煤，开了一个小露天（日本人称灵泉露天掘）。为了使灵泉多出煤，调进了二百来名朝鲜人开小北山口，

铺上了轨道，通了火车。由于劳力仍然不足，加纳金三郎下令给扎赉诺尔街公所和警察队，强迫市民每户出一个人轮流到小露天挖煤，每次一百五十人，名曰“勤劳奉公队”，分三个班作业。1942年生产煤炭二十九万四千多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员效率零点三六吨。

1943年，生产煤炭三十五万六千九百一十五吨，工人达三千二百七十四人。加纳金三郎也受到了其主子的高度赞扬。

加纳金三郎不但掠夺中国煤炭资源有方，而且强化法西斯统治也心狠手毒。在他来矿不到四年的时间，大约每年有三百多人丧生。他强化地区的军、警、特、宪统一指挥，在矿本部首先进行全面整顿，把矿警备（矿井队）、小队、中队长完全换上了日本军人。在各井和工棚、工人住宅全设了岗卡。警察、特务、宪兵到处可见，特务无孔不入，有很多工人今天还上班，明天就不见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他们声称：“满洲人大大的有，死了死了没关系”。把工人当作会说话的工具，中国人，不让说是中国人，都得说是：“满洲人”。有名有姓不让叫，每个工人发一个小铁牌，上面刻有号码，这个号码就是每个工人的名字。那时候，每天都有二十几个人死去。这是由于工人在井下干苦役不如牛马，穿的

是更生布衣服，一、二、三班三人一双日本式后开门水袜子。吃的是不如猪狗食的又苦又涩的橡子面。住的是不能御风寒的双层铺工棚(大房)子，苍蝇、蚊子满屋飞，臭虫满床爬。盖的麻袋、草袋、洋灰（水泥）袋子。枕的是砖头，上下铺上下人。病、冻、饿、累事故累累，死伤工人一日多一日，有的工棚住上百人，有时剩下几个人。工人被折磨死后，扔在西山坡上，“狼扯狗啃野鹰叼，白骨铺遍西山腰”。

二、日本侵略者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和剥削

1、劳工陈大成一家惨遭压榨

陈大成是承德一个偏僻山区的贫苦农民，由于生活所迫，１９４２年冬被骗卖到扎赉诺尔，成了炭矿的第一批劳工。

陈大成一家来到灵泉的第二天，大成就被一个姓林的把头赶下了一号井。从此，开始了牛马般的井下劳役。他每天累得挺不起腰，挨打、挨骂却敢怒不敢言。为了有个安身之处，他一家老小用了不少个夜晚，在工友的帮助下，在西山沟顺阳坡挖了个地窨子，用几块破烂木头，搭了个仅能容下五口人的“住房”，总算有个避风遮雪的安身处了。

但是他一家五口人的口粮却难以为继，每天

虽然只吃苞米面和橡子面，一月也仅够吃二十天的。这天刚到中午，饿得他实在推不动车了。鬼子见他速度缓慢，便说他偷懒，就一步一棒地打他，逼着往前推车，陈大成被打得遍体鳞伤，一阵眼花，口吐鲜血，栽倒在地。工友们刚刚把他抢救过来，安排他躺下，不料又有两个鬼子气势汹汹地来到大成身边，不由分说，把大伙打了一顿，被赶去推车，大成又被打晕过去。当大成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自己家里了。六七个工友围着他站着，他的两条腿被打断了，从此这将够维持全家性命的一斤橡子面也无人去赚了。工友们不忍心看着这一家老少饿死，每天都凑点橡子面送到大成家。但是，尽管大家勒紧裤腰带，又能省下多少给他们呢？身体本来就有病的大成老伴，没过几天就病倒死去了。工友们含着同情的眼泪把大成的老伴用旧席子卷起埋在西南山坡上。

残废的陈大成，死了老伴，剩下老的老，小的小，孩子们连饿带想妈，终日哭哭啼啼，老爹急瞎了双眼。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含着满眼泪水，忍着疼痛强打精神坐起来，对儿子陈锁说：“儿呀！你爹这辈子恐怕不行啦，你也十五岁啦，在富户人家还是个孩子，可咱们这个家你就是大人了。孩子你是听话的好孩子，去替爹……”。说到这里他痛苦万分。陈锁看到爹这

样的痛心，心似刀绞，扑到爹的怀里大哭起来。过一会儿他擦干了眼泪说：“爹，你放心吧，我去下井干活”。大成搂过陈锁说：“苦命的孩子，去找叔叔大爷们，领你去上工吧”。

在父子商量好的第二天，大成同班工友老罗和老魏求人买了两瓶酒，把陈锁带到二把头家。老魏强装笑容把酒推到二把头面前说：“让陈锁顶替他爹下井干活去吧？他家太苦了，老弱病残挺可怜的”。二把头抬起眼皮看了下陈锁沉思了一会说：“好吧！看你们哥俩的份上，明天就叫这小子上工去吧，得好好干哪，要不就得活活饿死。这样吧，明天早上送去，先找我”。从此陈锁开始担负起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担子。

1944年春天，陈锁上头班刚刚到井下，一个外号叫“损人”的日本监工，分配陈锁一个人去挖一个老巷里的水圈，这个老巷是火区，已经封了一年多了，通风又不好，老魏见“损人”是要欺负陈锁，就向“损人”说：“我去！小孩的不行”。“损人”骂老魏：“巴嘎”！对陈锁说：“你的去，快快的”。老魏把陈锁拉住小声说：“千万注意，下山老巷水很深，掉下去就没命了”。陈锁点头说：“魏大爷放心”。“损人”见陈锁行动不大快，打了陈锁一镐把，催着陈锁说：“快快的！”

“损人”逼着陈锁来到老巷入口，站住对陈锁说：“你的好好的干活，不好的三滨的给”。陈锁钻进了刚打开的洞口，走进几步感到呼吸困难，把土篮和铁锹一扔，喊了一声害怕抽身跑出来。“损人”见陈锁跑回来了，拿着镐把向陈锁打来，陈锁一闪身没打着。“损人”气急败坏地大骂。陈锁装着害怕的样子说：“我害怕，不敢进去”。“损人”骂了声“巴嘎”，拉着陈锁往里走去，当走到陈锁扔土篮的地方，陈锁挣开“损人”的手往回退了几步，只听“损人”骂了声“巴嘎”便扑通一声掉进了下山老巷里，再没有动静了。陈锁又听了一会儿还是没动静，断定“损人”已死了，大喊起来：“不好了太君掉在下山老巷里了，快来人哪！”这个“损人”就是打坏陈大成的那个日本人，替爹报了仇，心中十分痛快。老魏听到喊声赶来，问明了情况说：“这可了不得，你得马上升坑回家，我随后就到。”

陈锁刚到家，老魏、老罗也赶来了，把情况和陈大成说了一遍，大成听了吓呆了：“这可怎么办呢？”老罗镇定一下，拉着大成的手说：“兄弟，事到如今，实在没办法了，鬼子不能放过我们，你们要是信得过我，让我带着锁儿走吧”。“你带他上那去呀，这可是个插翅难飞的地方啊”。陈大成着急地说。

老罗说："我有办法，不能耽误了，天一黑我就带他去草地，那里有我的不少朋友。"

陈大成望着老罗泪如雨下，把陈锁叫到跟前说："去，快去吧，跟着你罗大爷逃命吧"。老爷爷把仅有的一件破棉袄，披在陈锁的身上，陈锁拉着爷爷的手跪下说："爷爷我们怎么这么苦哇"。哭得泣不成声。老罗催促陈锁："快去吧！不然叫鬼子抓到就没命啦"。陈锁告别了亲人，跟着罗大爷迈着急促的步伐，奔向渺无边际的大草原。陈锁走后，全家遭了毒害，大成被鬼子活活折磨死了，老爷爷一气之下也死了，罗大爷帮助料理完后事，也抱着陈锁小弟奔向茫茫的大草原。

2、七童工惨死

1943年刚刚入冬，一场小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上班的工友们都聚集在南煤沟二号井小牌子房门前背风避雪；等待着叫号头（工人不点名，只喊小铁牌上的号），不一会儿，一个小把头出来喊号了，他先点了七个年纪最小人的号码，让他们先下井，他们的平均年龄才十四、五岁。这些孩子们由于生活所迫，为了每天一斤二两苞米橡子面（杂合面），而下井拼命，以减少父母的负担。他们所下的二号井，由上到下二百

多米深。因着火封闭，完全用水泥发楦，绞车道两边很窄，只能通过上下的矿车。当他们七人刚下去五分钟，一串矿车飞也似的冲下井口。井上的人们听到矿车行驶动静不对，预感到是跑车了，个个替七个孩子担心。

原来，这七个孩子都是跟大人一起采煤的，可是今天劳务系的城领，偏偏挑出这七个孩子让他们提前下井打扫掉在绞车道上的煤。这些孩子跟大人一起干惯了开始不愿意去，是城领打着逼着他们下去的。可谁知在天桥上边吊着十六个车，因煤台上的铁道坏了，放不下去，待修好了铁道再把吊在天桥上的车放下去。就在这时，一个日本人却打了快点下车信号，由于重车快下，速度飞快地扑向正在修道的四名工人，当时就碰死一人，碰伤二人。那个打点的是日本人见铁道还没修好，碰人的车又掉了道，又打点把车重新拉到天桥处。工人们喊；“碰死人了。”那个日本人和一个小把头，互相看一看也不管，又打快点下重车。结果因钩头第二节第三环链有裂缝，又不更换，致使钩头三环链挣断冲向井下，使七个十几岁活蹦乱跳的孩子当时即被砸的粉身碎骨。血肉模糊的七具尸体。是工友们用草袋子兜上来的。开始把头扬言说；“他们（指七个孩子）是图挣钱来的，不为钱他们能到这里来死吗？太君心肠

好，念他们为增产报国多少出过力，每人给一口棺材。但天刚黑，不等死者家里人知道，就悄悄地把尸体给扔了。当死难者的家里人来井口看人的时候，日本人不但不承认有此事，还弄来了许多便衣特务、警察、宪兵。硬说；死难者的家属和工友们聚众闹事，中间有八路。当时就把来的所有男人都抓到警察队，关押了十多天，直到折磨的不象人样了，才放出来，日本人还把事先写好的"认错觉醒书"，强行让他们按上手印，并命令他们，不准乱说乱动，否则就要杀头。

七个童工，就这样白白的被撞身死，死后家人连尸首都没有看到。

3、大窑里七天七夜

１９３９年农历８月１６日凌晨，南煤沟二号井井下，右八片人称大院的大窑里，一阵巨响。好似天崩地裂，一股恶风冲击，即刻飞尘杂物灌满了整个巷道。在大院里干活的七名工友蒙难。

发生这次冒顶的前五天，老工人张某和刘贵林在大窑外面的巷道上，遇见把头曹德福，向他汇报说："大窑里，这几天压力大，不能再扒煤柱，不然……。"没等刘贵林把话说完，曹把头就把他训了一顿："别他妈的大惊小怪的，这还用你操心吗？好好干活去，别没事找事"。第三

天的半夜里，大房子里的工人正在睡觉，两个特务象幽灵似的，偷偷摸摸地来到了大房子，把张刘叫了出去，一去几天没有回来。狗腿和一个小把头说："他俩不是良民，是破坏增产报国的思想犯。"从此，在扎赉诺尔再也没有见到这两位老工人。

仲秋节的第二天清晨，李逢吉大把头的头班工人已到二号井下大窑里抡着笨重的镐头，背着沉重的大筐拖着灌了铅一样的双腿，为着一家老少能够活命，一镐一镐地刨着，一锹一锹地装着，一筐一筐地背着煤。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此时二号井右八片里正孕育着一场灭顶的灾难。

冒顶事故发生了，大窑里面干活的七名工友，奔跑呼救着，他们心里都知道，只有拼命挣扎，还可能有活命的一线希望。他们在两位老工人的带领下，撤到了比较安全的死角躲避起来，等待着上面的工友快些来救他们。

冒顶刚刚开始时，在大窑外边推车的两名工友，发现了险情立即向井上跑去，边跑边喊："大窑里还有七个人……。"他们一口气跑到井上，找到了曹德福把头，报告险情。曹把头不但不问井下的情况，反而骂道："别他妈地瞎吵吵，穷他妈地咋呼啥，掉几块煤用不着大惊小怪。"骂完，他就象没有发生任何事一样，转身

走进了他的办公室，悠闲地吸起了香烟。报告险情的两名工友，怒不可遏，骂了曹把头几句话后，就向采炭所跑去报告。但日寇为了封锁消息，不让真相暴露出来，以“休息、休息”，将这两名报告的工人关押起来。

这样大的事故又怎能封锁住呢？发生冒顶事故的当天上午十点多钟，工人大房子、家属住宅里，街头巷尾到处都传着二号井冒顶的事。到了下班的时间，李振国和陈昌荣的妻子，见他俩没有回家，又听到二号井冒顶的事，更是焦急万分，心如刀绞，不顾孩子的哭闹，跑向二号井井口，一些工人、家属也跟着跑去。她俩听到准信之后，当即昏死过去。当工人们听说日本鬼子和曹把头，在发生事故后，不顾工人死活，不积极采取救护措施，还把报信的两名工人扣押起来的消息后，怒火冲天，当即在二号井展开了与日本人和曹把头的说理斗争。提出了鲜明的斗争口号：“要活见人，死见尸，立即抢救蒙难工人，如不马上放被关押的两名工友，决不下井采煤。”说理斗争延续到第二天中午，日寇急需煤炭，又怕引起全矿工潮，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工人提出的所有条件。

一场抢救蒙难工友的斗争展开了。老工人们选择了最佳的营救方案，决定在下山距大窑三十

米处开口掘进。上面的工友救人心切，忍饥挨饿不分昼夜的轮流干。井下七个工人，千方百计地和死亡作斗争。他们为了保存光明，只用一盏矿灯。头两天他们拼命地用手扒着煤块和矸石，他们抱着活着出去的希望，不停地扒着。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突然他们听到了几声炮响，隐隐约约听到了矿车的行走声，他们顿时来了精神，一齐地高喊："有救了，我们有救了。"

外边打下山道的抢救人员，已经整整干了六天六夜。终于在8月22日深夜打开了通道，救出了蒙难的亲人，其中有两人惨死在井下。

三、穷苦矿工的斗争

1、磨洋工、跑空车斗争巧妙

由于矿工们受尽了日本侵略者和封建把头的残酷压榨，不甘心当亡国奴，替日本人卖命，就巧妙地和敌人展开了斗争。

那时，鬼子只是在头班下井检查一两次，一到夜班就无影无踪了，把头在这个掌子面转一转，那个掌子面转一转之后，就找地方嫖赌去了。工友们下井后抓紧时间装满几车煤，推到车场子里蒙蔽鬼子和把头，尔后就找地方休息起来。为了不让鬼子发现，就在各工作面的两头放上岗哨，一经发现鬼子和把头来了，就以敲铁

器、打口哨等方式通风报信，工友们得到消息后，又装模作样地干起来。鬼子看干得起劲，就放心地走了。鬼子一走工友们又回到安全避风的地方，聊天的聊天，睡觉的睡觉。久而久之，工友们磨洋工的经验越积累越丰富，糊弄鬼子的办法越来越巧妙。在装车的时候，把一些破筐、烂木头等杂物倒在煤车中层，上面装些好煤，车既显得满，又不容易被鬼子发现。有时鬼子和把头突然出现，报警的人来不及通知工友，就向鬼子假报说："那几个去解手去了。"

因当时战事的需要，夜间很少有大车皮北上。扎矿的日本鬼子为了尽量多生产煤炭，采取夜间翻存炭，白天边生产边装落地煤的办法。后来，许多煤堆自然着了火，弄得鬼子顾东顾不西，每天忙得脚打后脑勺，哪还有功夫过问生产情况。每天只能到帐房看看当日的生产进度情况和到绞车房查看一下所耗的电量。这样就给工友们糊弄鬼子造成了良好的条件。井下采煤工，登钩的、翻车的和绞车司机共同商量好治服收牌、记账先生的办法，事事牵扯上他们使他们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夜间没有把头的时候，绞车钩头上挂着一排煤车上下不知跑多少个来回，这样既可蒙蔽鬼子，又可少挨累少出煤。

日本人是以耗电量来计算载上了多少吨煤

的。煤炭产量日报上所反映出日产二百来吨煤，只不过仅有百十多吨而已。

2、掀工潮，为死难工友申冤

日本鬼子不按计划、不按正常开采程序、不按地质的客观条件，胡开乱采。他们不顾工人的死活，更不管煤田破坏程度如何。因此扎赉诺尔各个井口被弄得不是起火，就是发水，再就是冒顶，毁井死人的事情经常发生。一天清晨南煤沟北部井，巷道突然来了大压力，一场大面积的冒顶事故发生了。两班二十几名工人被堵到井下，他们虽经轮班拼命地刨煤壁和冒下来的土矸子。但由于空气稀薄，终于一个接着一个地倒下来。井上工人十分气愤，大家自动组织起来，向日本人抗议，日本人被迫允许清理巷道，解救巷道里遇难者。十几天以后，人们才在洞内找到了死难工友。二十几个人，有躺着死的、有跪着死的、有趴着死的，惨状目不忍睹。一场为死难者申冤，要求追查事故的责任者；抚恤死难者家属的罢工斗争开始酿酝。全矿煤炭生产急剧下降，工人们常聚在一起，商量如何找鬼子算账。

在矿工斗争声势的压力下，日本鬼子怕引起大工潮，难于收拾，便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措施，答应了工人提出的部分条件，处分了北部井日本

工头和把头，主动地承担了责任，破天荒地给死者做了棺木，给每个死难者家属发了抚恤金。

这样，工人靠自己团结的力量，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3、施小计，用矛盾，免遭杀身祸

１９３７年秋的一天午夜，劳累了大半宿的南煤沟一号井绞车司机常双贵，感到饥寒难忍，赶紧走下绞车台，满满地添了一炉子火，由于煤添得过多，火一时上不来，他又往铁炉里浇了些机油，火顿时着了起来。劳累、困倦和饥饿，使他支持不住了，一头倒下就睡熟了。铁炉里的火着的很旺，炉盖和炉筒子都烧红了。不大一会儿，烧红了的炉筒子烤着了绞车房柳条笆房盖。由于深秋风大，火势迅猛，蔓延很快。辟辟啪啪的火声把常双贵惊醒，他一看这情景，心情万分紧张，一时想不起该怎么办好，他被吓呆了，猛然间听到有人在呼喊他，才想起只有从绞车绳的窟窿里才能钻出去。当有人问他和他一起当班的袁秀章时，他才想起为糊弄鬼子轮班找地方睡觉，消极磨洋工的工友。便以飞快的速度直奔二号大房子找到了老袁，袁秀章被常双贵推醒，听说绞车房着了火，大吃一惊。为了共同对付鬼子，他俩共商对付的计策，约定大火是因烟筒跑火所

致。这时，大火越烧越旺，把新盖还未使用的绞车房也烧着了。当劳务系分别提审他们时，他们都一口咬定是烟筒跑火造成的，由于绞房人手少扑不灭，电话也要不通，使火越烧越大。这件事虽然归劳务系审讯，但因为是机电工人出的事，劳务系无权处理，处理权在机厂。由于机厂洪森和边渡两位厂长因个人恩怨始终不和，洪森坚持严惩常袁二人，边渡就别着劲，坚持不让处理，并称这是盖绞车房时铺柳条笆留下的隐患，烟囱跑火烧着绞车房，不能怪工人，两人各持己见，加上扎赉诺尔株式会社考虑到边渡是竹中剑三的亲戚，极力支持边渡的意见，这就使常双贵和袁秀章免遭了毒手。

4、泄怒气，机库燃烈火

1944年仲夏，天气异常的炎热，闷得人们透不过气来。这样的天气，加上驾驶楼里不通风，锅炉又烤人，使得又饿又热的机务人员目锈体乏，难忍难熬。根本无心干活，满腔怒气，只有在活计上撒法子。一天，一台机车进库后，司机拉足气门，大开送风器，炉膛里的火星不断顺着烟囱向上冒。因为机车库（机车库房，在老电厂北侧）是用木板钉的临时库房，为了保暖，库房顶上铺了很多锯末，没有任何防火措施，库房

的棚顶喷进了火星，逐渐地燃烧起来。当人们发现时，库房内已是大火弥漫，一些中国工人乘混乱之机溜之乎也。火越烧越旺，人不能靠近，无法扑救。这场大火共烧了五个多小时，烧毁了两台机车，使扎赉诺尔煤炭产量一下就跌了下来，打乱了侵略者的掠夺计划。

机车库着火后，日本人不停地追查火灾原因，始终未能查出结果。他们首先确定是电源短路引起的火灾，但社长加纳金三郎觉得不妥。因为这样无法向他们的上级——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交待，急得如坐针毡。接着想出一条“蓄意破坏生产”的毒计，将所谓的可疑分子刘树良抓去，施行严刑拷打，什么老虎凳子，压杆子、灌辣椒水，用遍了酷刑。但刘树良是条硬汉子，始终未“认罪”。加纳金三郎毫无办法，只好派鬼子将刘树良押送海拉尔监狱关押起来。一直到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大炮打响，刘树良乘监狱混乱之机逃出来，才获得了自由。

四、粉碎炸井阴谋，喜迎扎矿解放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8月9日凌晨，一百多万苏联红军在远东四千多公里的战线上同时发起了全线进攻。

扎赉诺尔也和我国东北其它边防一样溶合在

战火之中。

8月10日，上班的汽笛一连响了几次，可是工人们象什么也没有听见。根本没有想着上班的事，每个人照样干着自己该干的事情。炮声一阵紧似一阵，人们的喜悦心情，随着炮声的紧迫而高涨着。日本监工谷田象被打伤的恶狼嚎叫着：“皇军的打炮，演习的有，快快下井干活，不干活的统统死了死了的。”边骂边赶工人下井，还拦截着下班升坑的工人，不让升坑。他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几十名上下班的工人，聚集在大巷里。今天大巷里的气氛和往常大不相同，上班的工人和下班的工人都在议论：“满洲里那边炮声不断，可能是红党（指苏联红军）打的，日本鬼子可能要完蛋了……”突然，董义德发现大巷上头射过几道明亮的矿灯光线。忙说：“鬼子下来了。”但那几道灯光只是在大巷上头来回窜动，好像在干什么。大家一同注视着大巷上头，发现鬼子正在大巷上头，用电钻打眼，鬼子想干什么？大家很纳闷？不大一会儿，董义德如梦醒来，明白了鬼子要干什么，大声喊着：“工友们，鬼子要崩坑口，想把我们活埋在这里！”大家一听，恍然大悟，操起工具，蜂涌而上，直向鬼子扑去。在井下大巷里和鬼子展开了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因为工人人多势众，团结一致，加上平

时就恨透了鬼子。于是越打越红眼，井下鬼子见势不妙，夹着尾巴拼命往上爬，工人们在后面紧追不舍，一直追到井上，鬼子逃得无影无踪了。一场崩井埋人的毒辣阴谋被粉碎了。

在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和苏联红军飞机大炮的威逼下，日本兵营的鬼子和矿上的鬼子扶持着勤劳奉仕的人（准备在逃跑不了时，让其充当炮灰和人质，待逃脱以后，将其全部杀掉），狼狈逃窜。

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十几年的扎赉诺尔煤矿终于解放了！饱尝亡国奴滋味的扎赉诺尔矿工和人民解放了！

掠夺达赉湖渔业资源的组织
——兴安水产株式会社

张志波　整理

此材料是由张跃庭同志提供的。张跃庭同志从1923年就在达赉湖捕鱼，经营洪兴泉渔号。曾担任渔业会负责人，伪兴安水产株式会社事业部部长。解放初任达赉湖渔场副厂长，现已离休。

达赉湖，又称“呼伦湖”或“呼伦池”。是我国的第四大淡水湖，内蒙古的第一大湖。达赉湖位于呼伦贝尔高原西部的新左旗、新右旗和满洲里市之间。湖内产三十余种鱼类和秀丽白虾，水生植物丰富，湖畔水草丰美，同贝尔湖一起被誉为呼伦贝尔草原上的明珠。

但是，富饶美丽的达赉湖，在昔日曾被沙俄和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和蹂躏。

1931年9月18日事变，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之后，日本人若山春生与日伪政权勾结，企图霸占达赉湖，垄断湖区渔业生产。他们首先通过满洲里工商会的日本翻译丁伟生，对在达赉湖捕鱼的商号、网数、爬犁、车辆、马匹等工具进行秘密清查，1935年5月，伪满洲国蒙

政部按照若山春生霸占达赉湖渔业生产的想法。派人对达赉湖水系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在调查中证实了达赉湖水域宽阔、资源丰富、鱼户众多，鱼具齐全，是捕鱼一本万利之地。因此，按照伪满洲国蒙政部调查的意见，日伪政权以安定湖区渔业，维护水产生产，培养湖内资源为借口，决定成立兴安水产株式会社，以达到垄断渔业生产的目的。他们通过威胁、利诱之手段，逼迫中国商号无路可走。经过中国商号的反抗和斗争，才以30%——40%作价，分四期偿还，强行收购网点二十七处。他们不仅强行征购网具，连技术人员也不让走，不干也不行。他们安下了特务侦探，谁要不满，就受皮肉之苦。中国技术人员只好在日伪统治下，被迫为其捕鱼。

经过三四年的纠葛，兴安水产株式会社计划于1939年9月成立，派日本人若山春生来满洲里操办渔业，组织会社。在办理手续当中，爆发了“满蒙边境战争”（诺门汗事件），未能如期建立。到1940年1月，若山春生在当时兴安北省公署参事官河内、新巴尔虎右翼旗参事官松本等日本人及满洲里工商会的翻译丁伟生等人的帮助下，正式成立了兴安水产株式会社。

兴安水产株式会社成立以后，临时本部设在扎赉诺尔，办公地址在原“利泰”商号，1941

年春天迁往满洲里三道街西头，几个月以后社址又迁到满洲里二道街西部“远东道胜银行”（今二道街小学附近）。

兴安水产株式会社成立后制定了社徽。社徽是用蒙文写成“兴安”字样并带有六角形的图案。

兴安水产株式会社设专职董事亦称常务董事二人，非专职董事三人，监察一人。

下设一课六部，五个事务所，三个场，并有其他附属设施。

一课是总务课，下有收发、文书和总务员，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和建筑维修。

六部是经理部，主管财务；事业部主管渔业生产；劳资部主管开资；用度部主管物资供应；增殖部主管水产养殖；车机部主管车辆运输。

五所是扎赉诺尔事务所，负责渔货销售；东河口事务所，负责呼伦湖（达赉湖）东岸的捕鱼生产，有十合冰下大拉网；四号事务所，负责呼伦湖西岸的捕鱼生产，有十五合冰下大拉网；哈尔滨营业所，负责业务联系并组织渔货市场；海拉尔事务所，负责同兴安北省公署进行业务联系。

三场是农场、牧场、增殖场。农场场址先设在二道井街，后设在免渡河，种地一万多亩，主

要种燕麦等马料，以自给为目的。牧场设在达赉湖北岸、养乳牛二百余头。生产奶油、奶酪。增殖场建在东河口事务所，是以增殖鲤鱼为目的，进行基础调查和生态研究。

兴安水产株式会社的专职董事若山春生和丁伟生；非专职董事有新巴尔虎右翼旗旗长善吉米图布。新巴尔虎左翼旗旗长林兼，株式会社代表村竹芳雄，监察人是兴安北省兴农合作社的理事长。总务课长弓均兼雄；经理部长山本广吉；事业部长张跃庭；劳资部长斋藤满五郎；用度部长王汝辑；增殖部长弓场；车机部长毛克新。扎贲诺尔事务所负责人姜孟九；东河口事务所负责人姜立英；四号事务所负责人杨占山；哈尔滨营业所负责人吉野村夫；海拉尔市事务所负责人森雅登；农场负责人横道谕；牧场负责人弗利普；增殖场负责人浅黄谷成城。四号小学负责人姓刘；兴水工会负责人增野；鱼栈负责人赵镜轩。

１９４０年在达赉湖西岸的四号事务所建立小学校一处。在满洲里头道街建立了兴水工会、根据当时社会结社情况，规定了入会资格。兴水工会内设有医疗所，建在满洲里市区八乍市。在扎赉诺尔用石头、水泥建筑了能容纳二十辆汽车的车库及修配处，库内有地槽和暖气装置。在四号事务所建了一栋四百多平方米的小楼，楼上建

有岗亭，楼内设有办公室、宿舍和食堂。岗亭环视三面，向北看小河口，向东看东河口，向南看到四号以外的大部分水面。东河口事务所的房屋建筑因当时没有石头，建的是土坯房屋。岗亭建筑也环视三面，室内天棚地板，油漆刷墙，并从外地购入了全套的办公桌椅。还有仓库和车库等建筑。在扎赉诺尔建立了转运所的办公室、车库和仓库。为捕捞和外运渔货作了配套建设。

兴安水产株式会社主要进行冬季冰下大拉网生产。每年开网二十五合，招用渔工八百人，租用马四百匹、马车几百辆。在夏季明水网生产中，网合数量不多，捕鱼数量不大，主要在乌尔逊河和达兰鄂罗木河上进行。年捕鱼量在四至五千吨左右。年收入在五百万日元左右。

兴安水产株式会社主要通过中国捕渔工长来组织和领导捕鱼生产。每年开网前由工长招用渔工，租用马匹和马车。应招渔工要同各渔场日本掌柜的订立合同。吃的、用的先由掌柜的垫付，扣网后扣回。鱼货实行四六分成，渔工获四。冻鱼销售市场主要设在满洲里最大的集散地——四平街，并且掌握了数家鱼栈，独揽了价格，控制了外情。有时也发往安达、哈尔滨、长春等地。

１９４５年“９·３”后，祖国光复，兴安

水产株式会社瓦解，达赉湖重新回到人民的怀抱。

鄂温克族的痛苦遭遇

薛双喜　整理

日伪时期，散居在索伦旗北区的特泥河、莫尔格河两个苏木和额右旗三河、拉布达林等地区的山谷、河岸、林间、草地上的通古斯鄂温克民族是以狩猎、游牧为主，文化落后，人口极少的弱小民族。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政治上受歧视而不得信任，经济上受掠夺和剥削，整个民族挣扎在死亡线上，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一、日伪时期通古斯鄂温克民族的政治、经济情况

１９３２年冬，日本侵略军占领呼伦贝尔地区后，１９３３年的夏天鄂温克牧民在莫尔格河夏营地，头一次看到了个子不高，身着黄色军装的日本人。日本人来到莫尔格河草原后，把通古斯鄂温克民族视为从苏联过来的民族，对其在政治上不予信任，采取了拉拢利用的政策。日本人为实施这一政策，首先从中青年鄂温克牧民中征大量的兵丁，充当伪满国兵和边境警察的同时，又从鄂温克人居住的各苏木，抽调一名公务员，

送到王爷庙伪国兵军官训练所进行培训，培养了伪国兵第一批军官。（这个军官训练所，后来成为伪兴安军官学校）当时从这个军官训练所毕业的鄂温克人普格吉苏（原特泥河苏章锦嘎日迪的胞弟），后来普升为伪满少校军官；原莫尔格河苏木公务员，名为怕什克的鄂温克人，后来也担任了伪国兵上尉连长职务。

从小生活在山区草地的鄂温克青年，被抓当了国兵和警察进城后，随着生活条件和周围环境的变化，有些人养成了吃、喝、嫖、赌的恶习。更为严重的是，其中有的人嫖宿妓院而染上了梅毒病。这些患有梅毒病的士兵，从部队复员回乡后，又将梅毒病带到鄂温克人聚居的地区，使一些鄂温克牧民染上了梅毒病。由于当时梅毒病的蔓延，严重地影响了整个鄂温克民族的身体素质和人口的增长。

伪满洲国成立后，通古斯鄂温克人居住的特泥河、青格尔、那吉以及在苏联边境的黑山头（呼和道布），额尔敦陶勒盖、哈日诺尔等地都驻扎了日本兵和边境警察。牙克石警察本队也给鄂温克牧民发了边民证，从而控制了鄂温克人在边境地区的活动。警察特务也横行在鄂温克人聚居的地方，探听和注视鄂温克牧民的言行、活动，倘若谁要不小心乱说乱动的话，谁就将遭到

警察特务的逮捕和关押，将会大祸临头的。

１９３７年，三河的日本特务机关以搜捕苏联特务为由，突然逮捕了居住在三河一带的通古斯鄂温克牧民高·达喜、普·占布拉、皮·米特克、阿力克谢、车车、布利西特旦巴等六人，关押在三河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多次进行严刑拷打，逼问其“苏联特务”的罪行。后来，日本将车车派往苏联境内搞特务活动，，但再无音讯，下落不明；高·达喜被日本人在其身上实注细菌药液，放回去后惨死在家里；皮·米特克等其他四人被送到三河军飞机场当了劳工，于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前，被日本兵用汽油烧死于三河飞机场。总之日伪时期鄂温克牧民残遭日本警察特务的迫害是对鄂温克人来说已成为屡见不怪的事情。

日伪时期，鄂温克牧民在经济上还承受着伪满洲国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的压力。每年七月份牧民向伪满洲交纳各种税金(用牛、羊折税金)的同时，为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和畜产公司的收购任务而交售大量的牲畜。当时畜产公司收购牲畜的评价员。对牧民非常刻薄的。他们把牧民交售的能出八普特以上肉的大牛，只给评３—４普特肉；给成年膘满的大羊给三元钱的价格。对此鄂温克牧民老乡是敢怒不敢言。倘若谁敢和评价员就牲

口价格问题讨价还价的话，就会遭到日本兵和警察的一顿毒打。那时牧民们老乡挨了打，吃了亏也无处去说理的。当时，鄂温克牧民除完成上述任务外，日本人也年年从鄂温克牧民征购良种军马，因此，鄂温克牧民手中能骑用的骟马也已所剩无几。到后来有些牧民放牧骑用的马也被日本人牵走，达到了牧民步行放牧的地步。

日伪统治时期，通古斯鄂温克牧民的生活水平是年益下降，其生活用品的供应也是非常紧张的。当时给鄂温克牧民的粮食供应是，按月限量供应发霉变质的粗杂粮。烟、酒、糖、茶之类的日用副食品，牧民老乡在平常是根本见不到的，牧民老乡由于喝不到茶，只好用一些草生植物来代替茶食来用。穿带的棉布之类更为紧张，由于牧民手头无钱购买当时供应的数量极少的黑白洋布，只得穿廉价的更生布或用羊皮，兽皮制做衣裤穿用。总之，通古斯鄂温克民族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下，在政治上残遭迫害，经济上遭受掠夺，生产力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已到了极为贫穷的境地。

二、通古斯鄂温克民族被迫南迁的经过

康德五年（1938年），伪兴安北省政府决定，将索伦旗北区的南屯，莫合尔吐，特泥河、莫尔格河四个苏木，以特泥河为界重新划给索伦

旗和陈巴尔虎旗。从此特泥河以南的南屯，莫合尔吐苏木归属索伦旗；特泥河以北的特泥河、莫尔格河二个苏木归属于陈巴尔虎旗。陈巴尔虎旗接收特泥河、莫尔格河两个苏木后，将二个苏木合并为一个苏木，命名为特泥河苏木，在特泥河阿迪盖设了苏木政府，委任通古斯鄂温克人巴日迪为特泥河苏木章京。

由于通古斯鄂温克民族是从苏联过来的民族，又和苏联人杂居在边境地区的原故，日本人对鄂温克人是又恼恨，又不放心的。所以，借索伦旗和陈巴尔虎旗重新划分索伦旗北区四个苏木的机会，密谋策划了强迫通古斯鄂温克族南迁的计划。从此，生活在特泥河、莫尔格河草原上的近百户通古斯鄂温克牧民，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倾家荡产，背井离乡，南迁到大兴安岭北坡的沙巴尔吐，莫盖吐、乌鲁西、乌兰岗等地（属索伦旗所辖）重新安置和料理各自的生产生活。在特泥河、莫尔格河两岸肥美的草场上生长的牛马羊，随主迁到大兴安岭北坡地区后，由于不服其寒冷的气候，粗糙的水草的原故，大量牲畜开始死亡，整个民族的畜牧业生产遭受了严重的损失。原莫尔格河苏木的通古斯鄂温克牧民阿里巴·拍玛，南迁时拥有三十多匹马，四十多头牛，三百多只羊的富裕户。由于被迫迁住到大兴安

岭北坡的乌鲁西后，由于牲畜不服气候、草场，加之又吃不到盐碱等原故，几年的光景里其牲畜全部死光，全家人迫于生活，只好上山狩猎为生。当时，象阿里巴·拍玛一样失去全部牲畜，由富变穷的牧户，在被迫南迁的鄂温克牧民中是普遍存在的。

被迫南迁的通古斯鄂温克牧民，虽然日夜思念自己的故乡，不习惯生活在大兴安岭北坡地区，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殖民统治下，谁也不敢擅自搬回原来的故乡。待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从1947年开始，南迁的通古斯鄂温克人才逐步搬回特泥河、莫尔格河草原的。

三、“快抢队”始末

通古斯鄂温克人高·巴德玛，出生在苏联，会说俄语，聪明精干而很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他于1938年从三河当国兵，1940年复员到海拉尔协和会工作。1941协和会以扶持边远山区少数民族贫困牧民生活为由，派高·巴德玛到通古斯鄂温克人聚居的特泥河苏木负责组织狩猎队。高·巴德玛到特泥河苏木后深入到鄂温克牧民中间，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动员工作，先后有普·伊利亚、车·特木勒、普·吉格吉德、达·旦金，古·达喜，桑·伊万等十二名能说会道，

旦金、古·达喜、桑·伊万等十二名能说会道，善长打猎的通古斯鄂温克穷苦牧民报名参加了狩猎队。从而以高·巴德玛为首的狩猎队宣告成立。狩猎队刚成立时其设备条件极为简陋，猎手们骑着各自的马，扛着原始落后的列旦枪，走进深山老林。由于狩猎队上山初战告捷，猎取了不少猎物，有了可观收入的原故，狩猎队的名声大振，在鄂温克牧民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在此同时，狩猎队的成立也引起了牙克石警察本队和日本人的注意。日本人为了拉扰利用这个由鄂温克牧民组成的狩猎队，首先由牙克石警察队发给了枪支弹药，更新其设备条件后，让狩猎队负责完成安定特泥河地区地方秩序，追剿匪盗的任务。从此以高·巴德玛为首的狩猎队，继续开展狩猎活动的同时，积极完成警察本队的各项任务，从而深得警察队和日本人的信任。日本人也从实际工作中充分认识到利用这一不穿军装，不拿工资的少数民族武装力量的真正价值，让其继续完成侦捕苏联特务 ，探听鄂温克牧民中反日反满的言论活动等政治任务。从此，狩猎队的大名威振整个特泥河地区，鄂温克牧民老乡在开始称狩猎队为“快枪队”的同时，给出卖民族利益，效忠于日本法西斯的高·巴德玛也起了一个“狗腿子巴德玛”的绰号。

１９４３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修筑从牙克石

通往黑山头的日军专用路线（未修成日本就投降了），从内地抓来大批劳工，在特泥河东北侧的额莫勒哈达山开始挖山修隧道。日本人为保护这一隧道，特调来熟悉当地地形，懂得少数民族语言的“快枪队”来担负保卫额莫勒哈达山隧道的任务。据说，“快枪队”进驻额莫勒哈达山后，日军方面按月发给补助工资。这时的高·巴德玛也已成为身着伪警服，腰挎大洋刀的警官。

回顾由鄂温克牧民组成的狩猎队所走过的路，高·巴德玛其人，于1940年复员后到海拉尔协和会工作时就成为日本特务。他授日本特务机关的指意，打着扶持鄂温克贫困牧民生活的旗号，来特泥河苏木欺骗和拉拢鄂温克牧民组织了狩猎队后，在高·巴德玛的唆使和日本的拉拢引诱下，狩猎队最终被潜移默化，变成了身穿牧民服装，维护日本法西斯利益，受日本人控制的少数民族地方武装力量。出卖民族利益，卖身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高·巴德玛也未能逃出人历史的惩罚，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被苏联红军抓获、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四、一个“逃兵”的遭遇

通古斯鄂温克人里·钢克是出生在苏联，会说俄语，体力强壮，爱好打猎的勤劳勇敢的人。他从小失去了父亲，伪满洲国成立时和老母亲居

住在特泥河苏木沙巴尔吐村，过着非常贫困的生活。里·钢克于1938年被抓当国兵到伪满第十军管区第八团驻防蒙古边界的一个连里当战士。

1939年诺门汗战争爆发后，日本将大批伪国兵调到诺门汗战场，将成千上万的蒙、汉、达、鄂等中华各民族健儿推到战火纷飞的前线，为日本帝国主义当炮灰。里·钢克所在连队也被调到第一线，日夜守防在战壕里，随时都有死的危险。里·钢克在这生死关头怀着不为日本人当炮灰，保住自己年轻生命的念头。于七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单人独马逃离了诺门汗战场的所在连队，跑回自己的故乡沙巴尔吐村。为防备警察宪兵的追捕，里·钢克白天隐藏在屯子北山的桦树林里，晚上偷着回家吃一点茶饭，开始过了不见人烟的隐匿生活。由于诺门汗战争期间，曾多次发生伪国兵逃离战场的事件，日军方面给各省、旗、苏木、嘎查，逐级下达了追捕“逃兵”的紧急命令。当时沙巴尔吐嘎查达，名为普郎克的鄂温克人，在上级的命令和警察的威逼下，只好向当时的扎罗木德警察所透露了里·钢克逃回沙巴尔吐村，藏身于北山桦树林的一些情况。警察所得知这一情况后，海拉尔日本宪兵队方面当即派警察宪兵到沙巴尔吐村和北山附近开始追踪里·钢克。在此情况下，藏在山林里的里·钢克因又冻又

饿忍不下去，于九月初的一天夜里偷着回家时被早已隐蔽守候的警察宪兵捕获。

日本宪兵队方面抓到里·钢克后关押在监狱里，审问其逃离战场跑回沙巴尔吐村，隐藏在山林的一些情况后，作出了“没有发现其他重大问题，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交给了原所在部队伪国兵第八团，送回原驻守蒙古边界的连队里继续当战士。里·钢克被送回连队后，在“逃兵”这顶政治帽子的压力下，其思想情绪始终安定不下来，日夜盼望有朝一日能够获得自由生活。尤其是，日本法西斯管制下的没完没了的军事训练，日本军官的骄横野蛮，挨打骂的非人生活，不平等的生活待遇，激起了伪国兵们的不满情绪，再次导致了里·钢克二次逃离连队的事件。里·钢克的这次逃离连队是，于1940年9月上旬的一天夜里，他偕同连里一名大个子布利亚特士兵，各骑一匹马，携带一杆“三、八”枪和子弹，再次逃离所在连队，跑回沙巴尔吐村到家看望老母亲后，又转移到额莫勒哈达山的深山密林里，再次开始了不见人烟的隐匿生活。

秋去冬来，降雪变了天，藏身于额莫勒哈达山里的里·钢克和大个子布利亚特士兵，为安全渡过寒冷的冬天，在德日莫勒吉峪里挖地窨子准备住处的同时，又从牧民老乡的马群里偷杀了一匹骒

马和捕猎一些野兽解决过冬问题，想在这人烟稀少的深山老林里安心渡过这一冬天。但是，天下的事往往是事不从心，扎罗木得警察所方面又探听到了里·钢克和布利亚特士兵隐藏在额莫勒哈达山的消息后，海拉尔日本宪兵队立即派了二十来名警察宪兵到额莫勒哈达山搜捕里·钢克和布利亚特士兵。于十一中旬的一天，搜山的警察宪兵从德日莫勒吉峪的林间草地上发现了二个带拌子的马之后，确认里·钢克和布利亚特士兵隐身于这个峪。于是警察宪兵立即停止了搜山，隐避在山峪的密林里探听动静，观察情况，决定天黑后再行动。警察宪兵们等到天黑，从密林深处发现了里·钢克所住地窨子的灯光之后，二十来名警察宪兵顺着灯光包围了地窨子，占领了周围有利地形，喊话命令其地窨子里的人交械投降。被包围在地窨子里的里·钢克听到这一突如其来的喊话之后，虽然马上息灯摸到了枪，但他又悟出了在这黑夜里被围困在这地窨子里，如反抗只会死的后果之后，和大个子布利亚特士兵商量，交械投了降。

里·钢克第二次被警察宪兵抓获，被送到海拉尔日本宪兵队监狱里关押了一年之后，于１９４１年又被移送到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的监狱里关押。里·钢克被转送到齐齐哈尔后，他母亲曾为

他寄去了衣、帽、鞋、袜等生活用品。可是寄去的邮包原样被退回到沙巴尔吐村，家里人从此再也没听到里·钢克的音讯。有关里·钢克的下落，于1947年据住在陈巴尔虎旗浩特陶海村的名叫伊万诺夫的苏联人说：他于1942年被关押在齐齐哈尔日宪兵队监狱时，曾和里·钢克被关押在一个监号里。当他们相互认识为老乡后，经常用俄语通话。后来日本人发现了这一情况，就把里·钢克转押到别的号里，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惨遭日本兵的枪杀。这个少年丧父，年轻时被抓当国兵的里·钢克，由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曾二次逃离伪国兵所在连队，最后死于日本法西斯的枪口下。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杀害我中华各民族同胞的又一罪证。

注：我们为了搜集整理有关“日伪时期鄂温克苏木民族的一些情况”，专程到鄂温克苏木找了几位有阅历的老人进行了采访。我们采访的老人有：

1、米·皮道、鄂温克族、78岁、牧民出身，住哈吉屯。

2、乌、沙日皮勒、鄂温克族、74岁、牧民出身，现住哈吉屯。

3、额勒德苏、鄂温克族、73岁、毕罗特

队牧民、年轻时在伪国兵七团机枪连当过战士。

4、普郎克、鄂温克族、61岁（前不久逝世）、原会屯队党支部书记。他是文史稿里所述的里·钢克（逃兵）的亲侄儿。

5、怕皮拉、63岁、直属牧场牧民，曾给苏联人当了二十一年的雇工。

鄂温克猎民的苦难生活

古德林　回忆

雅库特鄂温克猎民，长期居住在额尔古纳河畔的深山老林里，以打猎和饲养驯鹿为生。日伪统治时期，受尽了残酷压迫和剥削。至今，老猎民们不忘那极端难熬的日子。

早在十七世纪中期，沙皇俄国的魔爪就伸向这里。清朝雍正五年，在这里设了卡伦，清朝被推翻，又来了东北军阀。历来的反动统治都对鄂克人施行大民族的统治，勒索猎物和珍贵的皮张，强迫猎民交“枪票费”。日寇侵战东北后，给这里的猎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１９３２年１２月，佩带着武器的日本兵，乘坐苏联商人别列考夫的马爬犁，从海拉尔出发到乌启罗夫附近的伊力坎，以做买卖为名观察鄂温克猎民的情况，十几天以后返回海拉尔。1935年3月，三百多名日本军人从海拉尔坐汽车到乌启罗夫安营扎寨，不久就收了猎民的枪支，把男女老少都赶下山，重新“选举”了鄂温克猎民的最高头领“阿塔曼”。1938年夏天，一个自称为白连成的蒙族人和日本上尉小野，强迫鄂温克猎

民大维格德当向导，骑马上山走遍鄂温克猎民的各个部落，进行了欺骗游说。从那以后，猎民不能再到过去经常交易的乌启罗夫，只能在离屯三华里的河边扎“撮罗子”，附近插上旗子，禁止其他民族的人和鄂温克猎民接近，对鄂温克猎民实行隔离的反动政策。猎民出售猎产品购买粮食等物品，只能去新建的满洲畜产株式会社，遭受盘剥。1940年，日寇在阿巴河建立了据点，有四栋木刻楞房子，住着三十多个日本兵，这个地方不许猎民靠近。当年的5月，日寇和白连成又到各部落下令，指定了7月10日下山的男猎民参加训练。被迫参加训练的有八十多名猎民，年高的七十岁，最小的只有十四岁。以后分期分批轮训猎民，每期约四十人左右，每两个月一换。由白连成当翻译，每天早上五点起床，进行立正、稍息、齐步走的训练和奴化教育。由于语言不通，训练时稍有不对，就受到日寇的拳打脚踢、鞭子抽打。除训练外，大部分时间是给日寇干活，日寇荷枪实弹，枪上刺刀，监视猎民劳动。日寇把鄂温克猎民视为栖林野人，根本不当人看待。日寇还恶意制造隔阂，拨弄是非，企图使各部落之间互不相信，互相格斗，达到以鄂温克人牵制鄂温克人的罪恶目的，以巩固其反动统治。

日寇对鄂温克猎民实行法西斯统治的同时，

又成立了东蒙贸易公司，对猎民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和剥削。当时，日寇用一个弹壳换三张灰鼠皮，一包火柴换一张灰鼠皮，半斤普通茶叶换八张灰鼠皮。猎民集训期间，吃自己的粮食，给日本人干活。猎民到满洲畜产株式会社买粮时，交了钱就把男猎民的口粮扣下，由日本人拿到训练所。猎民在训练期间不能从事生产，没有猎产品换不回粮食和日用品，因而家家缺吃少穿。猎民妇女买不起花布做民族服装，只能买白布，用红豆、越桔等野果染色，做衣服穿。买不起肥皂，只得用"阿拉成哈"（松树蘑菇）代替使用。买不起粮食，只得采集野果、草根充饥。鄂温克语"吉其基那""吉布松的"这两种草，是猎民断粮时赖以维持生命的食物。缺医少药，各种疾病蔓延，一旦发生流行病，更是无法控制，人口急剧下降。十七世纪，这里的鄂温克猎民有七百多人，1945年日寇投降时只剩一百三十人左右。解放初期，幸存的一百三十六名鄂温克猎民，百分之七十患肺结核。这是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特别是日寇灭绝鄂温克族猎民的铁证。

鄂温克猎民是不甘屈服的。他们被迫到日寇东大营训练期间，有的装病不出操，有的罢工，有的逃跑。有个二十七岁的叫大拉菲的青年，一再公开地和日本人对抗，被日本人用鞭子打得死

去活来，皮开肉绽。大拉菲忍受不了日寇的毒打，从悬崖上跳河自尽。此事激起鄂温克猎民的极大愤慨，猎民们汇在一起要找日寇算帐。日寇一看势头不好，怕猎民闹事，让猎民“阿塔曼”出面，从河里捞出大拉菲的尸体，按照猎民的风俗习惯安葬，用欺骗方法平息了即将爆发的反抗运动。

苏联红军在1945年8月15日夜12点，攻打乌启罗夫的日本兵营。鄂温克猎民们纷纷组织起来，根据苏联红军的意图，参加追捕逃跑日寇的战斗。

8月24日，十五名鄂温克猎民在昆德依万·伊万杰列果罗夫的带领下，在艾牙苏克河搜索到二十一个日寇，经过一场激烈战斗，打死十三个日寇和一匹军马，缴获战马八匹和不少枪支弹药，其余八个日寇被追到金河附近全部被击毙。

克马嘎拉、小八月、阿里山德、老八月等猎民，在满归河对面的西洼地带，发现从斯大潦克方向奔逃的六个日寇，猎民当即予以击毙。在牙库斯克、嘎年等地发现从漠河逃跑的九个日寇，也同样遭到猎民们的全部击毙。

猎民们把击毙的日寇帽子摘下来，衣服扒下来，交给苏联红军指挥部，以证实打死日寇人数。

自从来了共产党，居住在这里的鄂温克猎民才获得了解放。党和国家非常关怀旧社会世世代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鄂温克猎民。为了发展生产改善猎民的生活，经过和猎民商量，猎民们在五十年代从乌启罗夫搬到资源丰富、风景秀丽的额尔古纳左旗敖鲁古雅，以后成立了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全乡面积一千多平方公里，世代居住“撮罗子”的猎民，住进了宽敞明亮、木结构的房屋，以后又搬进了砖瓦结构的新居。

民族乡所在地的建设是按民族特点、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和内地先进经济结构规划的。在国家的扶持和猎民的努力下，民族经济文化事业发展很快，新建的工厂、商业服务业和中小学、医院的楼房交相辉映，呈现一派生机，由原始社会末期直接跨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鄂温克猎民，过着美好幸福的生活。

额尔古纳河畔反满抗日点滴

额右旗政协供稿

现在的额尔古纳右旗，地处额尔古纳河畔，同苏联隔河相望。日伪时隶属兴安北省。日寇为了加紧对我国人民的镇压和防止苏联红军越境，在这一地区设立了两个旗级机构。将原室韦县改为额尔古纳左翼旗，简称东旗；将原奇乾县改为额尔古纳右翼旗，简称西旗。据当时统计，这两个旗的总人口不超过三万，共有五十六个自然屯。这两个旗除设有旗公署，分别驻有关东军外，还设置了宪兵队、警察队、协和会、营林署、兴安合作社、畜产株式会社、排木会等等。当时，这两个旗仅宪兵、警察、特务组织就达三十三个。如：宪兵队两个、特务机关一个、大队两个、中队五个、小队二十三个。为了侦察我国人民对日伪的反抗活动，还有许多以各种社会职业为掩护的日本特务机关外围组织，各种军、警、宪、特组织星罗棋布。

阴险的日寇为了拢络人心，当时旗公署的旗长由蒙族或达斡尔族担任。就在当时，人们也知道，旗长是个傀儡，真正实权操纵在日本人担任的参事官手中。

额尔古纳右旗与苏联的边境线长达六百多公

里，当时原始森林面积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是苏联红军到伪满洲国搞侦察的理想地区，所以日寇戒备森严，倍加防范。其手段之一就是以“反满抗日”、“通苏”、“政治犯”、“经济犯”等等罪名，随意抓人，残酷镇压。只要日伪怀疑谁，谁就被抓。凡被抓的人，都是九死一生。当时太平镇是个不足二百人的自然屯，被各种罪名惨遭杀害的就有十几人。居住在毕拉尔河的刘传仁夫妇，只因屯子与苏联人同饮一河水，冬季的取水点（冰眼）相距十米左右，刘传仁的妻子是苏侨，他们夫妇就被怀疑“通苏”而入狱。日伪警特对这两位老人施苦刑，百般折磨，两位老人宁死不屈。日寇多次对刘传仁用杠子压，灌辣椒水、拶指甲、指甲里钉竹签等惨刑而死。日寇竟残无人道地把刺刀刺入刘传仁妻子的阴道致死。死后暴尸荒野。居住在当时古纳屯的胡云德的儿子，年约二十四岁左右，名叫米什克（华俄后裔），日伪怀疑他“通苏”米什克被抓后越狱逃跑。太平镇屯的日寇警察队长泽田滨夫，指使日伪搜寻。有个姓李的木匠（名不详）不慎说；“昨天，我看见过米什克。”日寇闻讯后，把李木匠抓起来，逼问米什克的去向，李木匠说不知道，日伪军把李木匠打得昏迷不醒，米什克越狱后的一天夜间，想回家看看，被

日寇布置的潜伏哨开枪打死。日伪逮捕了米什克的父亲胡云德，严刑拷打致死。李木匠也被打得奄奄一息时，日伪就将他与胡云德埋进一个坑里。据当时在场的人讲，李木匠被埋时还喘气，伪警察抠动板机打了几枪才咽气。

至今，三河镇的老人们对1936年三河街（当时三河镇叫三河街）发生的惨案记忆犹新。那年的夏季，一次就有一百多中国人被捕。这次大逮捕的执行者是三河街的日寇宪兵队。人们知道宪兵队里有个日本人东原，和一个东北籍的翻译，经常利用一些苏侨和中国人中的败类，刺探所谓"反满抗日"、"通苏"的人。被捕入狱的人都遭毒刑，逼迫"反满抗日"、"通苏"的口供然后惨遭杀害。该日寇宪兵队的伙夫高盘起说；"那年大逮捕押在监狱的人，从供饭量推算，人数逐渐减少，日本鬼子在晚间用汽车把他们运走，相隔三个小时左右往返一趟，回来时都是空车。把人运到哪里去了，我们根本不知道。"

日寇为了防止居住在边境的人与苏联人来往，实行"净化"边境，于1942年（康德九年）实行"清边并屯"，对边境没有警察的自然屯，强行迁离。这次被清出边境的自然屯有十二个，九十五户，四百四十六人。伪满当局对被迁户不给分文，完全靠自己的力量离开家园。"净化"

边境给本来生活十分困难的居民带来了更大地灾难，加上伪警察趁机对群众敲诈勒索，被迁的人叫苦连天。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日伪反动势力的罪恶行径，激起人民一次又一次的反抗斗争。1937年至1944年的三起抗日行动，给予了日伪宪兵、特务、警察沉重打击。如：

（一）西口子金矿抗日暴动队

西口子位于额尔古纳右旗最北部，隶属奇乾管理，与苏联一河相隔，这里盛产黄金。从清代光绪末年以来，就有人开采，到本世纪三十年代，西口子金矿采金工人已增至两千多人，包括工人在内共有居民四千多人，成为边疆奇乾县当时人口最多的小镇。街面上商店、饭馆、赌局遍地皆是。仅妓女院就有十多家，往来行商络绎不绝，一时颇显繁华。

日寇侵占东北之后，从1932年，魔爪就伸到这里，日伪将奇乾改为额尔古纳右翼旗，伪满公署设在奇乾（伪满称吉儒木图），军警遍布，对百姓实行残酷统治和镇压。日寇设立了“产业公司”和“北满公司”，进行经济掠夺。西口子金矿归属这两个公司的派出机构管辖，有日本人二十名，当时额右旗所有金矿被这两个公司操纵。

那时西口子金矿有两个主要矿场，一个叫八

道卡，一个叫阿力亚。淘金工人两千多名，年产黄金一万余两。工人所采的黄金，如数由公司廉价收购，不准私藏。对工人出入矿井，采用严格的搜身办法，防止工人带出黄金，淘金工人收入微薄，倍受剥削和压迫，稍有不满，就会遭到残酷镇压。

1937年春，正当西口子金矿工人处于极端困苦的时候，由外地来了两名新工人，一位叫黄金宝，当时二十多岁年纪，一位姓马（名字记不清了）自称是黑龙江省黑河来这里谋生的。不久，他们被派到八道卡矿场当了采金工人。

这两人到来以后，经常由浅入深的向淘金工人讲述工人在日寇统治下的悲惨遭遇，过了一段时间，黄马二人在矿中结识了八名矿工骨干，经常在一起聚会言谈。并向一部分工人宣传："只有大家起来反抗才有出路"。通过不断的宣传酝酿，激发了淘金工人对日寇的仇恨。工人们坚决表示，一定要起来反抗。黄、马二人和八名骨干，看条件基本成熟，详细商讨了这次反满抗日的行动计划。

1937年9月上旬的一个晚间，黄、马二人召集八名骨干，拿出由黑河带来一直密藏的两支手枪，全部佩带起写着"反满抗日"的红袖标，冲进了日本鬼子的住处，把住在这里的八名日寇全

部缴械，对其中六名作恶多端的当场处决。其他两名一个叫秋森，一个叫玛米三，这两个人平时对工人态度较好，暴动队伍认为应当区别对待，对他俩予以宽大释放。此二人当时感动得痛哭流涕，立刻就“逃之夭夭”了。

当工人们听到枪声，并得知这一胜利后，人心大振。缴获了十来支枪和一些子弹，队伍也扩大了。暴动队经过简短商量之后，黄、马二人当即决定，事不宜迟，立刻开赴西口子。到西口子时，反满抗日队伍已扩大到一百多人。住在西口子的十二名鬼子，当场被打死十名，重伤一名，另一名持双枪负隅顽抗，后经西口子商会会长（姓名记不清了）出面和暴动队商量：“如果全部消灭不留活口，一旦日寇大批军警来到，西口子必然遭到血洗，不如留他一命，和他约法三章，日寇来时叫他出面交待，说这次暴动是一支有领导、有组织的队伍，行动后就过江投奔苏联了。不准他连累没有参加暴动的工人和居民群众。如不照办，将来出了问题拿他示问”。此时顽抗的鬼子已弹尽力竭，无法招架，为了保住性命他乖乖的答应了这一条件。就在解决日寇的同时，暴动队已分出一支力量攻打西口子警察队，恰巧当时警察队中的日本人不在，根据群众要求，只处决了一个民愤极大的伪警察刘荣久，并

缴获了警察队的所有枪支。

接连取得的胜利，使暴动队伍士气大振，迅速又作出了下一步行动部署，首先派人去苏联要求援助。得到弹药以后，就一鼓作气的分头解决乌玛警察队和漠河的日寇宪兵队。之后，由唐子恒等三人为代表，过江去苏联联系，苏联方面给了几支杂牌枪和一些子弹。由于武装力量不足，不能分头行动，只好等和打完乌玛警察队的人回来再去漠河。谁料，就在攻打乌玛队伍出发之后，已被驻在漠河的日寇发现，立即开着船只，带着大批军警向西口子开来。日寇不知西口子情况虚实，日伪军中的中国人准备向暴动队伍投降，但在日寇的严密监视下，无法联络，只是朝天开枪。后被日寇逼迫着机关枪平射，暴动队伍因分出大部枪支去乌玛，身边武器很少，难以御敌，除一名姓李的没跟上队伍被俘外，其余全部过江投奔了苏联。

攻打乌玛的暴动队伍到乌玛后，没遇到日本警察，只缴了警察队的枪支，没有伤害伪警察的性命。当这支队伍返回到木尺干时，得知西口子被围和暴动队伍已过江的消息，也就在木尺干坐船去苏联了。这次暴动队由西口子和木尺干过江到苏联的共有一百八十五人。

（二）伪警察的觉醒

1、牛耳河伪警察杀死了日本队长大场。牛耳河警察小队隶属吉如穆图（今奇乾乡）伪警察大队管辖。这个小队距大队所在地约五十多公里，全小队有伪警察十五、六人，小队长是日本警尉叫大场，他凶狠残暴，对伪警察经常开口便骂、举手就打。他让伪警察白天修工事、挖战壕、晚间站岗放哨、巡逻，监视苏联动向。伪警察中多数人逐渐认识到当汉奸的滋味，人人暗藏怒火，一旦得手，就要和日本鬼子拼。

伪警长孙喜胜携眷住在牛耳河。1940年8月的一天，大场趁孙喜胜外出之际，将孙妻（姓陆，名不详）强奸，孙妻终日哭哭啼啼。大场不以为耻，还要戏羞辱孙喜胜，孙喜胜忍不可忍，便与一些贴心警察讲了此事。大场的兽行激怒了伪警察，大家下了杀大场的决心，并研究了办法。中秋节那天，孙喜胜通知伪警察的伙夫，做了丰盛的晚餐。大家吃喝之后，大部分伪警察到郝家大车店赌博，大场回了寝室。当夜十二时左右，孙喜胜进一步布置了行动安排，一部分伪警察搞好警戒，孙喜胜带领一部分警察去杀大场，伪警察到了大场宿舍时，大场正在看书。孙喜胜从窗外对准大场连开两枪，击毙了大场。大场妻子被枪声惊醒，起来往外跑，她刚出门，就被孙喜胜一把提住头发，把她脑袋捺在门槛上，另一位警察用

莱刀砍下了她的头。随即将枪支弹药、文件全部搜集起来，放火烧掉了伪警察队的房屋。伪警察及其家属都集合在一起，研究越过额尔古纳河投奔苏联的大事。三十多人一致同意到苏联去，只有一个姓雷的伪警察不愿去。大家也就不管他了。三十多人坐着由群众绑好的大木筏，到了苏联，受到了较好的接待。这是由于苏方已发现了伪警察的行动。

那个姓雷的伪警察跑到伪警察大队报告了事件经过，大队立即派伪警察前往牛耳河。他们到达时，孙喜胜为首的三十多人已到苏联几天了。吉如穆图的伪警察收拾了残局，把大场夫妻火化以后，埋在牛耳河附近山坡上，立了一个小碑，上刻“以身殉职”。当地群众在１９４５年日寇投降以后扒掉了此碑。

２、伊穆河伪森林警察杀死日本队长和电报员。伊穆河也位于额尔古纳河畔，伊穆河伪森林警察小队属旗伪警察本队管辖。辖区上游至长甸（十自然屯）七十华里，下游至奇雅河（小自然屯）四十华里。辖区内北面临水，南面靠山林，几乎没有开阔地面。这个小队的编制二十人，日本青山担任小队长，还有一个日本电报员（名不详），其余都是中国人。他们大多是从当时的伪兴安北省的伊列克得、免渡河、乌奴耳地区森林

警察队调来。全小队包括家属共三十多人。

1944年8月，这个小队断了吃粮，伪警察们要求青山批准去旗所在地吉如穆图领粮，青山严肃地说："不经上级允许，任何人不许去吉如穆图"。伪警察只好到辖区内采木班（日本株式会社的一个采木班）借了一麻袋高粱米。吃了五、六天又断粮了，在伪警察断粮的时候，两个日本人依然吃着大米白面。伪森警卢二虎、傅二虎（真名记不清）再次向青山请示去吉如穆图领粮。青山不但不批，反而大骂："你们一袋高粱米这么快就吃完了，人的不是，狗的一样"！俩人遭骂以后，更感到当汉奸的滋味确实不好受，给日本鬼子效劳，不但不让吃饱还挨骂。于是便反口大骂："你们人的不是，狗的一样！"青山一听就往自己宿舍走去，正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的时候，卢二虎拿起大枪对准青山开了枪，青山应声倒下。这时傅二虎持枪控制枪架（统一放枪的木架），以防意外。

正在河边洗衣的日本电报员听到枪声，端起洗衣盆就往回跑，着见卢二虎手持大枪，开口就骂："×你的奶奶，什么的干活"？卢二虎反骂，接着开枪打死了日本电报员。

其实伪警察也早就恨透了日本鬼子，都认为打死鬼子做得对。考虑到人少力薄，伊穆河地区十

分偏僻，争取不到任何外援，大家就把两个日本鬼子的脑袋割下来，带着它渡过额尔古纳河，投靠了苏联红军。

我所知道的三河营林署

刘维善　口述
李福林　整理

刘维善是额右旗林业局原防火办公室副主任，现退休在家。他于1937年（伪康德四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后，任职到三河营林署的。先后充任过检尺员、雇员职务。根据他在营林署九年躬行实历的情况作一回忆整理。

一、伪满洲国营林系统的体制

伪满洲国在其国都新京（长春）设林业总局。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设林业局，所属林区设营林署。1936年在呼伦贝尔地区设有扎兰屯、海拉尔（牙克石林区当时归属海拉尔）、三河，三个营林署。"营林署"实为林业部门在各个地方的林政管理机构。它下属机构是若干森林事业所，乃是营林实体。

在营林署建置之前，地方林业由地方政府主管，而随着营林署的建立，其所经营之林业却自成一统。无论采伐、流运、销售均属林业自筹，自成体统，不受地区、地域约束，只有由林业总局、省林业局所辖。所以，当时三河营林署，统筹额尔克纳左翼旗、额尔克纳右翼旗，两旗林业的产、运、销等事宜。由此可见，当时的营林署，似中央、

省两级直属林政部门，也是当时政治、经济一体的单位之一。

二、三河营林署的组织、机构和人员

三河营林署主要业务，是组织计划木材采伐、调运、销售。同时掌管抚育、造林。就此业务范围，当时营林署下设机构有庶务、业务两科。

庶务科内设人事、财务、用度三个股；业务科内设官砍股（采伐）、一般处理、造林三个股。这一署、两科及下属机构，共有固定官员六十人左右，其中日本人约占三分之二，并都是林业中等专业以上学校毕业生。担任主管业务的科长杜布就是日本人；用度股股长小石，官砍股股长（采伐、调运等）葛之均是日本人，其他股股长也有中国人担任的。这些人都是省林业局直接任免。署长贾某当然是营林署的行政长官，那些股长也多系"委任官"、"委任官试补"，在下的雇员、佣人，皆是中国人供职。

三河营林署下设三个森林事业所。即三河森林事业所、吉如穆图（今之奇乾）森林事务所、南大窨森林事业所。原计划在牛耳河、乌玛、奇雅河、四大辽克（恩和哈达）等地都建森林事业所。

额尔克纳左、右翼两旗地域皆处额尔古纳

河右岸，地处满苏前沿，强邻对峙，境内有大面积原始森林，众水萦绕，木材积蓄量之多北满罕见。但是，尽管伪满洲国政府和日寇对此垂涎欲滴，终因面临强敌虎视，恐生边境事件而遭殃，故对拟建营林署之事也只好作罢，又兼陆路交通无力运输，只靠额尔古纳河水路，顺路二百五十多公里排放至黑河“扬路”（木材上岸），才始装车或船运抵内地。纵使掠夺性采伐木材，亦无法运至销地，所以当时只好节制采伐。

三、三河营林署的采伐

营林署内设官砍股，主管采伐的全部业务，每年冬季伊始，即组织采木班四十至五十个。每班自备马套子十至二十四套，每班年伐运木材约一千立方米。当时，营林所招进的采伐班工人多系当地农民，也有淘金工人。他们每采伐并运至江边一立方米木材，能取得四十到五十元酬劳，春融后即散伙，各归故里，从其本业。官砍股验收木材后，只派专人看管便是，待到夏季，组织流放外调业务，此项则与排木会联系。

四、排木会

排木会是依附于营林署，专事经营水上运输木材的营业单位（私自经营组织）。会长阎振帮（被我土改工作团镇压）；副会长马龙岗（山东人，已亡）；理事宫本（日本人，薪炭组头目）。

营林署通过排木会，将一年采伐的木材经额尔古纳河流运至黑河"扬路"始得采、运销全部经营成果。而排木会这个组织，只是沟通营林署与劳动者的媒介。通过排木会与把头，签订编排、流送、雇用"看水"（熟悉航道技术的人员）。每年从开河季节开始至秋末，共放两、三次排木，至黑河交货、结算。排木会每流排一立方米，可得二百至三百元利润，然后与把头、编排技工、工人三股分成。据知，当时每个"看水"者，每引渡一根木材可得一元钱；每个"把招"每运输一次可得五十至六十元薪水。每年夏秋两、三次运输所得亦即高于一般劳动者薪金水平。

在此期间，营林署派人检尺、打"官砍"印记，以示合法采运，然后与排木会结清帐目。那时流放排木的经路，始自牛耳河至四大辽克（恩和哈达）。从牛耳河至乌玛等地采伐点始编小排（叫做"流头子"），及至贝尔茨河口与额尔古纳河口汇合处编成木排，直达四大辽克（恩和哈达），再向黑河营林署引渡，"扬路"后承交、结算。这种掠夺式的采伐和流送长达九年，计运出的木材近十万立方米。当时对木材的采伐，毫无规程所限，均属平身锯伐，木材损失无度。

营林署在三河地区建立了两个苗圃，进行育苗更新。当时，三河至上库力公路两侧，挖将两

条沟带，以植林护路之用。营林署的工作从伪康德四年（1937）延续到1945年，迁至牙克石改称木材株式会社。那已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世界东方的年代了。

海拉尔北山“万人坑”

张玉普口述　　张福祥整理

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我家河北滦县北小寨一带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致使生活无法维持。无奈，我被迫离开家乡，来到郑家屯。当年二月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一伙招工的人，他们声称：“去东山里开荒，每天工钱壹元伍，吃三顿馒头。”我信以为真，就报名应招，没想到却进了虎口。

我们这些应“招”的人，被集中在郑家屯一个大四合院的旅馆里，一共有四百多人。第二天，我们这些人就被装进五、六个大闷罐车厢里，车门上锁，只留一个窄缝。车开后，有一个去过东山里对当地地形熟悉的人对我们说：“这不是去东山里，这是往北开，到满洲里下煤窑。”我们大家这才知道受骗了，但也没办法，因为想跑也跑不掉了。

火车开了三、四天后，一个夜晚，日本兵把车门打开，叫我们下车。我下车一看，四周军警密布，个个荷枪实弹，当即把我们五十人为一汽车拉到敖包山上。第二天天一亮，日本人就逼着我们去干活。到山上一看，山下劳工住的席棚子一眼望不到头，在山上干活的劳工少说也有二、三

千人。山四周戒备森严。铁丝网密密层层，相隔不远就有一个岗哨，在山顶最高处有一个瞭望塔，昼夜都有两个日本兵向四周瞭望。日本鬼子还对劳工严加监视，不许劳工们互相交谈。我们私下互相询问，方知来的劳工不是被骗来的，就是抓来的。家乡大都是辽宁南部，河北北部一带的。

日本侵略军逼着我们给他们修炮台、山洞等工事。我们干的是挑沙子、拌水泥、灌水泥等繁重劳动，住的是四面透风的席棚子。海拉尔二、三月的天气十分寒冷，日本人也不给我们被褥，睡在硬木板上，每天吃的是两顿带不少壳子的高粱米粥，每天得从天亮干到天黑，夏天天长，一干就是十八、九个小时。干活时稍微慢了点，监工的棍棒、枪托劈头盖脸地打来。我在郑家屯认识的一个老乡，干了一个多月就被折磨死了。还有一个劳工，受不了这比牲畜还不如的待遇，逃跑中被抓回来，当天晚上，日本鬼子把我们劳工集合起来，当着我们的面活活地把他打死了。后来。有人悄悄地说，这个人已在这里干了三年了，家里还有母亲、妻子、儿女。我这才知道，这里的山洞至少已修了三年。

繁重的劳动，非人的待遇，很多身体很棒的小伙子很快就累垮了，生病了。但只要你还能动就强迫你去干活，实在动不了的就送到病号

棚。日本侵略者欺骗劳工说，送去隔离，以免传染。实际上送进病号棚。就等于送进停尸棚。据我所知，当时没有一个能病好后回到工地去的。我在这年九月，因两眼烂了，看不见东西，被日本人送进病号棚，目睹了这里面的惨状：奄奄待毙的劳工们躺在那里没人管，连水也没有、天气冷了，身上还穿着破烂的和沙布差不多的更生布衣服。

我们那个棚子里躺着六、七十个劳工，每天都有一些人死去，每天都有病号拉进来，隔几天就拉出一汽车尸体扔到坑里（我因为被逼着往坑里扔过两次尸体，所以记住了这个坑的位置。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万人坑）。后来，我的身体稍微硬实些，心想不能等死，在九月里的一个黑夜，我趁看守的日本兵睡觉之机，逃出病号棚。当时，我逃到现在海拉尔西山机场一带，遇到几个打草的中国人，他们同情我，给我饭吃，给我剃了头发（这时头发有半尺多长）。这样，我侥幸逃出了虎口，虽然瞎了一只眼，但却成为日本侵略军在海拉尔敖包山残害中国人民的唯一见证人。

敖包山山洞前后修了十来年，到底有多少中国劳工被害死？迄今为止还不清楚。当时，我在山上认识的有三、四百人，其中有不少老乡。解放后，我曾到处打听这些人的下落，但杳无音

信。据说，日本鬼子为了怕放出劳工泄密，在山洞修完之后，将全部活着的劳工都害死了。

解放前，我一直不敢说自己是从敖包山上跑出来的劳工。解放后党和政府为了使人民不忘旧社会的苦难，搞新旧对比教育，让我讲述这一段血泪史，我才领路找到这个万人坑。这里埋葬的白骨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海拉尔"一高事件"始末

花赛·德木其格

该校是由兴安北省于1936年3月建立，当时叫《国立兴安学院》，1938年更名为《省立海拉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初建时，设有畜牧兽医与羊毛加工两个班。畜牧兽医班学期为四年，羊毛加工班学期为二年。

1941年4月中旬，一个刮大风的早晨，海拉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院内，由于警铃急响，高年级的七十多名学生在外面集合了，玛西巴雅尔(学生)仍然不停地摇着铃，又有几名学生跑过来站排了。这时，海拉尔日本宪兵队派进来的日本人，将学生巴力吉尼玛叫到办公室去了。

当玛西巴雅尔撂下警铃大声呼喊："我们去省政府说理去！"的时候，瓦新太、米吉德道尔吉等学生相继喊出了："我们去说理去！我也说："去分辨真伪吧！"整个排队的学生哗然，宁静的校院沸腾了，同学们喊着："抓就让他们全抓吧，我们要斗争到底！"

同学们排二路纵队，直奔省政府。走有二十来分钟后，日本宪兵用学校马车押着学生巴力吉尼玛掠过学生队伍，见此情景，同学们当然更加

气愤了。因此在他们呼喊“抓就全抓起来吧”的当儿，我跑过去抓住马缰绳，使车停下了。日本宪兵大怒：“你这东西，你反对日本就是在反对大东亚共荣……。”他说完，一拳把我打倒，驱车奔城而去。但是，我们毫不灰心地去省政府视学官植粟（日本人）办公室里，告了我校管原等几名日本教师的状，并与植粟他们吵了起来。我们曾三次向省政府投书，告过那些教师的状。书信都是直接投给了视学官，因此，视学官对这一切的内容，缘由都是很清楚的。状文内容大致是：

1、日本人管原在学生没有任何差错的情况下，故意找差给学生安罪名，打骂、欺侮学生。

2、给学生吃的从兴农合作社按马料买的有鼠粪的小米，使学生斯日古楞患胃肠病死了。此事应追究责任。

3、日本人克扣和贪污学生伙食费，致使本来已经吃不饱的伙食标准继续下降等等。

视学官植粟是个带眼镜的矮个子。这次他反复听了我们的告状后，蛮横地说：“师者如父，倘父母有错，当子女的就告状吗？不符合道理。再说，你们老师办事也不都是随便的。按照满洲国的制度在管理学校，难道你们还反对国家制度？进一步说的话，这是在反对大日本帝国……”。

第二天，宪兵队把我叫去了，他们为了查出这次活动的头头。对我软硬兼施，既用尽了计谋，也用了刑罚。

一名穿军装的胖子，用皮靴子踢我胫骨好几下。当他们对我用刑的时候，起初我很慌，后来我心思，杀吧，为了蒙古民族死而无怨，这样咬着牙忍受了折磨。用刑的是个穿普通服装的日本人，他一会儿倒茶给我喝，劝我说实话，并告诫："不说实话会危险"，一会儿又掏出手枪，不喊不叫地威胁，又拿竹剑劈头盖脸地打我。

宪兵反复说："日本老师们是按照满洲国的制度在教育学生，你们反对日本老师就等于反对满洲国……"。

最后，在拷问实在不见效的情况下对我说："你已经是被剥夺人身自由的人了，从今以后不许你念书，不许乘坐火车，火车上可以带狗，但你不如一条狗，回家老老实实地反省吧。你现在就可以回学校禀报校长，路上不许串门，哪儿也不许去"。

我回学校禀报了曦部副校长，曦部老师表示很同情。当晚他又把我们学生运动中为首的几名学生叫到他的寝室，对我们说："若不小心是有危险的，有关情况为什么不事先告知于我？！我是站在你们一边的。"当时我感到是得到了他

的宽慰，但又感到他是否还有其他意图。

几天后，我听说索伦旗政府（现鄂温克族自治旗）把在海拉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读书的学生全部叫去，发给每人一些笔记本等纪念品。一名领导说："你们是我旗的学生，你们不可以跟随坏人参与那些事。"这次会上没让我参加。第二次会让我参加了，这次是让我们聚在一个象会议室模样的大屋子里，清水（日本人）气乎乎地进来，厉声说："江川先生一会儿来见你们，等着吧。"说完他就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江川参事官领着阿必德（要他当翻译）来了，因我们都会日语，阿必德也没作翻译，呆呆地站着。江川吼到："你们怎么如此不懂事，怎能参与这种事。把参与这件事的人赶出索伦旗。不要脸的东西。"然后朝我说："德木其格！多母神找你有事，你快去旗警察署找他。"当我从阿必德身边过去的时候，他曾忧心地看着我。

去警察署的道上我想，我在宪兵队受刑受过来了，一个旗警察特务分室的头头多母神能奈我何？没出所料，多母神没打我，只问问事情的起因与过程等，就把我放走了。过一周以后，召开全体师生大会，由校方公布了处分学生的决定：

1、省政府、日本宪兵、校领导三方决定，对所谓"闹事"学生的领导人瓦新太、米吉德道尔

吉、德木其格、巴力吉尼玛四人，给于开除学校的处分。

2、对参与反对教师运动的玛西巴雅尔等两名学生，给于回家呆三个月的处分（可是他们再没返回学校）。

3：对一般参与者——高年级的学生和低年级的部分学生，给于在宿舍反省一个月（停止上课）的处分。对有轻微错误的，给于停止上课十天的处分。

我受处分回家以后，父亲、哥哥都问我："学校放假了，还是请假来的？"我撒谎说："请假回来的，过几天回校"。过几天后。我父亲和哥哥看我仍不回学校，又奇怪地问："你为什么还不返回学校？"当我无奈地说出了被学校开除的经过以后，父亲伤心地说："我们是让你去学习知识的呀，可你就不怕掉脑袋。你想让我只剩一个儿子？不谨慎的蠢货！"当时，可把父亲气坏了，但是从第二天他的气也就消了。

我在家呆了近一个月以后，旗政府把我叫去了，他们与学校交涉，要我复学，但校方没同意我复学。因而他们留我在旗行政股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解决了当时的膳食等费用。到了秋天，旗政府领导认为我承认了错误，表现也不错，已够复学的要求，故向学校保荐，同时也通知了我。当

时我感到不好意思再去学习，但若得不到毕业证就不好找工作，因而还是去复学，学两个多月就毕业了。

毕业后，我考哈尔滨大学，没被录取。和我一块儿参加考试的道尔吉·官布扎布入了哈尔滨大学，他告诉我说："在你鉴定上写有'参加过学生运动'的字样，因而没被录取。"（官布扎布曾去老师们的办公室，与盐谷等老师讲过理，去省政府同视学官植栗争辩过，但被视为错误不严重，被停止上课在宿舍里反省一个月）。

解放后（1947年冬），正值我在呼伦贝尔地方自治政府工作时，当时的地方自治政府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那"一条心活动"中，我交待了个人的历史。当时我们小组有十几个人，小组长是德力格尔（现在呼和浩特），组员里也有呼伦贝尔自治政府主席、原伪满兴安北省省长额尔钦巴图。因此，当我交待参加海拉尔第一国民高等学校学生运动经过的时候，额尔钦巴图插话说："那次运动本来成了大事，日本人曾想把你们除掉……"。

那次"一高事件"是殖民地的学生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忍无可忍自发产生的，虽然被宪兵镇压了。但这次事件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方面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以上概述了海拉尔“一高事件”的情况，因为事已年久，对有的学生名字与事情的经过有所模糊，但基本过程是这样的。我在内蒙各地，屡见参加过这次活动的同学或下届的同学，在此，谨请同学们和其他知情者，对我写错的或有遗漏的地方，予以纠正或补充。

抗日联军在阿荣旗的战斗片断

刘长翼

东北抗日联军三路军三支队三进呼伦贝尔那艰苦卓绝的民族业绩，虽然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但是仍然在伴随大兴安岭的松涛回荡，令人感奋不已。阿荣旗的群众，至今还传颂着抗日联军将领王明贵同志率领三支队与敌顽强拼搏的许多动人的往事……。

一、军民鱼水情

1941年秋，王明贵带着部队从巴彦旗转战到阿荣旗。这时，敌人实行保甲制度，一人犯法，十家连坐，遍布特务、警所。阿荣旗当时流行一句民谣："宁可三天不吃饭，也不和特务、警察见一见"。真是暗无天日，民不聊生。可是，在这种残酷的白色恐怖下，抗联仍然受到阿荣旗群众的支持。

夏季的一个晚上，住在霍尔奇北部的郭彦章，正在炭窑吃饭时，从北山上下来两个人，都背着耳兜子，穿着便衣，象是采木耳的样子，见了郭彦章说："大哥吃饭哪"！当时郭彦章让两位来客吃饭，他们说："不吃"。郭彦章拿烟给

他们抽，其中一个人凑在炭火上点烟时，腰下露出了枪穗。挨郭彦章坐着的许财发现后，用胳膊肘拐了郭彦章一下。虽然郭彦章与这两个人并不相识，但一声“大哥”，郭彦章就明白了他们的身份。在当时，“大哥”几乎是抗联对郭彦章的统称。所以，郭彦章在许财面前，故意装着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郭彦章问他们有菜吃没有，他们说没有。“西葫芦下来了，我给你们摘些拿去吃吧”。三个人便一同到地里去摘瓜。

“刚才用胳膊肘碰你的那个人是什么人，可靠不？要是不可靠，我们把他带走，免生后患”。

“都是熟悉人，常来山上装炭，没关系，放心吧”。

“我们住在山那边的沟里，科长让你去一趟”。

“知道了”。

晚上郭彦章去了，看见沟里整齐地排着两排帐篷，郭彦章咳嗽了两声。哨兵问：“大哥吗？”

“是啊”。

哨兵报告说：“大哥来了”。王明贵让全体集合，当时抗联正在吃饭，都放下饭盒，郭彦章说：“大家吃饭吧”！

“小吴，你的恩人来了”。王明贵喊了一

声。

随着一声答应，一位二十岁左右的战士跑到郭彦章跟前，两个人热情地交谈起来。在阿荣旗北部一次战斗中，小吴突围后负伤掉队，躲在郭彦章的炭窑中才养好伤。

“最近，山上有没有探子和坏人”？王明贵问郭彦章。

“有”。

“不要怕，给你一支手枪”。王明贵说着，叫人把枪拿来，亲自把枪和一百发子弹交给郭彦章。“今后，如见特务，你就打死他”。并拿出一块怀表，让郭彦章替他修理。还说：“杨殿的腿痛，你再给买点治腿痛的药”。

“到哪儿送药”？郭彦章问。

“把药送到颜把头那儿”。王明贵说。

“还有事吗”？郭彦章起身准备走。

“明天早晨你再来一趟”。王明贵最后说。

郭彦章回去以后，把枪和子弹藏在一棵空树洞里。第二天一大早，郭彦章又到了沟里。

“我们要攻打刘绍一的区公所，那里有日本人，你看怎么走好，有没有近道”？王明贵问。

“有。从这沟里上缸窑，过了缸窑从山上拉荒走是直道”。郭彦章说。这时，有一个人拿出地图，在上边做了标记。

二、奇袭镇威庄

1941年旧历7月1日的晚上，天空正下着蒙蒙细雨，镇威庄警察所的警察、特务聚在一起，正在得意忘形地玩牌的时候，王明贵领着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把警察所包围了。战士们机智、迅速地冲进警察所，在“缴枪不杀”的喊声中，面对黑乎乎的枪口，这些警察、特务乖乖地投阵了。有一个特务刚想掏枪反抗，还没等摸到枪把，一粒子弹就送他回家了。有一个战士想出了惩治警察、特务的好办法，在一间空屋子里，中间点着蜡，警察、特务都趴在地上，头朝着蜡，谁也不准动一动，老老实实地趴着。

天亮了，雨停了。王明贵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抗日的政策，讲抗日的道理，向胆敢横行霸道的特务、警察发出严厉的警告。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就象在阴霾的天气里见到阳光一样，感到有了希望，有了主心骨。会后，战士们一把火，把警察所烧了个精光。抗联除了把一个罪大恶极的山林警察带走外，对其余的警察进行了一番教育后，每人发给二十元钱，做回家的路费。这次战斗，缴获步枪十几只，还得到其它许多战利品。

三、血战鸡冠山

有一天，抗联住在霍尔奇北鸡冠山前沟的一个屯子。三更时，尾追的日本鬼子摸进屯子。当

哨兵发现这意外情况时，已经陷敌重围之中。战士们勇猛地打击敌人，有的战士还同敌人展开肉搏。当时敌人有二千多人，形势于我不利。为了保存有生力量，在王明贵的指挥下，战士们抢占了后山山头，打到天亮时，敌人仗着人多，又把后山山头包围了，在这种敌众我寡、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战士们一直坚守到天黑。晚上，王明贵带领队伍出其不意地向敌人一顿猛打，突出重围。

四、牧隗山遭遇战

三支队在王明贵的率领下，几经转战，来到兴南镇。战士们一住下，就帮助老乡们扫院子、挑水。可恨的是“讨伐”的敌人跟踪而来，约有二百余人，坐着大板车。王明贵、陈雷、周连长、王连长开了个紧急会议，分析敌情后，没有同敌人硬拚，即刻向南转移。到了牧隗山，又遇上敌人的“讨伐”队，在敌人还没有闹清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战士们给敌人一顿狠打。这场战斗，以敌人惨败而结束。

五、打开大柜

在现在的小新立附近，曾设有一所日本鬼子的柜房，柜房是日本鬼子设的伐木场兼山林讨伐队的给养供应站。有一天，兴南镇的张伦顺借着包盖房子活的名义，带着抗联的一个侦察员到这

所柜房进行侦察，把敌人的火力配备及地理等情况摸得一清二楚。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王司令带着队伍把大柜包围起来。在工人的配合帮助下，只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场战斗消灭了二十多个鬼子兵，只跑了一个叫小野的鬼子，缴获了二十多支枪，还有六0炮、掷弹筒等。大米、白面、布匹等物资，抗联除留下一小部分外，其余大部分都分给了林业工人。这场战斗，对敌人的震动很大。

六、索里珠歼灭战

1941年秋的一个傍晚，王司令率领队伍住在二号店。忽然得到消息，日本鬼子已进山围剿。王司令熟悉这里的地理环境，分析了敌情后，决定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于是，王司令率领主力行进索里珠沟，留下一部分战士，来引诱敌人。

第二天拂晓，两辆满载日伪军的卡车气势汹汹地开奔二号店。不等大卡车停稳，战士们立即向敌人射击。敌人以为遇到抗联主力，组织全部火力进攻。战士们边打边撤。敌人错以为抗联不堪一击，甚至想抓活的，就在敌人忘乎所以追击的时候，进了王司令预先埋伏的伏击圈。王司令一声令下，顿时枪声大作，战士们向敌人射出仇恨的子弹。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四十多个日本鬼

子全部被歼。战士们带着胜利的欢笑，一把火把敌人的两辆卡车烧毁了。

七、人头山九日

阿荣旗出名的坏特务胡振亚，经过明察暗跟，发现了抗联的踪迹，立即报告给日本鬼子，日本鬼子得到这一情报，立即出动大批部队进山围剿。在出动大部队的同时，又派出多股小部队寻捕搜索。

在沃尔会河一带，抗联同敌人小股部队遭遇，抗联边打边撤，几经转战，也甩不掉凶恶的敌人。在六合屯，遇到敌人主力，战争异常激烈。有的战士在战斗中牺牲了。抗联撤到白家屯过河时，又被沼泽游泥所陷。后有追兵，前被路阻，处境十分险恶。退到人头山时，这支三十多人的队伍只剩下二十九人了。

人头山，座落于格尼努图克的东南部四十余里处，因远望状如人头，故得名。山不高大，也不险峻，周围地势略显平旷，利于小部队的短期坚守，不利于长期作战。看着王明贵部队退到人头山，鬼子部队便把人头山团团围住。日本鬼子得意洋洋，以为这下可好了，山上无水又无粮，就是困也把抗联困死。可惜，敌人高兴得太早了，抗联在人头山坚持了一天又一天，而且越打士气越旺，一直坚守了九天九夜，最后一天的夜晚竟奇迹般地突围出去，转入山林。敌人捶胸顿

足，只好望洋兴叹，垂头丧气地撤了兵。

抗联被困人头山九天九夜又顺利地突围，一时传为奇谈。其实，抗联是因为得到群众冒死支援，得到了粮食，得到了水，得到了子弹，才得以在极为危险的情况下，坚守抗敌。象刘金宝，为抗联送饭被鬼子发现后，严刑拷打二十余日，他也没有向鬼子说出半点抗联的消息。

八、让伪军“护送”抗联

一天，王司令率领十几个战士又来到了兴南镇。吃完饭，发现有一个团的伪兴安军向这里“讨伐”。抗联便向东转移，伪兴安军就在后边尾随。由于抗联同伪兴安军通了气——“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伪军跟在抗联后边，只是虚张声势，朝天放枪，以此遮掩日本鬼子的耳目。伪兴安军用这种方式，一直“护送”抗联撤到龙门口四站，最后，安全进入小兴安岭。

鄂伦春民族和抗日联军亲如一家

柴少敏　整理

一、林中相遇

不做亡国奴，不畏强暴的鄂伦春族猎民盖山，1940年夏天领着女儿占柱梅游猎于格尼河一带，一同游猎的有盖山的内弟等三户，四个“斜仁柱”依山傍水的支在岸边，形成了一个小“乌力楞”。

一天，盖山早早起来，嘱咐女儿占柱梅，说明自己去远一点的地方打猎，回来晚一些，耐心地等待阿爸打来肉，一块吃晚饭。

日头偏西的时候，盖山已打到两只狍子，他利落地扒皮割肉，放在马背上，急忙往回赶路。突然，从前方密林中出现两名挎枪骑马的人，既不象猎人，又不是日本人，一身汉族人的打扮，迎着盖山而来。

“尊敬的莫日根，准备到什么地方去？”两人下了马，其中一人用鄂伦春语和盖山说话。听到亲切的话语，看看那露着诚恳的面孔，盖山的戒备消退了，他们象朋友一样地谈起来。原来，英勇的东北抗日联军实行战略转移，开辟新区坚

持持久战。这是以王明贵为司令员、王钧为政委的抗联三支队挺进大兴安岭以后，主动接近鄂伦春兄弟，同猎民交朋友，宣传抗日救国和党的民族政策，团结猎民共同抗日。这天，山顶了望哨发现山下有四个“斜仁柱”。为摸清情况，派出侦察员接近观察，侦察员看到“斜仁柱”旁不但有几匹马和马驹子，还有猎民妇女，断定不是敌人。随即派人下山联络，与打猎归来的盖山相遇。

盖山被请到抗联驻地，受到王明贵、王钧和宣传科长陈雷等领导人的热情接待，向盖山问寒问暖，倍加关切，热心地讲解了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族穷人自己的队伍，是打日本的，主张各民族平等，共同抗日救国救自己，并讲了八路军必胜，侵略者必败的趋势。还介绍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一个又一个胜利，使盖山第一次听到了解脱民族灾难，个人厄运必须靠共产党的道理。盖山感到抗联可亲可敬，是从来没有见过的了不起的队伍。尽管初识，他们之间的心已经贴得很近了。临走，盖山把狍子肉全部留给抗联战士。

深夜，盖山回到家里，心情依然很激动。机灵的占柱梅看到阿爸以往阴沉的脸上挂满了笑容，禁不住一个劲地追问遇到了什么好事。盖山

高兴地讲了见到抗联的经过，并一再嘱咐，日本人来了千万不要告诉，在山林队的哥哥来了也不能告诉。接着，盖山叫占柱梅到别的斜仁柱，把舅舅等人找来。这一夜，他们商量了很久。第二天，盖山领着内弟等人去见王明贵。一见面，知心的话越唠越多，越唠越亲近。告别前，王明贵看到他们背的破旧“别力弹克”猎枪，当即从部队抽出三支“九九”步枪，连同子弹一并送给他们，盖山等猎民含着热泪接过了钢抢。

二、合力杀敌

两次接触抗联之后，盖山对这支队伍由同情，进而为信赖、依靠，于是他提出要同王明贵等人结拜为兄弟的要求。

部队党委经研究同意，由陈雷同志执笔写了“金兰谱”。几个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人跪在一起，插草为香，对天宣誓：“我们几个人自愿结拜成兄弟。今后，同生死，共患难，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心心相连，共同抗日，革命到底，永不背叛……否则，天打五雷轰。”盖山年岁最大，被尊为大哥，其次是王明贵、陈雷、高拜华（抗联干部），莫贵林（抗联战士、鄂伦春族）、安永华（抗联战士、朝鲜族）等十余人。从此，盖山经常随抗联一起活动，他还同女儿占柱梅经常将鬼子进山讨伐的情况送给抗联。尤其

是盖山熟悉地形，使部队的活动更加灵活隐秘。有几次重兵压境的危急时刻，都是盖山给部队当向导，巧妙地摆脱了日本鬼子的围剿，保存了革命实力。

那时抗联的生活异常艰苦，军需无保障，常常采食野菜，有时不得不忍痛杀战马充饥。风吼雪大的严冬，破旧的衣装挡不住刺骨的寒冷，许多战士冻坏了手脚。

盖山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他经常下山动员猎民给部队送兽肉，送兽皮，补充部队的给养，还领着占柱梅到七个“斜仁柱”动员猎民妇女为战士做鞋、做手套。占柱梅的“斜仁柱”成了猎民妇女集中的地方，为防备白天鬼子窜来，常在夜间围着篝火，一针一线的忙到黎明。部队接到猎民送去的食品、手套、鞋时，深受感动。王明贵等首长说：“这是猎民的一片心啊！我们一定狠狠地打鬼子，报答乡亲们！”事隔几十年以后，王明贵将军每当提起这些事情，依然感叹不已。

有一次，盖山探听到日本人的伊贺公司囤积着大批粮食和棉装，他立即把这个情况告诉部队，并提出了攻打伊贺公司的建议、

伊贺公司是日寇掠夺我国森林资源的据点，又是日本鬼子大部队进山讨伐的中转点，平时驻

有二十几个鬼子和二百多名劳工。

抗联三支队进行了慎重研究，采纳了盖山的建议，当机立断地制定了作战方案——长途夜袭，动员部分猎民随部队行动，距目标十里处下马步行前进，由猎民协助照看马匹。盖山动员了六名猎民随部队，年小的占柱梅也参加了这支配有六十余匹战马组成的队伍。

日落时分，盖山引领的部队已运动到距目标仅有几里路的隐蔽山弯里，指战员纷纷下马，将马匹交给随去的猎民看护，借夜色掩护，向敌接近。不多时，指战员到达格尼河东岸，隔河已隐约望见伊贺公司的灯火，指战员分散在树林中待命。

敌情是否有变化，讨伐队进驻伊贺公司没有？情况不完全清楚，王明贵一时决心难下。身旁的盖山，看出了王明贵的心思，主动要求进伊贺公司侦察。王明贵看了一眼这位信赖的猎民老大哥，庄重地点了点头。他俩又详细地商定了联络、攻击的暗号。盖山迅速机警地绕到部队隐蔽的相反方向，然后大摇大摆地走进伊贺公司。

日本人发现黑夜到来的盖山，急问："什么的干活？"盖山说："打猎的！"日本人又问"打猎？马的哪里去了？""野兽的没打着，马的甸子上吃草。"盖山说着顺手往身后一指。"明

天，狍子的打，肉的统统地给！”鬼子说完把手往工棚一挥：“那边的住吧！”

盖山住进工棚，详细观察了鬼子人员的情况，发现没有增进讨伐队，心里有了底，

身入敌人据点的盖山，在焦虑中熬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时，干了一天重活的劳工发出粗重的鼾声，日本鬼子的宿舍也一个个的熄了灯。又过了一会儿，盖山见时机已到，装做上厕所的样子钻出工棚，迅速在隐蔽处发出冲击的信号。转眼间，英雄的抗联指战员犹如从天而降，勇猛而又敏捷地向各个目标扑去。不多时，鬼子被一个个从被窝里揪出来押到院中，劳工棚里涌出了欢笑的人群。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没费一枪一弹，就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和大批粮食、服装等物资。三支队将一部分粮食、服装留作军需，并发给遣散的劳工。带不走的，一把火烧毁。这次缴获，大大改善了部队的艰苦条件。为避开鬼子的报复，盖山又给部队带路，转移到隐秘地点。

火烧伊贺公司之后，气急败坏的鬼子调动大批兵力进山讨伐。占柱梅所在的“乌力楞”周围来了二百多个鬼子兵。几个鬼子闯进占柱梅家的“斜仁柱”，鬼子劈头就问：“你爸爸干什么的去了？“占柱梅没有惊慌：“打猎去了！”一个鬼子气势汹汹地问：“是不是给红军送信去了？”

占柱梅装做天真的样子答道：什么红军，我不懂。打猎就是打猎去了！”鬼子看到从这个小姑娘嘴里实在问不出什么，只得作罢。

突然闯来的鬼子兵，使占柱梅十分着急。她为阿爸、为抗联叔叔担心。她好容易盼到天黑，就悄悄溜出“斜仁柱”，朝小林深处奔去。密密的原始森林，黑黑的夜，野兽的嚎叫和突然响起的奔跑声，使她一惊一乍。可是，她没有停下，她要把大批鬼子进山的情报立即告诉阿爸和抗联的叔叔们。她咬着牙，深一脚浅一脚地朝前奔去。摔倒了，赶快爬起来。滑下破，又攀上去。

在抗联的秘密营中，王明贵和盖山正迫切知道鬼子进山的确切情报。

啊，来啦！指战员们一下子把占柱梅围了起来，心疼地替她擦去头发上的汗水。占柱梅一口气说完鬼子进山的情况，为了避免鬼子的怀疑，她没有来得及休息，没跟阿爸说更多的话，又踏上返回的山路。

王明贵同志目送着夜幕中回家的占柱梅，眼里涌满泪水。盖山支撑着正在发高烧的身躯，默默地为女儿祝福。他知道，他拒绝派战士回家是对的，因为部队根据女儿送来的情报，要采取新的行动。他相信，女儿完全能够挺得住。

占柱梅在天亮时看到她的“斜仁柱”周围站

着不少鬼子兵。几个鬼子兵见占柱梅回来，立即围上去。一个当官的鬼子一把将占柱梅拽住就问："你的干什么去啦？"占柱梅沉着地回答："找马去了！""找马为什么半夜出去？""半夜找马，白天搬家！""什么的搬家，你的红军的报信去啦！"说着，狠狠地打了占柱梅一个嘴巴。接着，又有几个鬼拳打脚踢，占柱梅栽倒在石头上，脸被磕破长长一道口子，露出了骨头。鲜血满脸满耳，疼得她昏了过去！占柱梅醒来以后，那个当官的鬼子把她拽起来，拿着手抢逼问："快快的说！不说，死了死了的！"占柱梅早已横下心，不管自己怎样，无论如何不能讲出阿爸，不能讲出抗联的叔叔。她怒视着鬼子，一言不发。几位乡亲上前求情，这时，占柱梅大哭大叫。乡亲们顺势将占柱梅领回"斜仁柱"。

过了四、五天，这批进山讨伐的鬼子又回到这里。他们到山里扑了个空。

原来，抗联三支队接到占柱梅的情报后，趁大批鬼子进山，其后方空虚之际，立即挥军直奔"26号车站"日寇的据点。这里有鬼子的一个贮备仓库，放着大量的武器弹药和粮食，服装等物资，抗联以极小的代价，又夺得了一个大胜利。

三、悠悠情长

抗联三支队在取得历次胜利之后，受到鬼子

重兵包围。为保存实力，更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决定往嫩江方向转移。

当时，盖山得了"砍头疮"，脖后长出三个大脓包，头稍转动就疼得钻心，经常高烧，身体异常虚弱。部队当时缺医少药，又要长途行军，盖山不得不离开部队。临别，盖山拖着病体领着占柱梅帮助部队藏枪支和物品。把七支步枪，一部电台，一饭盒银元埋在格尼河畔的一棵高大黑桦树下。三支队转移以后，盖山的病情日益严重。逝世前，盖山拉着占柱梅的手，嘱咐女儿要设法打听部队的消息，他们惦记着生死相依的亲人！

以后，部队转战回到大兴安岭，得知盖山故去，王明贵、王钧带领战士冒险下山，找到占柱梅的"斜仁柱"，从有限的经费中拿出一大笔钱，委托鄂伦春族兄弟为盖山买木制棺，重新安葬。安葬那天，王明贵又率队而来，操持了老大哥盖山的葬礼。这些刚强的指战员，在枪林弹雨中都没皱过眉头，此刻，为失去这位异族兄弟而悲痛，泪水湿了前胸，滴在了墓地上。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曾在三个支队战斗过的抗联战士，没有忘记曾经在一起战斗的鄂伦春族人民，没有忘记曾经战斗过的土地。

一九六五年，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贵，

在黑龙江日报登载寻找占柱梅的启事。在有关机关的帮助下，他们恢复了联系。王明贵副司令员将占柱梅接到哈尔滨，共叙亲情。

1981年，在庆祝鄂伦春自治旗成立三十周年期间，王明贵同志又来到这里看望鄂伦春族人民。

占柱梅虽已年老，仍不忘教育鄂伦春的后代，时时珍视和加强民族团结。各族人民、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不忘占柱梅在抗日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国家作出的贡献。1983年占柱梅接连出席了自治旗、盟、内蒙古自治区民族团结表彰大会。

我为抗联当向导

孟德仁　口述
那顺保　整理

（一）

1939年冬，冯志刚带领部队过嫩江来到了我们小库木尔屯。部队一进屯，冯志刚先找到我家，并向我父亲和我介绍认识了王钧、王万俊等抗联同志。他们来不及休息便说，屯子里一下来了这么多背枪的人，得马上开一个大会，向群众宣传一下我们的来意，我们马上通知了全屯人。部队在屯里打开红旗，屯里人陆续聚拢在红旗下，召开了群众大会。王钧讲话说：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打日本鬼子的，我们的队伍是老百姓的队伍，不管达斡尔人、汉人都是一样受苦的，打倒日本鬼子我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全屯男女老少幼几百人聚精会神的听他讲话。会散后，部队分到各家吃饭、喂马。一进到各家，战士们又是打水，又是劈柴，打扫院套为各家劳动。大家一看确实不象乱七八糟的军队，纪律这样严明的军队还从来没见过，因此，各家都拿出最好吃的招待了大家。

冯志刚、王钧、王万俊等同志，都在我家吃饭，指挥部就设在我家。一进屋，我奶奶给老冯

他们让座，请他们抽烟，又端来酸牛奶请大家喝。吃饭的时候，端上野猪肉和小米饭请大家吃，他们吃得都很香。饭后，冯志刚对我父亲说，孟大爷，德仁弟和我们岁数差不多。你老人家对我们这么热情，让德仁弟和王钧、王万俊拜个弟兄吧，我父亲很同意。用达斡尔族的习惯，我父亲倒上酒，我奶奶点上香，我们三个先后举杯敬了天和神，又敬了长辈。当时王钧二十六岁排老大；王万俊二十二岁，排老二；我十八岁，排老三。王钧和王万俊说，为打日本兵，我们生死与共。我说，谁要是有坏心眼谁就被枪子儿打死。就这样，我们结为生死弟兄。

指挥部在库木尔休整了两天，一天夜里向南出发了，我随队出发当向导，从此，我成为抗联的一名成员。当时还有我叔叔孟寿海和一名叫沃色特克的鄂温克族，两人送部队南下。他俩把部队送到乌尔科屯后就连夜返回了。以后部队又到了冯家围子和王家炉屯，这里群众很热情，我很快筹集到了十多匹骑马，过诺敏河时，有几匹不肯过江，只有几匹带过了江，其余只好在江边放掉，让它们自己返回屯去。

离开王家炉屯后，部队继续西进，1939年12月末来到了格尼河东的太平桥，一到太平桥，部队就把警察所包围并缴了械，正当对警察进行训

话的时候，从屯外骑马跑过来一位达斡尔姑娘，她的名字叫德梅，我的一个姐姐，是西路拟屯人（现莫旗阿尔拉镇），她告诉我们，西南方向来了一队警察。部队闻讯后迅速撤到屯东的山坡上，占领制高点。德梅也立即骑上马返回了屯子。前来的警察队有二百多人，全部骑着马。冯志刚和王钧了解到警察队有少数民族，为了避免中国人自相残杀便于部队今后活动，不使少数民族发生反感，决定先进行政治攻势。但警察队还是先开了枪，做前沿宣传喊话的祁副官壮烈牺牲。仗打起来了，冯志刚、王钧仍交代战士们不准打人，只准打马，并用机枪压制对方火力，然后冯、王亲自率领马队从两侧发起冲锋，把警察包围并缴了械。然后冯志刚、王钧给他们讲抗日救国、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道理，留下枪支、弹药、马匹，把人全部放了。

通过这一仗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真佩服他们的度量，也进一步看到了抗联为国为民的精神。

腊月的一天部队来到阿荣旗北部三岔河中游的五马架子屯。天快黑时进的屯，冯、王召集群众开大会，我们正烧火做饭，岗哨来报告说来了大队日本鬼子。部队赶紧集合，带上捞出半熟米饭，撤到后面的山上，还没上到山顶，日本鬼子就撵

上来了，我们撤到远一点的地方吃了饭，宿了营。第二天部队往西南方向运动，因不知敌人兵力和动向，先派出尖兵探路。当行到三岔河附近的窑炭窝棚时，天已傍晚。我们从一座山上往下看时，远处有玻璃返射的亮光。冯志刚说前面可能有人家吧，我说在这深山老林里那有玻璃，肯定是日本鬼子的汽车玻璃。但冯志刚为了掌握真实情况，带领一个战士前去察看。刚上到山顶，和日本鬼子遭遇了。冯志刚和一个战士边打边撤，但由于敌人多，火力猛，我们没营救成。冯志刚壮烈牺牲了，全体战士都哭了，我的眼泪也止不住流出来，打枪时准星也看不见了。这次遭遇战，打的很艰苦，我们骑的马也被打死了不少，当时王钧考虑到敌人数倍于我，久战不利，便又撤到查勒巴奇山坡（阿荣旗境内）过了一宿。这时侯，我捎信让家里送马和米。第二天，在王钧带领下，我们又返回冯志刚牺牲的战场，没有找到遗体。据老百姓说，被日本鬼子用汽车拉走了。

部队为了摆脱敌人的围追，一连打了许多仗，最后向西冲到博克图、巴林一带才将敌人甩掉。

在部队西进的途中，我叔叔孟松海（现正在莫旗西瓦尔图乡）、孟寿海（已去逝，其子莫德

尔图现在盟公署工作）及时的为部队送去了五匹马和三袋子小米。在三岔河战斗，马匹减少很多，在深山老林中行军打仗没有马匹，是非常困难的，这五匹马为以后行军打仗起了不少作用。

部队转到博克图、巴林一带后，王钧派我下山了解情况。因我通晓蒙古、鄂温克、鄂伦春语，本身又是达斡尔族猎民，我穿上平时打猎的装束，一边探听敌人的动向，一边为部队购买马匹、粮食等物资。为了使部队及时掌握敌情，我探听到情况后，马上返回，因此多半是日夜兼程的。

经我侦察了解，这一带有很多日本人经营的木作柜房，也叫协和公司，我把情况汇报后，王钧决定攻打几处柜房。这样，我们接连攻下了巴林、博克图、穷棒子沟、卧牛河等十多处柜房。消灭了不少敌人，得了很多的给养和现金。

从这一带，部队又转战到阿荣旗西北边的山里，一个叫野猪窝棚的地方休整。到了1940年3月份左右，王钧决定率领部队返回江东，向军部汇报情况，听候下一步指示。临行前，王钧对我说："三弟，你留在家乡，一方面照顾年迈的双亲，一方面继续摸清各地敌人的情况。部队剩余物资要保管好，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你有什么情况可到讷河找北龙地委方明玉联系"。把一些

物资安置完后，我把快枪换成猎枪，取近道向家乡返回。

（二）

1940年9月份，抗日联军再次进入呼伦贝尔，是由王明贵、高政委、王钧带队来的。我闻讯后立即从查勒巴奇出发找到了部队，见面后，我们互相问候都很高兴。我向领导们汇报了这几个月的情况，当汇报到现在鄂伦春部落中建立了联络网和落脚点时，他们听了都很高兴。同时对我有家不能回表示慰问。

当部队来到阿荣旗境内鸡冠山时，与日本鬼子打了一场大仗。日本人出动了飞机轮番轰炸，加上大炮，重机枪射击，战斗打得非常激烈。天黑时部队才撤出战场，转到五马架。日本鬼子也随后追到五马架，在这又打了一战，这两战，我们打死日军的一个军官和很多日本兵。我方高政委等为掩护部队转移，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日军这次的企图是想拖部队准备全歼。王钧等看出这一阴谋，决定撤出战场向巴林、绰尔河等敌人兵力弱的地方前进。在前进的途中，又与围追堵截的日本军打了几仗。边打边走，翻过去兴安岭，来到鄂温克旗境内。当时王钧说往南打，有可能的话打通与中央的联系。部队一直前进到伊敏河源。由于白俄和蒙古骑兵的尾随干扰，无奈

又从绰尔河源返回。途中白俄和蒙古骑兵尾随不放。部队决定反击。一天夜里，我们偷袭了他们的宿营地，打得他们晕头转向。袭击之后部队连夜急行军，走了一天一夜，到了大西尼气后，我们扎营做饭，准备休息一下，岗哨发现他们又尾随上来了，我们主动出击，趁他们立脚未稳就给了沉重地打击。他们还没明白过来，我们上马继续前进，到了阿荣旗境的阿塔山坡才将他们甩掉。

在这里部队休整后，部队顺边壕行军从休日托尔苏过嫩江回到了江东。我送走了部队，从登特科屯处骑马浮游过江。刚过江就遇上了警察瓦克山，他把我带到家，问我干什么去了，是不是送抗联去了，我看隐瞒不住了，便直说我是送抗联去了，你是警察把我抓起来吧。他却说，你不知道，你爸爸和我是好朋友，我怕你在外边走，被别的警察抓到就没命了。现在正悬赏要抓你呢。在我这住几天，等外面平静了你再走。我在他家住了几天，给他打了几只狍子。他告诉我。以后在这碰到什么麻烦要找他帮忙，千万不要乱撞。一天夜里，我骑上马离开他家，顺原路经哈叉窑（三股道）、乌尔科回到阿荣旗拉帕提家。

部队这次回江东前，王明贵、王钧仍叫我留下，继续广泛地建立落脚点，搜集敌人各方面的情报。在这段时间里，经拉帕提、霍毛、涂瑞川

等，又认识了鄂伦春头人盖山（已去逝）。白天我穿行于大兴安岭的崇山峻岭，搜集敌人的情况，夜晚，向群众宣传抗日的道理。我先后去了博克图东沟等地了解敌情。这段的侦察工作，为后来部队攻打日本人经营的二十六号和七十四号木作柜房打下了基础。

（三）

1941年冬，在阿荣旗境查勒巴奇，我听说部队已到了巴彦旗境（现莫旗境），我兴奋的一夜未睡好。第二天，我骑马去迎接部队，在阿塔山坡找到部队。部队从此出发到了博克图附近。一次部队派出几个战士到附近侦察，在一处炭窑棚，由于说购买子弹而暴露了目标，到了第二天这些战士也没有归队。我们估计肯定出了事。部队马上集合前去接应。战士们刚一上到炭窑棚附近的南山坡，就与日本兵和伪警察碰上了。我操起机关枪就打，一梭子弹没打完，机枪的撞针断了，我又操起身边的“三八枪”连连向敌人射击，打倒了不少敌人。部队在王钧带领下，发起了冲锋，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我也冲上前去抢敌人的一挺机关枪。不料，旁边被击昏的敌兵突然向我开了一枪。这一枪击中我膝下，骨头也受了伤。这一次战斗，我们又缴获了不少枪支、弹药和马匹。

这场战斗之后，部队继续前进，到了博克图一带，王钧派我前去侦察。由于前次我到这一带侦察过，这次我很快了解到二十六号柜房日军兵力不多，各种物资又很丰富，就连夜返回，带部队前往二十六号，经过一场规模不大的战斗，很快占领了二十六号。我们俘虏了全部日军和警察，又缴获了很多米面和服装，解决了部队过冬问题。

打下二十六号，部队出发向北到了免渡河的老头山，这儿离七十四号（即扎顿河）十来里的地方。我们截住一个拉拌子的汉人，了解这里敌人兵力情况，当时王钧决定攻打，部队便连夜前往袭击，没有任何伤亡，我们打下了七十四号木作拒房，缴获了一百多匹马和很多物资。这里有很多劳工，他们大部加入了部队，我们未作停留便起程行军。当我们来到诺敏河畔的额勒格地方时，日本鬼子随后追击到这里。此时正是夜里，我们在夜里和日军又打了一仗之后，部队渡过诺敏河、甘河来到多布库尔，在这里遇见了鄂伦春族的占柱梅。他们热情地接待了部队，并为部队送了套裤、齐卡密（狍爪子做的靴子）等。部队在这休息一段时间后，来到呼玛境内。

部队到呼玛后，根据部队的决定，我单枪匹马返回了阿荣旗。当时，我坚决要求留在部队，王明贵、王钧找我谈了话。王钧说，支队党委决

定让你返回阿荣旗、莫旗一带做地下工作。你回去后，继续建立巩固联系点，发动群众建立抗日组织。这是革命的需要，不知什么时候，部队还要打回来，那时候你就知道叫你回去的意义了。我们举杯挥泪告别，战士们依依不舍送了我一段路程。

（四）

解放后，我一直打听抗联同志的消息，王钧等同志也一直寻找我的下落。1963年经过多方面的努力，分别二十多年后，我和王钧见面了，见面时我们都流出了激动的眼泪。王钧来到乌尔其汗我的家，我们在一起回忆战斗的岁月，缅怀冯志刚、高禹民、王万俊等先烈。王钧说，当时如果没有你给我们带路当向导，抗联三进呼伦贝尔地区就要负出更大的代价。我说那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是我们全民族的支持和抗联战士浴血奋战的结果。如果没有达斡尔族的孟松海、孟寿海、敖巨阳、敖福延，鄂温克族的沃色特克、鄂伦春族拉帕提、占柱梅、涂瑞川、霍毛等人帮助，我一个人为抗联是带不好路的。

伪满第十军管区概况与锡尼河事件始末

安　牧

编者按：我们已经收到有关伪满第十军管区官兵起义投诚的第一手资料八篇。在《呼伦贝尔文史资料》第二辑里用了一篇，另外在我们活页文史资料里用了两篇，本辑（第四辑）里采用了三篇。

上述材料“锡尼河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经过、主要参与者等记叙基本一致。为了弄清一些细节，我们召开过当事人座谈会，并走访过几位当事人。但因第十军管区是受日本关东军调遣的，内有很多日本军官，要杀掉他们举行起义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是要相当秘密的。而且事情已隔四十多年，忆述此事者当时所处的地位与环境也不同，因此他们对具体情节的回忆不尽一致。我们没有强求一致，保留了作者的不同记叙。

一、第十军管区的概况

伪第十军管区司令部，设在伪兴安北省海拉尔。1945年，司令官是郭文林（中将，达斡尔族），参谋长是正珠尔扎布（少将，蒙古族）。司令部设副官处、参谋处、军械处、兵事处、军法处、军需处、军医处和兽医处，除兵事处长姜布勒（中校）与军法处长王××（中校）是蒙古族外，其他处长均为日本人（副官处和参谋处，称高级副官和高级参谋）。军需处人数最多，军官十来人加上文职雇员共约三十至四十人；其次是

参谋处，约有军官二十多人。其他处除处长外，一般是二至三名军士。

另外有个顾问部，顾问是从日本关东军派来的日军中佐(即中校)，他是这里的“太上皇”。

直属部队有：独立骑兵连、通信队（电台）、辎重队（马车）、汽车队、陆军医院、陆军监狱（典狱长以下均为文职人员）。

还有一个“第十宪兵团”人数不详。

在南屯有两个骑兵团，即五十团和五十一团，（原名为兴安骑兵七团和第八团），还有一个独立炮兵营（两个连有山炮四门）。

骑兵团团部设有：副官室、军需室、军械所、军医所和兽医所。一个团有四个连，（两个骑兵连、一个速射炮连、一个机关枪连）每团大概有六百人左右。

在1945年6月，五十团奉命由团长金永福（上校，达斡尔族）率领第一连、速射炮连、机关枪连的主力，前往大兴安岭红花尔基地区，修筑防御工程去了。团内只留下第三连和其他三个连的放牧军马人员（各连还留一名军官）。五十一团有一个连驻在新巴尔虎左旗阿木古郎镇。

二、锡尼河事件

1945年8月9日清晨，苏联红军对海拉尔空袭轰炸，对南屯也进行了扫射。司令部和各部队，

紧急集合进入战争状态，司令部命令销毁文件，分发枪支弹药、饼干、罐头和药品，准备向大兴安岭撤退，作最后抵抗。

当时在五十团，有蒙古族军官玛格斯尔（三连长）、苏荣、风声阁（副官）、达西、包春林（中尉）和图古斯巴雅尔（军需）等人；达斡尔族军官有蒙和巴图、何儒林（中尉）和巴图敖齐尔（兽医，现名安牧）；汉族军官有黄××（军医）。

在这紧急情况下，蒙和巴图、何儒林、巴图敖齐尔（因为是同乡，互相亲近和信任），找达西私下商议："如果听从司令部的命令同苏军顽抗，又受日本人的督战，全体官兵肯定都将成为替日本军国主义卖命的炮灰。军官有枪有马，也能从民间抢劫马车，带着家属逃跑，是有机会和办法的，但是成千名的士兵将毫无方法。因此"，一致的意见是，在撤退的途中将日本人全部消灭，然后向苏军投诚。当时也考虑过，消灭日本人后，就解散部队，各回各家。但认为，人多一散就会造成混乱，他们的家乡大多在哲盟、昭盟或齐齐哈尔和莫力达瓦旗，当时铁路已不通，他们没有便衣也没有钱，有的可能要干出抢劫、偷盗等坏事，有的可能会被苏军或老百姓杀害，解散是肯定行不通的，必须大家一起行动。就找玛格

斯尔和苏荣，谈了想法。因他俩也有同样想法，我们当即决定，只这几个人知道，不能同不可靠的军官和任何士兵讲，并推选玛格斯尔去找51团的伊士敖尔布连长等靠得住的人秘密商量。因伊士敖尔布等人也是在秘密商量这个问题，玛格斯尔和伊士敖尔布即按计划，去海拉尔司令部通过郭文林的副官鄂信台（中尉，达斡尔族），先摸了郭文林的底，认为没有问题，就把秘密计划向郭文林作了说明。结果他同意了，并同司令部内少数可靠军官商定，按计划行动。

8月10日晚，全军区机关部队，分别从海拉尔和南屯，渡过伊敏河，经过一夜的行军，8月11日早晨，到达锡尼河苏木附近休息，司令部在沙丘上，集合了全体军官，正式宣布部队撤到大兴安岭，进行最后抵抗，决一死战。这时日本军官大部分都表了决心。少数蒙、达军官因为胸有成竹，同日本人谈话中也表示积极，一定要抵抗到底。其他军官和士兵是非常沉闷的，没有人敢多言多语。当时，五十团在河南，五十一团与炮兵营在河北，司令部的人已分散在河南和河北。因为河两岸都是沙丘，地形有利于采取行动。两个团秘密联络，决定一声枪响即同时行动。在五十团，由蒙和巴图指挥，达西布置了最有把握的军士掌握重机枪，以举红旗为信号，开

始射击。机关枪连在东，三连、速射炮连在南，一连在西（北面是河）形成包围。这时集中在河南岸平地上的日本人都分别找他最亲近的人，三、五成群的脱下军装，有的在闲谈，有的还在喝酒。为了不使他们产生怀疑，曾在日本留学的巴图敖齐尔兽医也同他们在一起闲谈（附近埋伏着叫老小子的上士，持枪牵马在掩护）。他们看见红旗一举就乘马跑出（典狱长拔刀欲砍未来得及，又有用手枪射击，未中），这时数架重机枪已同时集中向日本人密集的目标射击，当时死亡多人，跑出去的几个人，则由事先布置好的军士乘马追逐，用手枪消灭了。河北岸的五十一团也同时行动了。大约经过一个小时，消灭了所有日本军官。

午后各团派人打扫了战场，掩埋尸体。在清查尸体中发现非常猾狡的五十团团副平泽少校等四人跑掉。

午后郭文林、正珠尔扎布把准尉以上军官集合在一起，宣布解散"第十军管区司令部"，成立"兴蒙汉第一军"，下没两个团和炮兵营。原五十团为一团，因团长及三个连长已去红花尔基，故任命玛格斯尔为团长，包春林、蒙和巴图、何儒林、达西为连长。其他（五十一团为二团），团、连、营人员按原职不变。全军摘掉了

原来的帽徽和肩章，各团、连重新整顿了队伍。

在这同时，郭文林已派人通过原索伦旗的旗长色仁（布利亚特蒙古族，精通俄语），同苏联红军进行了有关投诚事宜的协商。夜间接到苏军通知，在拂晓前到伊敏河岸，乌兰哈尔嘎那一带，集结全军，进行了缴械，随后苏联将郭文林、正珠尔扎布和副官鄂信台带到别处去了。至此伪“满”第十军管区就彻底覆灭了。

以后苏军把这批人马带到中蒙边境喀尔喀河南岸蒙古境内的哈木尔达瓦住了一个多月，后又带回海拉尔，在海拉尔因传染斑疹伤寒，约死亡二百余人，于1946年2月初全部被遣返回家了。

原五十团去红花尔基的三个连，在团长金永福，连长多祯祥、敖英贵、唐永祚等的率领下，消灭了日本人后，向苏军投诚，被带到齐齐哈尔市郊，于1945年12月，全部被遣返回家了。

伪满第十军管区部分官兵在锡尼河杀掉日本军官的经过

高其德·玛格斯尔

1945年5月初的一天，我在伪满第十军管区第七团（原第五十团）第三连的办公室里看报纸的时候，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位我认识的布里雅特蒙古族牧民。他叫巴图，在伪满军内当过兵，复员当了牧民。我让他坐下，敬茶的时候，巴图从怀里拿出一张纸说："这张纸是从东山飞机场南侧拣来的，请你看一下。"。他边说边交给我就走开了。这里一张印有蒙汉文字的传单，上面写有"为了人民消灭……"等字样。。我看完后很焦急，反复琢磨："这是谁撒的传单？巴图为什么把传单交给我呢？如果我把这个传单交给日本人，巴图肯定被逮捕并受折磨，我也是危险的"。所以，最后我还是把它烧掉了。后来发现日本人手里也有不少这样的传单。

到了7月份，日本军官的动态开始变了，把五十一团的蒙古族（包括达斡尔、鄂温克族）士兵，以连为单位分开，一部分去兴安岭挖工事，一部分去草地打草，又一部分去林区砍木材等。这些军队由团长、连长带队，日本军官都留在团

部。如：第五十团团长郭美郎中校（达族）带队去红花尔基挖工事，第五十一团团长金永福中校（达族）带第五十团的第一、二连去莫和尔图挖工事，我带三连去锡尼河索木的乌苏太扎拉嘎打草。给我连的武器只有骑兵用的两支枪、子弹二百发。

我们去打草近一个月的时候，8月9日早晨，突然听到远处的爆炸声，海拉尔方向上空冒着黑烟，有很多飞机向西飞去。我们猜着，这肯定是苏联红军的飞机。

这时，我又想起了巴图送来的传单，而且从苏联空军的出动，我感到伪满洲国肯定要垮台了。

当天中午接到团部命令："因为苏联军队已经侵入我国边境，立即带全连回团部。帐篷和一些工具不必带来"。我连连夜返回了团部（现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的南屯）。这时团部一片混乱，烧文件材料，给士兵分衣服、枪支、子弹、马具和干粮等。我找副团长平泽中校（日本人）报到。这时他对我说："苏联向日本宣战了，今早苏联飞机轰炸海拉尔东部和火车站，我们的部队已接到去兴安岭和日本军一起抵御苏军的命令，你连赶快做准备，今晚出发"。然后在屋里来回踱着步。不难看出他的内心恐慌和焦急。

我接受命令后回到连部，让连队做好出发的

准备工作，晚上十一点出发去渡伊敏河。这时又接到“回去烧掉营房、仓库、武器库”的命令。因此，我派去一部分官兵完成了这个任务。

8月10日午后4时许，部队到了锡尼河庙一带的沙丘休息，并决定在此过夜。天刚黑的时候士兵来告诉我，来了一位布里雅特蒙古牧民要见我。原来这个人就是上次送传单的那位巴图老乡。他以民族习惯行礼后，靠近我小声说：“色仁旗长派我来告诉你，苏联红军已到乌兰哈尔嘎那，你们军队赶快离开日本人为好。把这件事请你告诉郭文林司令官和参谋长正珠尔扎布，你们蒙古族军官赶快商量决定。色仁旗长还说，此事千万不要说是我告诉的，这是秘密。”巴图老乡说完，说了声“再见”就走了。

这时我很奇怪巴图这个人，并想了很多问题。但是我决定把这件事立即告诉斯尔森格（郭文林）司令官和正珠尔扎布。去见他们的时候，他俩正同几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我正在考虑如何见他们的时候，郭文林已经看见我，并奔我来了。我告诉色仁旗长派人来告诉的事，他警惕地看了周围之后小声说：“我们也有这个打算”。

我回连队不久，郭司令和参谋长来到我连，对我说：“我们决定明天杀掉日本军官后投降苏联红军，第十军管区有日本军官三十多名，他们是

全副武装的，他们有熟练的军事技术，所以要特别谨慎，非常秘密地作准备。我们决定给你这个任务，今夜你与蒙族军官一起研究、定计划，选出勇敢而有经验的好枪手，教给他们谁去干掉哪个日本军官，要一个一个地落实。其他军官指挥新兵躲进沙丘里。动手的信号是，明天全军出发后，到达有利地点，正珠尔扎布参谋长举手呼喊"军队向后退"时，玛格斯尔上尉你放三枪，就一起动手干掉他们"。

我接受任务后，到天黑时找可靠的军官和班长一个一个地落实了任务，并向司令官和参谋长作了汇报。给任务时特别强调了保密，但是仍很担心，所以这一夜没睡着。

8月11日早晨，全军向兴安岭进发，我一方面警惕着日本军官，一方面等待着正珠尔扎布参谋长的命令。日本军官们则毫无警惕地骑着马在部队里晃悠着。部队走到锡尼河庙东边不远的地方，参谋长正珠尔扎布突然举手大声喊："军队后退！"这时早有准备的我，连发了三枪，各连便一起行动，跑掉了平泽中校等两名日本人。

当天下午，召开了全军会议，郭文林司令官和正珠尔扎布参谋长讲了话，他们说："我们团结一心杀掉了日本军官，该向苏联红军投诚。因此，我们要把原帽徽、肩章全部摘掉，成

立“兴蒙汉第一军”玛格斯尔为第一团团长……。”散会后，派汽车请来了当时在锡尼河的伪索伦旗长巴达玛·色仁（他是布里雅特蒙古族，精通俄语），请他代写了俄文投降书，郭文林和正珠尔扎布签了名，又请他去乌兰哈尔嘎那（伊敏河边的一个地名），向苏联红军交投降书。色仁旗长带投降书去后，当天晚上就回来了，他说：“苏联红军接受投降，要司令官于8月12日早晨带全军来乌兰哈尔嘎那缴械，缴械时不准打枪”。

8月12日早，我带“兴蒙汉第一军”一团，先头渡过伊敏河来缴械。这时苏联红军已做好了接受我们的准备工作。如：西山上安置了很多大炮，山下有多挺机枪，近处有很多带冲锋枪的士兵，然后是一些尉官在等待着我们。我们渡过河就按照顺序在指定的地方一个接一个地放下武器，牵马走过去。苏联军官命令我们休息，郭文林、正珠尔扎布不见了。以上是伪满第十军管区全体官兵在锡尼河杀死日本军官后投诚苏联红军的具体过程。

投诚后，我们既不是“伪满警备军”，也不是“兴蒙汉军”，全当成了苏联红军的俘虏，被带去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哈马尔达瓦地方，在那里呆了一个多月后，被送到海拉尔东山下的俘虏营

里呆了五个多月。1946年2月被释放回乡。苏军方面还给了我们每人一份“释放证明书”。

郭文林在锡尼河率部起义

多祯祥

一、起义投诚经过

1945年（伪满康德十二年）8月9日，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郭文林正准备从海拉尔乘火车去满洲里检查征兵工作。当日早晨5时许，汽车行至东头道街时，突然发出空袭警报，有几十架苏联飞机空袭、轰炸。当时他赶快返回司令部，立即召集各部队负责人开了特别紧急会议。会上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制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开会期间又遭到两次空袭，会议进行到9时左右，收到日本关东军驻海防卫指挥部的命令。命令第十军管区所有部队在两日内急赴第一、二防区（在兴安岭南麓一带），阻击入侵的苏军。命令全军将士务必死守阵地，直到为皇帝陛下"玉碎全殁"为止。当时，司令部内部的日本军官见令叫嚣说："我们是皇帝陛下的股肱，是保卫王道乐土的铜墙铁壁。一、二防区是我们决一死战的主阵地，全军在，阵地在。我们把每个掩体、每个战壕都视作我们的坟墓。"在苏联红军大兵压境面前，面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狂人垂死挣扎和叫嚣，郭文林与其参谋长正珠尔扎布反复冷静地分析形

势，看清了滚滚向前的世界潮流，反法西斯战争的最终彻底胜利与日本军国主义及其扶持的伪满傀儡政权的彻底覆灭已成定局。认清了在这种生死悠关的关键时刻，摆在伪军官兵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执迷不悟，继续追随日本军国主义，替他们卖命，与苏联红军顽抗到底而终成日本法西斯垂死挣扎中的炮灰；一条是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反戈一击，起义投诚苏联红军。经几度审慎地考虑与权衡利弊之后，终于毅然决然作出了举行起义、投诚苏联红军的明智决定。于是在郭、正二人的密谋与策划下，在蒙、汉和达族排连以上干部中，火速进行了串连，提出了“见机行事，关键时刻反戈一击，兵变投诚”的秘密口号。这在蒙、汉、达族青年军官中，立即得到积极响应和拥护。在部队出发前，军官们和家属告别时都表示，决不在无谓的抵抗中替日本人当炮灰，一定争取活着回来见亲人……等等。具体部署是，在向兴安岭进发的途中，到锡尼河整顿部队，见机行事。

1945年8月9晚，全军在郭文林司令的率领下，陆续从海拉尔、南屯，以骑兵第五十团为前卫，以骑兵第五十一团、第十炮兵营、第十辎重队、第十通讯队、第十汽车队、司令部、警卫连，第十宪兵团的顺序向兴安岭进发部队。行至锡尼

河时，司令部内部的日本军官开始发难，他们反对郭司令和正参谋长下达的“就地构筑工事、整顿待命”的部署，坚决要求执行日本关东军驻海指挥部的命令，火速进入第一、二防区，阻击苏联红军，直至全军“玉碎全殁”为止。还要妄图越级南进，与苏联红军决一死战。当时由于日伪之间意见分歧，气氛紧张，形成对峙，战事似有一触即发的态势。正在此时，红军飞机撒传单，内容大意是“为使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早日取得彻底胜利，早日将东北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解放出来，苏联已向日本宣战”。号召伪军将士认清形势，举行起义反戈一击，消灭日本侵略军，投诚苏联红军。苏军传单进一步坚定了伪十军管区官兵立即兵变投诚的决心。8月11日早8时左右，郭、正二人果断地向知情的官兵发出“兵变起义投苏”的命令。霎时间，这些官兵各个击毙了预定的对象，并与负隅顽抗者之间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没用三十分钟，除了极少数漏网者外全歼了伪第十军管区的配属日本文武官员。

战斗结束后，郭文林召集各部队军官宣布了起义部队名称与番号。起义部队暂命名为“兴蒙汉第一军”。所属伪骑兵第五十团为骑兵第一团，五十一团为骑兵第二团，第十炮兵营为第一炮兵营等等。紧接又请来伪索伦旗旗长色仁先

生。他是布利雅特蒙古人，精通俄语。然后由正珠尔扎布口述，色仁执笔用俄文写了投降书。而后仍委托色仁先生为特使到乌兰哈日嘎那地区，向苏联红军前线指挥部递交了投降书。翌日，郭、正二人率部渡过锡尼河，向苏联红军投诚了。这就是“锡尼河事件”真实经过的概况。

二、“锡尼河事件”的历史意义与作用

郭文林率部于8月12日投诚后，苏联红军立即将郭、正二人及随从副官鄂信台等，用军用飞机带到苏联后方指挥部。翌日，苏联红军指挥部责成郭、正二人详尽提供中苏、中蒙边境上的日、伪军军事部署与设防工事等情况。所提供的主要情况是：

日军在海拉尔—牙克石—免渡河—鸡冠山—兴安岭西侧的军事部署与构筑工事情况；

从红花尔基到伊敏河上游二道桥—三道桥—塔尔其卡—柴河一带所设防的阵地情况；

红花尔基—莫克尔图—鸡冠山南侧—绰尔河一带防守部队情况；

阿尔山附近日本阿布师团和伪国防第二师的防务情况。

以上这些情报（可能还有其他），对苏联准确掌握这一带的日伪军事部署与工事，迅速进军，减少伤亡是极为必须的。从而可以说在解放东北

的进程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是其一。

其二，郭、正二人被带到苏军后方的第二天，即8月13日苏军用双翼式飞机将有郭、正二人照片的《郭文林、正珠尔扎布劝降伪军将士通告书》撒到正在开往塔尔其卡第一防线部队上空，大概内容是：

“苏联红军进军东北是根据盟军协议，是为了早日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使各国人民免受更大的苦难和牺牲，早日实现世界和平；

全军将士不应忘记日本战争狂人过去挑起的“哈拉哈河事件”和“诺门汗事件”给广大边民和伪军官兵造成的苦难历史；

奉劝我军构筑工事的部队，在苏军到达你们前沿阵地之前，务必放下武器，向苏联红军投诚；

奉劝边疆各族同胞，拿起武器协助苏联红军，早日消灭顽抗的日军”。

在“劝降书”号召下，在南线修筑工事的骑兵五十团七百余人，骑兵五十一团四百余人，在金永福、郭美郎团长的率领下，8月15日前分别向就近的苏联红军缴械投降了。由于大批伪军的纷纷投降，为苏联红军迅速解放东北减少了阻力，减少了苏军的伤亡。

其三，由于整个伪军管区官兵的迅速起义投诚，避免了一场与苏联红军抗衡的战争，从而不

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法西斯的垂死挣扎与籍以顽抗的气势，而且使大批伪军避免了在无谓的抵抗中充当日本法西斯的炮灰，获得了一条生路，边疆各族人民亦免受了战争灾难。

其四，起义投诚的伪军官兵在被收容期间，由于苏蒙军政治工作人员的热情与耐心开导，初步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这批起义投诚的伪官兵于1946年2月被释放回家后，其中大多数人响应王海峰等人的号召，云集到当时的“内蒙自治运动委员会”所在地王爷庙（今乌兰浩特），以这批人为骨干组建了内蒙自治军第一至六师。不久，这支武装力量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内蒙古的一支武装力量。这支革命的武装力量，在建立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解放东北，解放青海等解放战争过程中，曾立下了功劳，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战斗英雄和各条战线上的先进工作者。

注：我和郭文林是同学，他是日本国陆军士官学校本科第四十五期步兵科毕业生，我亦是该校本科第五十五期骑兵科毕业生。

1944年后在一个军区工作，他是伪满驻海拉尔第十军管区司令部中将司令官，我是该部参谋处主管全军军事教育和庶务的上尉参谋。